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和邓颖超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 卷首语 ·

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夫妻来说，婚姻生活的轨迹是这样的：相识——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养老弄孙——寿终正寝。而在中国，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所共同走过的生活轨迹是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命运同步。他们共同生活轨迹的每一步都是他们光辉的生命长卷中的灿烂章节：他们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相识；在寻求共同的理想中相爱；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大革命高潮中结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失去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此后，他们又以博大的爱抚育了许许多多革命斗争中献身的革命烈士的遗孤；在血雨腥风的日子，他们时而并肩站在对敌斗争的前沿，时而又面对生离即意味着死别的情势，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重任；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身居高位，却乐于清贫，为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富强殚精竭虑，特别是在他们最后相伴的几年中，在政治空气令人窒息的日子里，他们忍辱负重、互慰互勉，以自己的年老病弱之躯夜以继日地工作，将政治动乱造成的灾难减少到最小最小；在他们共同步入晚年之际，相约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这对夫妻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自豪的一对伟人——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紧紧相连的整体。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突然感到，周恩来的生命似乎直到此时才真正划上了句号。然而，随着邓颖超遗嘱的发表，随着海河岸边悲哀的汽笛长鸣，随着邓颖超骨灰的撒放，人们豁然懂得了什么叫做“永生”。

周恩来和邓颖超之所以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全世界人民的敬仰，除了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犹如滔滔江河般的伟大贡献和他们的传奇经历之外，还在于他们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忠贞的爱情和完美的人格的化身。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是超凡脱俗了的，建立在为共同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基础上的爱情。周恩来曾对侄女周秉德说，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候，我就考虑，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指邓颖超）”。在共同的理想的土壤中萌生的爱情，只有理想的倾覆，爱情才能死亡。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使爱情不断升华。他们的爱，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仍然热烈深沉、清纯透明、忠贞不渝，成为世人敬慕的模范夫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魅力，还在于完美的人格在他们身上相映生辉。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所崇尚的一切美德：智慧而忠诚、热情而理智、自信而谦逊、勇敢而谨慎、坚定而灵活、温和而善辩、胸襟坦荡、磊落无私、朴实无华……这是多么圣洁的精神境界，只有将钱财生死、荣辱得失都置之度外的人，才可以达到这样的精神世界。周恩来和邓颖超将这些品德表现得自然天成，尽善尽美，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无私无畏、鞠躬尽瘁的精神境界。

16年前，周总理离开了我们，不久前，邓大姐也离开了我们。他们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念和启迪。今天我们将此书呈现给广大读者，旨在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同时，也将他们共同的事迹、美德

和情感世界展示给读者。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产生的一代伟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光辉夺目的一生，以激励我们，以他们为榜样，“为了中华之崛起”，承担起后继者的责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周恩来和邓颖超

相识·相爱·结合

假如爱情真像诗人赞誉的，是“一种相似的灵魂联盟”，那么，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是这样。他们一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坚韧不拔的毅力，惊人的胆识与才干，高尚的品德与情操，豁达大度的襟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样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使他们半个多世纪相依相伴，在近60年的革命风雨中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恩爱愈笃，使他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放出异彩，被人们誉为模范夫妻。

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 为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所连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京津等地爱国青年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恩来，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爱国的革命激情，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带着“国亡无日”的忧愤心情，毅然回国，投入了海河两岸如火如荼的斗争。

那时，领导学生运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急需创办自己的报纸——《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被认定为最理想的主编。早在1913—1916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曾发起组织进步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先后担任《敬业》杂志和《校风》周刊的总编辑，并亲自撰写评论和报道文章，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信。周恩来应邀出任《会报》主编，他表示：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他为了办好《会报》，主持采写、审稿和编校，日夜操劳。白天，他投入火热的斗争，在反动军警镇压下临危不惧，走上街头演说宣传，参加示威游行；夜晚，他在灯下孜孜不倦写稿编报，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这家《会报》创刊号刊登周恩来起草的社论《革新·革心》，号召改造社会，改造思想。最多时每日发行两万多份，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全国各地有较高声誉。不久，周恩来又被天津各校进步刊物联合组成的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推选为主持人。

就是在这同一时间里，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的邓颖超（当时名为邓文淑），也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宣传工作。她担任了女师同学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部长。她组织讲演队，在市内宣讲厅和公众集会上演说，深入到偏僻的贫民区宣传。这支女学生讲演队是天津爱国斗争中十分活跃、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邓颖超擅长宣传鼓动，听她讲演的人常常感动得热泪涔涔。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女学生组织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合并。

1919年9月16日下午，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两个青年学生组织的领导骨干举行了会议，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在爱国学生运动中相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马骏、谌志笃、郭隆真、刘清扬等20名男女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大家讨论了团体的宗旨和任务，决定办一个白话文刊物，取名《觉悟》。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宣言》，举起了“革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革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两面旗帜，以“自觉”、“自决”为主旨，表达了中国先进青年在十月革命启发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

体现了“五四”时期革命青年“努力向‘觉悟’道上走”的进取精神。周恩来和邓颖超同觉悟社的社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座谈，一起研究世界新思潮，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任务和策略。

五四运动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1919年冬，反动派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并逮捕了24名各界代表。1920年1月29日下午，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率领一千多名示威群众，包围了天津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启封被查封的天津各界爱国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24名代表。直隶省长曹锐拒绝接见群众，还悍然逮捕了奋不顾身进去说理的周恩来等4名代表。

周恩来被捕后，和20多个先后被捕的代表一起，被关押在拘留所。他们分别住在鸟笼似的棚子里，敌人既不审讯，也不释放，还不准彼此往来。周恩来便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小条，和战友们商量对策。每天睡觉之前，敌人照例吹集合号“训话”，周恩来和战友们一听号声，便集体上厕所，先是个别串连，互相传消息，后来越聚越多，形成集会。

一天晚上，敌人又吹号集合“训话”了。分散回去时，一张纸条在一个个“犯人”的手中传递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

第二天，警察厅长杨以德又到各个监房巡查。大家都厉声质问他，“你们抓人，根据哪条规定？为什么不公开审判？”

杨以德说不出理由，狼狈地回头就走。周恩来正在监房里埋头写作《警厅拘留记》，看到杨以德走过来，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递给了他。

这个反动的警察头子本来一字不识，但他却装模作样地打开纸条，看了一遍，然后说：“很好，我回去考虑。”回去以后，他找秘书一念，内容竟和其他“犯人”质问的一样，气得他七窍生烟。

杨以德又想了个鬼主意来整学生代表。一天，他突然把被捕的代表分组叫去。发给每人一份“答卷”，提出21个问题要每个人回答。

这是敌人设的圈套。周恩来立刻串通大家，一律回答“不知道”。

杨以德无可奈何，又派人找周恩来个别“谈话”，先是假惺惺地说了些夸奖学生爱国的话，然后问道：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谁主笔？”

周恩来回答：“没有主笔。”

杨以德又问：“学生联合会的经费从何而来？”

周恩来很严肃地回答说：“你们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的经济内容，我也不必回答。”

杨以德碰了一鼻子灰，他们的阴谋又一次被粉碎了。

4月初，周恩来和被捕代表宣布绝食。要求放松管制和立即开庭“审讯”。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越过牢狱高墙，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动警厅的愤怒。这时候，邓颖超和其他20多位同志背着行李赶来了。代表们被捕后，他们一直在坚持斗争，并发动同学自愿签名，来替被捕的代表坐牢。

他们理直气壮地对杨以德说：“我们的代表因为爱国，被你们抓起来了。代表是我们大家推选出来的，不能只让他们在监狱里受苦，我们要求人狱来替换他们。快把他们放了，把我们关起来吧！”

这种事情，杨以德自当警察厅长以来还没有遇见过。他又惊又怕，只得

放松对被捕代表的管制，允许他们在院里散步、串门，并答应向反动省长转达关于开庭审讯的要求。

在天津各界爱国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直接救援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经过法院审讯手续，反动当局不得不于同年7月18日将马千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代表们全部释放出狱。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周恩来是一名勇士，是先进青年中极其活跃的杰出的领导人物。邓颖超也是青年中一位优秀的代表。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邓颖超在革命运动中的热情、勇敢和坚韧不拔，在生活中又是那样淳朴、端庄、待人以诚，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的智慧、坚定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深深打动了邓颖超的心。就是这样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为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所连接。

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一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

**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感情交流中，共同的
革命理想和患难与共的战友情谊的发展，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由沪启航。在四等舱里，坐着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就有来自天津的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等。他们是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留在国内的邓颖超和觉悟社的其他社友，则开始走向社会。邓颖超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

他们一别就是4年没有见面。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1921年夏，周恩来在热情地为天津《盖世报》撰写旅欧通讯的同时，曾多次给邓颖超写信，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遗憾的是，马千里是位粗心人，并没有当好传情的使者，前后十几封珍贵的信竟积压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后来周恩来另投别的地址，才与邓颖超联系上。此后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情长谊深。

邓颖超把她们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创办《妇女日报》等消息，不断写信告诉国外的社友。周恩来把他和蔡和森、赵世炎等在法国的情况写信告诉邓颖超和觉悟社成员，把他们主持出版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油印机关刊物《少年》、《赤光》寄给邓颖超等国内社友。周恩来撰写的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心得，对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文章，常使国内社友读后有顿开茅塞之感。

与此同时，国内社友还收到了由周恩来、郭隆真等编辑出版的油印刊物

《觉邮》（即“觉悟社的邮箱”之意）。《觉邮》专登觉悟社社友彼此来往讨论问题的信件。受国外《觉邮》的启发，邓颖超等也在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上，出版了不定期的《觉邮》专刊。在国内 1923 年 4 月 6 日出版的《觉邮》专刊第 1 期上，便刊登着 1923 年 1 月周恩来给逸豪（即邓颖超）的信，谈的是德法问题与革命。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苏维埃俄国，他痛斥了当时英、法等国工党。社会党的领导人叛变劳动阶级的可耻行为。他写道：“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各国劳动阶级如肯一致起来革命，赤军必可西出南下为援。所可惜的，现时英法的劳动界中有许多叛变劳动阶级的工党、社会党领袖，欺骗着工人，阻挠着革命。”他引证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卢森堡所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一语，认为很有见地。在 4 月 15 日出版的《觉邮》第 2 期上，又发表了周恩来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觉悟社社员谌小岑为此写了编者按：“伍这封信同下一封信是去年 3 月写的，两星期前才得收到。伍君到德后，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除组织旅欧东方少年共产党外，又出版《少年》半月刊，成绩很好。”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周恩来又一次表述了他对革命领袖列宁大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敬重之情，他写道：“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共产党的步骤已变，连列宁自己也承认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列宁等人，1917 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

觉悟社社友之间的通信，讨论的都是革命与斗争。但在信件之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周恩来曾在 1922 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翌年新春，周恩来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此信不久在《觉邮》第 1 期上摘要发表）。两人的情谊迅速升华。虽然许多社友都曾收到过周恩来寄来的信与画片，但唯独邓颖超收到的最多、最频繁。据说那些漂亮的画片，邓大姐有一个相本。1983 年，邓颖超参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天津革命活动纪念馆，见到周恩来由法国寄给南开同学的明信片时也说，这样的明信片，她有 100 多张。

觉悟社的社友在一次通信中曾高兴地写道：我们大部分社友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了。确实，他们在共同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了。

在频繁的书信往来的感情交流中，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在五四运动以来结成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情谊，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

50 年代中期，周恩来在教育晚辈周秉德要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曾讲过他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她不合适。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中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在一旁凝神谛听的邓颖超笑着插嘴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接到你的信呢！”

在广州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

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 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奉调回国。这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共青团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由林蔚担任书记。20日，新选出的执委会委任即将奉命回国的周恩来、刘伯庄为其代表，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这次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是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他们中有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周恩来没有去莫斯科。他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于7月下旬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在周恩来的身上，带着一份旅欧共青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活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9月到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后，他又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

当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在书信往来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将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北京的途中，受周恩来的委托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里去看望她，并带去一封信。高君宇和周恩来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交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做了邓颖超和周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由于南下途中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日子，8月上旬才到广州。

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更为紧张。邓颖超乘船到达广州的这一天，周恩来竟抽不出时间去接她，只得委托秘书陈赓作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凭着照片认人，谈何容易。一向机灵的陈赓看花了眼也没有找见邓颖超，只得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计划。当她踏上码头，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时，只得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就这样，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1925年8月8日，他们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的一间简朴的小房子里，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是年，周恩来27岁，邓颖超21岁，他俩结婚没有正式登记，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就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两人的相互承诺，也就是堪称婚姻誓言楷模的“八互”：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婚后，他们搬到文德东路文德楼二楼西边的一间约10平方的房间里居住。他们对面住的是李富春和蔡畅夫妇。

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结婚后的生活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周恩来夫妇住的房间，陈设十分简朴，靠东墙窗下摆着一张写字台，几张靠背椅；一只四层的藤书架上放满了周恩来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和国内新近出版的报刊。客厅设在楼下，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台，几张藤椅和圆木凳子。周恩来就在这里会见客人或召开会议。

那时，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一早就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40多年后，邓颖超到广州时又一次来到当年的中共广东区委旧址，深情地回忆起那一段不平常的难忘岁月：“我和恩来每周都有几个晚上来这里开会，那时，毛主席也经常到这里指导工作，研究问题。有时一直开到十一二点。”

在白色恐怖中，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婚后不久，邓颖超发觉自己浑身乏力，不思茶饭，一查方知有孕。她又紧张又着急：刚刚调到广州工作，时间不长。任务又重，哪有时间生孩子？况且，恩来工作繁忙，有了孩子又会分他的神。她拿定主意，自己作主堕胎。

万没想到，汤药喝进不久，浑身冒汗，痛如刀绞，接着大出血。邓颖超面色苍白，浑身无力，奄奄一息。

周恩来闻讯赶回，找医生急救，邓颖超才得以脱险。医生告知周恩来，这是因堕胎所致。送走医生，周恩来陡然发怒了，声音严厉：“怎么这样轻率，不负责任？！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商量一下再定？人命关天的事，岂能当儿戏？！”

“我担心有孩子牵扯精力，耽误工作。”

“有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嘛！不要孩子，应该征求我的意见，怎么能自作主张，随便吃药堕胎呢？革命者的孩子也该有生存的权利，孩子没有罪嘛……”

不久，邓颖超身体康复，又有了身孕。她心里洋溢着幸福和甜蜜之情，决心让恩来满足当父亲的愿望。

可临产时，邓颖超躺在床上已经3天3夜了，胎儿太大，怎么也生不出来。此时，周恩来正在上海组织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腹中婴儿已经窒息无望，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保住大人。于是孩子被强行拉出：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漆黑的头发，和父亲一样英俊的脸庞，体重12磅。只可惜未能在大地留下脚印便夭折了。

失子的噩耗，难产的痛苦，使邓颖超的身体极度虚弱，在白色恐怖中，邓颖超无法彻底复原身体，从此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面对这种无奈的状况，周恩来坦坦然然地说：“没孩子就没孩子吧。”这句话是对邓颖超的最深情的抚慰。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他们时而并肩
站在对敌斗争前沿，时而又面对生离
即意味着死别的情势

结婚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

工作，但决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他们还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互相问不该说不能说。不该问也不问。

周恩来和邓颖超婚后因革命事业需要，聚少离多，在斗争中屡经风险。在他们婚后不久的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身亡，周恩来一知道就出去了。出去干些什么？邓颖超不知道，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后来回来了，邓颖超看到周恩来穿着他唯一的那套西服，背上一片血迹。后来才知道是廖案发生后为了抓凶手，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坐车去司令部。原定晚11时戒严，蒋介石狡诈多变，突然提前两小时，9时戒严。周恩来不知道，车到司令部门口，警卫叫停车，司机未听见，警卫就开了枪。周恩来在车内赶紧卧倒，司机的脑袋被打碎，血流在周恩来背上。后来，周恩来跳出车门说明身份，才算无事。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遇险不止这一次。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6月19日香港工人在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举行支持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省港大罢工。23日，周恩来率领东征军两个营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个营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周恩来走在队伍最前列。游行队伍途经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帝国主义军警向队伍开枪。这就是沙基惨案。周恩来身旁左右两人都中弹身亡，周恩来幸免于难。

1926年冬，周恩来去了上海。次年3月21日，他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继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也在4月15日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广州两地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周恩来和战友们一起组织了20万工人参加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总罢工，并和群众一起参加了抗议大屠杀的示威游行。邓颖超在“四·一五”大屠杀时却因难产正住在医院里，当她得知外边局势的变化，正不知如何应付的时候，共产党员陈铁军同沈卓清一起赶到医院，告诉了邓颖超这个紧急情况以及党组织要她立即离开广州的决定，又幸亏得到好心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仗义帮助，她没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没有把门封死。邓大姐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周恩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赶快离开广州到上海登报找他。好心的医生把邓大姐和她母亲送上由广州到上海的轮船。到上海正好是1927年5月1日。她们以邓大姐母亲的姓名在报上登广告，找伍豪（当时伍豪即周恩来还不为人知），说你长期不回家，现在我带女儿来找你，见报即到旅馆接我。周恩来见报就把她们接走了。

邓颖超同周恩来会面不久，周恩来便根据党的决定在5月下旬去了武汉。虽然6月间邓颖超也奉命调武汉工作，他们又得以短暂聚首，但7月下旬周恩来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去领导、指挥南昌起义了。周恩来仅在有要离开武汉之时，才简单地告诉邓颖超他将去九江，其他什么都没有讲。邓颖超也什么都没有问。报纸报道了“八一”起义，邓颖超这才知道周恩来在南昌。他们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便在死别生离之际也是如此。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别离，对周恩来与邓颖超像是家常事。在上海、在苏区、在长征途中都是如此。

即便在解放之后，他们也常常不能团聚。周恩来为了革命事业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而邓颖超则总是他革命工作的积极的支持者。1955年，在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之后，周恩来毅然决然地出席

了万隆会议；1957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访问了匈牙利；1964年正当加纳发生政变时，周恩来访问了加纳。这些行程都有着极大的危险。

对这样频繁的分離，究竟要承担怎样的精神痛苦？邓颖超曾这样坦率地说过：“每次分別后，不知何日相会？无论是作为同志，还是夫妇，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但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铸成的人，他们能正确对待这种动荡无常的家庭生活。正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能安居乐业，过和平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才自觉地舍生忘死。

鸿雁传书，红叶寄情，海棠作证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50年共同生活中，离多聚少。但是不论是在血雨腥风、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忧国忧民、共展宏图的漫长岁月，他们始终心心相印，关怀备至。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给邓颖超写了一信，表达思念之情。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一起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愉快地阅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交给楚平。楚平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建国以后，夫妻也经常分离，他们仍在百忙中写信寄托思念之情。下面选载了周恩来给邓颖超感人至深的五封信。表现了他们经过长期的聚散离合酿就的爱情，愈加醇美、浓郁。

—

超：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你们行后，我并不觉得忙。只天津一日行，忙得不亦乐乎，熟人碰见不少。恰巧张伯苓先一日逝去，我曾去吊唁。他留了遗嘱。我在他的家属亲朋中，说了他的功罪。吊后偕黄敬等往南大、南中一游。下午，出席了两个干部会讲话，并往述厂、愚如家与几个老同学一叙。晚间在黄敬家小聚，夜车回京。除此事可告外，其他在京三周生活照旧无变化，惟木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南方来人及开文来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颇慰。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连日风大，不能郊游，我镇日在家。今日苏联大夫来检查，一切如恒。顺问朱、董、张、康等同志好。

祝你日健！

周恩来

一九五一·三·一七

二

超：

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的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

期前，陆瑾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乒乓之戏，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

三·三十一

望代问候各同志。

三

超：

今午得读张元同志给何谦同志来信，知你体力仍弱，不能执笔，甚为想念。羊城之行不可能了，但望你安心静养，归京时能看到你有进步，那就最高兴不过了。明日将与你试通电话，如你尚不能起床，即与张元一谈。

我这几天已天天下水。规律是下水之日，夜间就睡得很好。水中温度二十五，池外温度三十七八，好像是初夏天气。前两天虽有台风掠过，但气候无变化。今晚李德全、廖承志两位自港入境，与他们谈了一晚，得知不少日本情况。

我在此一切甚好，望你放心。二十五日后当北返，不知京中气候仍能如现在这样和暖么？

南天月夜，写此寄意。

祝你安好！

周恩来

十一月十三日夜

四

超：

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做决议，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只是小兰被沙可夫、岳慎夫妇带去，她还问奶奶好。实验剧院同志都托我问你好。

他们在农村、市区参加劳动锻炼，编了几个活报演给我们看，内容和演技都好，证明他们下去确有收获。陈毅、张茜两同志带了珊珊同去。我们在日光下玩了三个多钟头，并吃了他们一顿饭。他们主要目的，是请陈总为他们写剧本，我沾了光。晚间又应了唐生明之约，到他家吃了湖南菜，陈赓、肖劲光夫妇、徐冰、余心清均在座。连吃了两顿饭，晚间还读了书，夜间又睡了一个好觉，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这样休息。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容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这一个多月中外交、钢铁都很忙，后来又加了志愿军回国，也参加活动

了几次。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

其他待面谈吧！

问你好，并望转问其他同志好。

周恩来

一九五八·十一·十七

五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问好。

翔 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夜

这五封都是50年代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有时是周恩来在外地，有时是邓颖超在外地，这些老夫老妻间的通信，也和一般夫妻间的家信一样，谈的大都是日常生活。但周恩来是很富于感情的人，他的这些家信，情感很强。虽然大多写的是日常的琐事，但却象一杯杯带着淡淡清香的清茶，平和的言语充满温馨，用一件件有情有趣的事，唤起对方的情感，使对方从信中领受那恬淡而永不衰老的爱情。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之间，表达思念的方式，有时也十分独特。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这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回报亲人的问候，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这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那是他们永不退色的爱情的见证。

“八互”精神使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不败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为什么能数十年如一日，那样忠贞不渝，那样历久弥坚？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为回答。他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周恩来和邓颖超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沃壤，加上他们用自己精心总结的夫妇生活中的“八互”精神（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栽培，才使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不败，而且愈开愈鲜艳。“模范

夫妻”——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互敬·互助·互勉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时候，当着许多好友的面宣布，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他们怀着这种至真至美的爱情投身到共同的斗争中去；在共同的斗争中，爱情不断升华。他们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敬互爱、互助互勉，共同培育着忠贞不渝的夫妻之情、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和师生之情，共同谱写了人生最光辉灿烂的乐章。他们在人们心目中，是最成功、最忠诚、最美满、最模范的革命伴侣。

“作之夫，作之友，作之师。
相敬相爱，白头到老。”

1940年除夕，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里。周恩来正在主持傅大庆、冯大璋的婚礼。当时重庆政治气氛压抑，大家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工作和斗争。为了振奋士气，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周恩来和叶剑英决定把元旦搞得热热闹闹的，并为这对新人补行一次正式婚礼。

在这幢楼房的三楼会议室里，贴满了贺幛和贺词。其中周恩来的贺词最醒目：

形式和内容统一
大庆和大璋同心

紧挨着的是邓颖超的贺词：

相爱合作
善始善终

这实际上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恋爱观、家庭观和生活观的写照。

在婚礼进行中，周恩来首先举起酒杯祝贺新婚夫妻，然后环顾在座同志，又微笑着望了望坐在身旁的邓颖超，风趣地说：“在他们新婚的喜庆日子里，我还想再提一些想法。我以为，在结婚前要有正确的恋爱观，婚后要有正确的家庭观和生活观。”他又说：“我们有一个革命大家庭。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除了夫妻关系以外，还有战友关系、同志关系。结婚以后理应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生活方面要科学地处理、安排，过革命者紧张、活泼的战斗生活。我和小超同志从结婚以来，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幸福美满。还有一点，我的身体一直能保持得这样好，因为我从来没有自我摧残过。”

说到这，大家会意地笑了起来，为周副主席这番既风趣又富有哲理的话喝彩。周恩来最后又强调：“我和小超结婚后，10多年来，爱情是在上升和发展。在家里，我们是夫妻关系；从革命和政党来讲，是战友关系、同志关系。”邓颖超听后补充说：“我们还是师生关系。”又加上了第四种关系。

叶剑英紧接着颇有诗意地评述道：“作之夫，作之友，作之师。相敬相爱，白头到老。”傅大庆钦佩而深情地望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胡公和超姐理应是当代夫妻的典范。”

战争环境，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
邓颖超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无论何时都
心心相印。他们的相互关怀、相互思念，

在经常分处两地的情况下，显得格外动人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已经神志昏迷，由聂荣臻、杨石魂（当时的汕头市委书记）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后来，他得知这位女同志的男朋友是个地下党员，远在湖南，便对她说：“只要你们相爱，总会找到的。”这话是对那位同志的慰藉，也表示着他自己执著的信念。

在长征途中，他们也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在到达黎平时，由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他们才得短暂的见面。之后，直到过草地前，周恩来患了肝脓疡，昏迷不醒，邓颖超才守护在他身旁。对处于战争岁月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别离是家常事。相聚，又意味着共渡难关，甚至有随时被捕杀头的危险。邓颖超同志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1928年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的经历。她说，

周恩来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5月初来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我们特别重视事态的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一系列的盘问，恩来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

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终于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周恩来有夜间办公的习惯。他开了一夜会，凌晨4点才驱车回家。

周恩来住在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

司机无声无息地将汽车滑行到前院，便停下来。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当工作人员抱着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工作人员很快便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但是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走路快如风的习惯，

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像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踏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说：“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李富春与周恩来之间的友谊完全可以用江河之流长，海洋之水深来比喻。然而，他们对各自妻子的感情的表达的方式却大相径庭。

周恩来始终称呼邓颖超为“小超”，直到逝世。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更像个弟弟。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的热情和血液。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在坚硬地面上踩出来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间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大约是知道他这个特点，一次，李富春要来，他早早便迎在前院。李富春一到，他便伸手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悦耳地“咯噔”一声，便要迈步。周恩来忙耸耸眉毛，指指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不要惊动小超，她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张开嘴无声地“噢”着，点头表示明白，便放弃了倾听皮鞋咯噔咯噔作响的乐趣。

由于年龄和生理等原因，邓颖超同志身体稍有不妥，容易疲劳烦躁，不能熬夜，又时常发生失眠。

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病十分关心，他日理万机，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与邓颖超一天难得见一面，除了见面时关照她按时吃饭服药，剩下的就只能是尽量不使自己的工作打搅邓颖超。

李富春劝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然而，又谈何容易呢？工作每天一堆堆地摆在那儿，全国那么大，随时随刻都可能报来新情况或者意外事变。周恩来往往是心有余，却力不足，无法多跟邓颖超在一起活动。

换任何其他一个家庭，作妻子的肯定会有意见，特别是有病需要照顾体贴的时候，这种意见更容易产生，甚至发展成怨恨，从而严重伤害感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却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反而更加和睦，感情日深。那原因何在呢？

有一次周恩来会见客人，按照组织上的计划安排，邓颖超同周恩来一起见客。

平时会见客人是在楼上。秘书正要做准备，周恩来到了。吩咐说：“今天小超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小超上楼了。”

这件事虽然很小很小，可正因为事小，才更让人体会到那关心之细微，爱情之深厚。

邓颖超非但不怪怨周恩来整日埋头工作，难有陪伴自己的时候，反而常常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心，当周恩来戴上那两只蓝布套袖（周恩来办公时总要套上套袖，以免磨损衣袖肘部或是被墨汁污染袖口），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七八个钟头时，邓颖超时常悄悄走到门口，心疼地望着丈夫，终于不好打搅，便退下来请求工作人员：“你们想想办法，劝劝他，想法儿叫他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也好呀。”

工作人员经常劝说总理，特别是卫士及医护人员，一有机会就要进言。周恩来总是一拂手：“你们不要老打扰我，该休息的时候我自己知道休息。”他是怎样休息呢？

当他工作几个小时后，会忽然张大嘴，把头仰起深深吸口气，转转头颈，马上又伏案抓起了笔，也有时他会突然放下笔，立起身，绕桌子快走一圈，边走边扭动颈项活动两臂，十几秒的工夫，绕桌子走完一圈就又坐下继续批阅文件。最好的活动是“踢足球”，他买了个足球，就在屋里带球运动那么五分钟，便解除了全部疲劳似地重新投入工作。

还是秘书何谦有办法，他常能想起各种理由，特别是把文艺活动与工作结合起来去劝说周恩来，在星期六动员周恩来陪邓颖超一块去看戏。当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时，周恩来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周恩来忽然吩咐卫士：“到点了，我们走吧。”

于是，周恩来便陪邓颖超提前退了场。周恩来这样做都是为了关心照顾邓颖超的身体。

“小超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吃饭眼药。”周恩来这样吩咐。

无论演出多么精彩，周恩来一定要赶在 10 点钟，让邓颖超同志按时睡觉。

正是在周恩来这样的关心体贴下，邓颖超终于战胜疾病，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我是中南海的一个家庭妇女”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在中南海接见外地红卫兵，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中南海的一个家庭妇女。”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她长期为周总理做后勤工作的高尚品德。

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生活，最理解他的工作，最懂得他的心。建国以后周恩来为全国人民当家，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工作十几小时，有时二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邓大姐知道恩来担子很重，工作很多，愿意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工作上，但是，看着恩来总是超过工作时间很久还不去休息，就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半夜起来走到恩来的办公室门前站一站，走一走，提醒他休息。恩来总是向大姐点点头微笑。

有一个深夜，值班的刘昂同志接到总机转来的电话，电话员有点为难地问：是邓大姐打给总理的电话，是不是马上接过来？刘昂嘱咐值班员：“当然接过来！”因为她知道其中的奥秘。不出所料，周恩来一拿起电话，赶忙说：“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原来这是邓颖超想出的一个催促他休息的新办法。有时候她就写个条子递给恩来，提醒他注意身体。她患感冒时，不让恩来接触，怕传染他而影响工作。每逢这时，恩来常是推开门，在门口看一

看邓颖超，关心地说些嘱咐的话。邓颖超体贴关心恩来，他也很体贴关心邓颖超。每当夜里他去休息时，邓颖超已经安睡，他都嘱咐工作人员动作放轻，而他自己，也轻手轻脚地走进自己的卧室。

周恩来的工作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他和邓颖超各自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平时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互相关照，互相安慰。恩来起床、盥洗了，邓颖超走到他的身边，两人说上几句话；恩来该吃午饭了，邓颖超就悄悄地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有时工作人员因急事向恩来请示工作，邓颖超就坐在一旁微笑着默默不语；难得恩来到庭院里散一散步，每当这种时刻，他就委托工作人员把邓颖超请来一起散步。他俩从来都不做生日，但有时到他生日时，工作人员悄悄地安排他们吃面条。邓颖超也总是安排一些轻松的“节目”，或同去看望老朋友，或者请亲属来家里叙谈，或是陪恩来去观看文艺演出。

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机关取消了工作夜餐的规定。每当周恩来和同志们工作到深夜，邓颖超总要派人送上几块点心，一些糖果，或是一小盆素汤面，给大家增加些热量。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批阅文件。为了改善周恩来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地上，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

总理工作主要在晚上。为了减少一些总理的工作负担，增加点睡眠时间，邓颖超也想过不少办法和秘书们商量，比如：由秘书向各位副总理通报总理的健康状况，请他们多批办一些事情，重要的向总理通报一下就可以了。又如：鼓励秘书们发挥集体智慧，有把握的事可以代总理答复，事后再报告等。即使这样总理每天也工作到二三点钟。

后来，秘书们一商量，就定了一个每天晚上的轮流值班制度。每天晚上有那么两个人值班，不值班的就早一点下班，把任务交待一下就可以了。这样，总理的办公室也就清静一点了。邓颖超就对秘书们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从来不怕工作多，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一看秘书们都在，就知道事情不少，正等着他办呢，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少几个秘书，只留值班的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或交待一下。总理一看人少了，他就可以松弛一点。”

这一招还有点灵。总理一看人少了，事可能少一点，批起来放松一点了。这以后就实行值班了。一般的小事，不紧急的文件就留下请值班的代办，如你的文件很急很重要，也可以留下来一同值班。

后来，陈毅副总理接替了总理的外交部长的职务，邓颖超很高兴，她以为总理可以轻松点了。但是陈老总很尊重总理，什么事情，他批了以后，还要拿来找总理批。而总理呢，凡是送来的文件，他都要认真地看。以后，邓颖超对陈老总说：“老总呵，以后有些事你办了就行了，别再送了。”

邓颖超房中有个电铃，按钮直通总理办公室，那时，总理常常批文件到早上三四点钟，这时邓颖超就按电铃了，大家都知道这是邓颖超催总理该睡觉了，总理也知道是邓颖超催他了，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笑笑，点点头。有时文件还没有完，如果能拖到明天再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说没有了，没有了，如果是急件，不能拖的，就只好说，还有一点儿了，还有一点儿了，总理就笑了。

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颖超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总理和邓

颖超从建国后就开始用他们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的亲属，直到总理去世后多年，邓颖超一直管着他们。除了寄钱外，她还接济来北京治病的周家亲属，直到其病故为止。也就这两三年不补助亲属了。邓颖超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从不让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颖超说过，这是为社会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邓颖超安排好周家亲属的生活，也就解除了总理的后顾之忧啊。作为领导干部的夫人，她要尽这个责任。总理去世后，秘书们算了一下，这些年来先后接济了周家亲属一万多块钱，所以总理和邓颖超没有什么积蓄。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关心在政治上体现得更充分。比如，不搞特殊化，邓颖超就十分支持，自觉身体力行，与周总理始终协调一致。

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在妇联有职务，她一般是不以夫人的身份出现的，各有各的工作，很少跟着总理到外地去。记得有一次，1963年，总理去杭州治病，邓颖超有点不放心，就决定跟着去。临去前邓颖超就对总理说，这次出去没有工作，要自费。到了杭州住杭州饭店。总理在五层，邓颖超住四层，这是因为邓颖超怕总理晚上办公开会多，影响她休息。邓颖超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的费用是用她积蓄了几年的工资开销的。邓颖超身边只有一位服务员陪同照顾。她就是为邓颖超服务近30年的霍爱梅。邓颖超也要自费付服务员的房费。秘书劝说邓颖超，服务员是作为工作来杭州的，她的房钱应由公家报销。再说你的那点钱也不够付两个人的费用。最后邓颖超同意由我们交钱，回北京报销。邓颖超交付房费和饭费的收据一直保存到1976年总理去世后烧掉了。如果保存下来就更有意义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不仅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极力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还要在惊涛骇浪中千方百计保护一些蒙冤受屈的老干部、老元帅、老将军、老专家及各方面的人才，而且还尽可能采取措施，避免历代文化的精华，几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毁于一旦；更得苦口婆心，因势利导，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团结起来。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有时甚至几昼夜得不到休息，连吃饭也只得利用乘车的时间吃几口。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周恩来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工作人员心疼得不行。同志们议论说，周总理的健康，关系重大，必须对周总理只顾工作，不顾休息提出严肃的“批评”。大家联合起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大字报上说：“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大字报贴在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希望能起到经常提醒周总理注意休息的作用。两天后，同志们根据邓颖超的意见，又写出小字报“补充建议”五条：（1）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2）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3）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4）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5）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上，邓颖超还亲笔在上面签了名。

当时，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叶剑英、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同志都签名支持。

敬爱的周总理对群众的意见历来是十分尊重的。“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他在“大字报”上工工整整地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但是由于有大量工作需要处理，他还是照旧继续忘我地昼夜工作。

周恩来病危，邓颖超为他亲手整理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文稿

在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邓颖超就成了总理的通信员和秘书。开始时，总理还能批阅文件、看参考、报纸等。后来，由于病情的发展，逐渐改由邓颖超念文件，卫士和护士念报纸。大小消息都要念给他听，一点也不能马虎。

在周总理病危和临终前，邓颖超更是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以50年生死相依的战友和夫妻深情，理解和支撑着周总理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1975年秋，周总理病危。

9月20日，进行第四次手术。手术一切准备就绪，周恩来就要上手术台。这时，一份手写稿件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稿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这样一行字：

“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是周恩来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为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签署的这份手写报告的记录稿，就是周恩来委托邓颖超亲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

周恩来知道，有人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打倒，死后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而“伍豪启事”问题就是一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来把“周恩来”三个字炸得粉碎的定时炸弹。这次手术，能不能下得来手术台，很难说。他要把事实真相可靠地存放起来，一旦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启事”陷害他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可以为他作证。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面临严重威胁。顾顺章家人对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为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顾顺章认为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祸首，便把仇恨集中在他身上。顾顺章与国民党特务机构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企图用这种反间计陷害周恩来。这个“启事”首先刊登在1932年2月18日的《新闻报》上。而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已于1931年底离开上海抵达中央根据地。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类报纸都不可能再刊出“否认声明”。临时中央决定：请《申报》先转登伪造的“伍豪启事”，然后再刊登一个拒绝伍豪要求否认这个启事的声明。这种巧妙的做法造成了伍豪自己在要求否认“伍豪声明”的效果。这就是所谓“伍豪启事”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6406信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1932年2月上海的报纸刊登过《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信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1968年5月，国内“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进入高潮，又有人向中央反映“伍豪启事”问题。5月1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所谓“伍豪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申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毛泽东阅后批示：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这件本来十分显而易见的问题并未就此了结。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当时，周恩来曾考虑将他的报告录音复制后分别存放在中央和各省。这一考虑出于什么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但后来没能这么做。1975年9月，周恩来病危，他委托邓颖超将这个报告录音亲手整理成书面材料，在进入手术室前签署了这份文件。

周恩来要把历史的真相可靠地保存下来。可以把它视为周恩来的“遗嘱”——一份为自己忠诚，清白的历史作证的遗嘱。

**“ 我们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 ”**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回忆周总理逝世前的情况时说：

我们当时还不敢相信总理真的会死，一直盼望他会奇迹般地康复。可是，1975年10月的一天下午，邓大姐把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四个人找了去。她说：你们四位秘书，应当让你们知道，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是得的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

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大姐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头晕眼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看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泪流满面。但谁也不敢放声哭，怕影响大姐呀。大姐却很坚强，又对我们讲：这一天总是会出现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听着她低沉的声音，我们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说了句请大姐保重的话，就默默地离开了她。

11月初，周总理请人打电话来，点名要我今后陪着大姐去医院。大概他老是看着大姐一个人来来去去，放心不下；这也是对邓大姐的关心和照顾，减轻她的任务。但第二天大姐还是一个人去医院，不让我陪。总理就问为什么赵炜没陪来，又让人打电话嘱咐以后让她陪着。

第一次陪大姐去医院时，我一路琢磨：我大约有一个月未见到总理了。这次见面，头一句话说什么好呢？叫声总理吧，怕他不愿意听。他曾经说过：我在病中，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问一声您好吧，又怕他说，好什么，生病了。左思右想，找不出合适的话。眼看该下车了，我只好把心事告诉大姐。邓大姐说：你就叫一声总理，但见面后千万别哭。她已估计到我见到总理这一个月来病情的急剧发展，悲痛的心情一定难以控制，所以这样嘱咐我。说实在的，我当时又想见到总理他老人家，心中得到点安慰。又怕见到他久病不起的那个样子，心里大难过。

走进总理的病房，我就叫了声总理。他冲我伸出手来，我当时没打算握手，怕手上不干净，影响病人。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总理说：“还是握手吧。他握住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点点头，热泪夺眶而出。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是惦念着别人，惦念着大姐。我差点哭出声来。邓大姐见我这个样子，忙拽拽我的后衣襟。我努力抑制着自己，跑到外边走廊里才痛哭起来。我知道自己以前不愿想、不敢想的事就要发生了。

从这以后，我天天陪大姐去医院看望总理，这时就由我带上文件，到医院给总理念。

两个月过去了，周总理的病情日益恶化。我们有时白天去了晚上又去，随叫随到，就怕那一天到来。总理说话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弱。开始我还能凑合着听，给大姐当传译，后来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叫护士许奉生和卫士高振普来听，也听不懂。

1976年1月8日来临了。这天早上8点半，邓大姐让我打电话问问情况。医院方面答复说还可以，没什么新情况。大姐听后稍感安心，准备下午再去。哪知刚过半小时，小高就打来电话：“快！快来医院！情况不好！不行了！”我一听，脚直发软，脸也变了色，急忙叫车准备好，再尽力平和地对大姐说：“小高来电话，让您去一下，咱们马上走吧，车来了。”在车上，我才给大姐下了点毛毛雨说，“突然地总理情况不好。”大姐思想上早有准备，内心的痛苦比谁都重，但表面上看不出来。

当我们走进病房一看，床四周的屏风、桌椅都撤掉了，医护人员正忙着抢救，大家都在哭，看样子是抢救不过来了。9点57分，敬爱的总理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邓大姐在与总理即将永别之际，克制着内心的悲痛，以她的刚毅、沉着、镇定影响着工作人员，使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将要失去总理的现实，承担起后继者的责任。她在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这洁白的花圈，寄托着邓颖超多么深沉的哀思啊！

周恩来生前，曾经对邓颖超作过这样的评价：小超是这样热情，又是这样理智，两者又结合得这么好，简直是奇迹！

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赞誉啊！只有对自己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才能作出这样的评价。

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几十年过的都是革命者的生涯。”是呵，50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在革命的大道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风雨同舟，相依为伴。在革命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在急风暴雨般的生活里，锤炼了他们忠贞、完美的革命者的爱情。

抚孤·言人·育才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女，但他们却有比别人更多的子女，在他们周围有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革命烈士的崇敬，对烈士子女尽其所能予以关怀和培养。他们救孤不畏险，抚孤不畏难，育孤成才更是竭尽全力，他们精心抚育烈士子女的动人事迹，早已传为佳话。

“ 他们的父母为革命而牺牲，
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 ”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有时得知某个孩子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时，周恩来也会颇有感慨地和邓颖超说：我到上海参加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活下来了。在这种时候，邓颖超总是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 21 岁，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点中药打了胎。但这种父母思儿之情，一瞬就过去了。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爱护革命的后代。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谁说没有？我们有 10 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嘛！”在旁的邓颖超赞同地说：“是的，是 10 个。”

周恩来说的 10 个，实际只是一种泛指，不必考证。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实关怀和抚养过为数不少的革命烈士后代，并把他们抚养成成人，培育成才。其中有：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曹渊的儿子曹云屏、杨匏安的儿子杨明等。其他在延安的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红小鬼，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

长征途中，周恩来在关键时刻 保住了廖承志的性命

周恩来是 1924 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廖承志年仅 16，初出茅庐，是广州岭南书院的学生。一天晚上，承志问父亲，刚才那位身穿白帆布西装的客人是谁。来访者那炯炯有神的双眸和两道刚毅的浓眉，以及与廖仲恺低声的交谈，引起了承志的好奇。

“你还不认识他？”父亲说。“他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10 年后，而这位的当年“大将”在长征途中救了廖承志的命。

1935 年长征途中，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后，到了黄河边，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周恩来当时还不知道廖承志因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并准备处决。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偶然碰到向预旺堡镇开拔的廖承志等人的。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

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从而，保护了革命烈士廖仲恺的后代，也为中国革命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周恩来和邓颖超给予孙维世的 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予的多得多

孙维世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在延安，人称“妈妈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周恩来早就认识孙炳文，因为孙炳文是朱德的密友。20年代初期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柏林留学时，周恩来还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孙炳文既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他从德国回国后，就任广东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周恩来1925年10月率部离开广州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

20年代中期，周恩来夫妇同孙炳文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那时，孙维世年仅5岁，常常在窗户旁边为他们放哨。她扒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孙炳文外出办事时，常把女儿带着。他让女儿扒在自己的肩上，观察有没有人盯梢。孙维世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些懂得。不过，直到几年之后，妈妈才用严酷的现实对女儿进行教育。

1927年4月，党派孙炳文到武汉工作。由于铁路中断，他绕道去上海。在他到达之前，蒋介石策划的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开始。由于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告密，孙炳文到达上海时立即被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这位著名共产党人在上海郊区龙华杀害。

孙炳文遇难后，在艰苦的环境里，任锐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很多，任锐母女必须在特务登门之前转移。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任锐总要把手边的党的文件烧掉。母亲蹲在火炉前烧文件时，总要告诉女儿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孙维世在9至16岁这段时间里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常常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一个住所。有时她同母亲在一起，有时同母亲分开。

1935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任锐安排14岁的孙维世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江青也正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是个锋芒毕露的女人，这使任锐很反感。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着点。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找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

安。可是谁也不认识她。况且她年龄太小。16岁的孙维世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他多年不见孙维世了，一开始竟未认出她来。他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他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与任锐联系上了，要求把孙维世收为干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

1939年夏，周恩来骑马去党校讲课，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因而造成右臂骨折，治疗需要有较高明的外科手术，而当时延安还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于是，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由夫人陪同。孙维世得到毛主席批准也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去莫斯科。

在苏联，孙维世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她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掌握了俄语，并开始从事戏剧事业。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孙维世是代表团翻译组的成员。50年代以后，孙维世除了从事自己的专业——戏剧工作外，还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过翻译。

孙维世出于对养父母的爱，于1950年8月8日主动组织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结婚25周年）纪念活动。那一天，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里，孙维世把两朵大红绢花分别佩戴在养父母的外衣上，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微笑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他对卫士们解释说，按照西方的习俗，结婚25周年叫“银婚”，50周年叫“金婚”。这是这对“模范夫妻”仅有的一次纪念他们结婚周年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发号施令。一天清晨，天安门广场北边的城墙上贴出了指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派人闯进孙维世的家，对她百般威胁，逼着她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把嗓子都喊哑了，仍一无所获。

1967年12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以“特务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著名演员兼导演金山。他们翻箱倒柜，没收了所有珍贵物品，特别是孙维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合拍的照片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写给孙维世的信。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江青那里，江青把它们撕得粉碎。接着，孙维世本人也被逮捕并遭到迫害。从1968年3月1日起，孙维世即使在牢房里也戴着手铐，还遭到毒打。同年10月14日，孙维世的躯体再也承受不起这种摧残了，她终于停止了呼吸，去世时还戴着镣铐。

周总理得知孙维世的死讯后，心如刀绞，悲痛万分，怀疑她是遭虐待身亡，因此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是，江青手下的人竟擅自将尸体火化了。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去要骨灰时，对方回答说：“已经当作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

孙维世在被捕前预感到处境险恶，随时可能被捕。当时她已被人盯梢，所以她没有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同妹妹孙新世见了几次面。一次，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一个约定的地点，她对妹妹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人一死，问题就不好搞清楚了。”孙维世对妹妹说：“无论如何不能死。如果我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这就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视死如归的遗言，她死时年仅47岁。

“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

李鹏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许多方面与孙维世很相似。两人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两人先后都被送到苏联学习。孙维世念文科李鹏学习科技，主攻电力和水利工程。孙维世惨死在江青一帮党羽的毒手之下，李鹏则闯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1927年以国民革命军第25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昌起义。他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李硕勋与赵世炎（1927年7月被国民党杀害）的妹妹结了婚。国共合作破裂后，李硕勋于1931年任中共广东军委书记，领导游击战争。同年7月，当他在海南岛准备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两个月后，于9月16日被敌人杀害。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李硕勋就义前写的一封信：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主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月十四日

“陶”指的是他的夫人赵君陶，“吾儿”便是李鹏。李硕勋于1931年被捕遇难后，周恩来、邓颖超就多方寻找他的子女的下落，后来得知李鹏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

1939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路过成都时，邓颖超把李鹏从亲戚家找出来，带到重庆办事处，让他跟他们一起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不仅生活上关心李鹏，政治上也关怀李鹏的成长，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有时让李鹏念《新华日报》上的社论。李鹏一边念，周恩来一边纠正他念错的地方，并耐心地讲解内容。以后又把他送到延安，接受正规的教育。

1945年11月，李鹏要离开延安到前方去，临行前特意到枣园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周恩来得知李鹏入党了，就高兴地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邓颖超也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并说，这次和同志们到前方去，会遇到很多困难，对此要有思想准备。想了一会儿又说，你那床被子还是从重庆带来的吧，这么多年了，大概已经蹬破了吧。接着拿出一床新的丝棉被套给李鹏。这床丝棉被套是一位民主人士特意从重庆捎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他们一直没舍得盖。李鹏望着他们床上两床洗得发白的普通战士用的旧棉被，怎么也不肯接受。邓颖超慈爱地说，这被子轻一点，你背着好行军嘛。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怀，像一股暖流沁入李鹏的心头。李鹏含着泪水接受了这珍贵的礼物。后来，李鹏在延安一所技术学校学习。1948年被送到苏联深造。1955年回国工作。

解放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关心着李鹏的学习、思想与生活。1962年，我们国家正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当时李鹏在沈阳工作。周恩来这年6月到东北视察，一天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把李鹏等4个在他们身边长大的同志找到宾馆，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看到这些烈士后代的成

长，他们十分高兴。晚饭时间到了，周恩来提出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是四菜一汤，荤的只是一盘鱼，主食是烙饼和小米稀饭。周恩来让李鹏他们吃鱼，自己却夹素菜。席间，邓颖超同李鹏他们回忆在延安时的艰苦生活，说今天我们吃小米，就是不要忘记延安啊！后来李鹏听说，连这顿简单的家常饭，也是周恩来自费招待的。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80岁高龄的邓颖超还专门到他的办公室，谆谆嘱咐他：“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李鹏视如己出。对李鹏来说，周恩来永远是他的“周伯伯”，邓颖超永远是他的“邓妈妈”。

抚孤不畏艰险，育才教诲情深

在周恩来、邓颖超关怀照料的烈士子女中，还有曹云屏和杨明。

曹云屏是烈士曹渊之子。曹渊1902年出生在安徽省寿县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战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周恩来在曹渊的革命道路上对他有很大影响，曾亲自参加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小组会。曹渊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党代表。1926年5月，任叶挺铁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壮烈牺牲。曹云屏从小在家乡红军战士和游击队中那里，了解到父亲与周恩来和叶挺的友谊。14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写信，急盼去延安学习。周恩来回信说：“令尊曹渊同志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地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的敬意。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的家境贫苦虽无法升学，而求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北公学受训，并付来洋20元，籍作来汉路费。”1938年3月曹云屏与其堂兄曹云青作伴离乡，4月底到武汉，在八路军“五一”节纪念晚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亲切询问家中及路上情况，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小哥俩换上有八路军臂章的军服。随后，周恩来亲笔给在西安的林伯渠同志写信，介绍小哥俩的情况，细致周到地安排他们到延安学习事宜。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曹云屏兄弟5月中旬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3期第25队学习。两个月后，周恩来回延安时，见到兄弟俩，亲切问及学习和其它情况。一再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以后，周恩来每次回延安都要见他们，询问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他们到延安的第二年，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曹云屏在回顾周伯伯、邓妈妈的关怀时说：

1938年秋，我们听说周伯伯回来了，迫不及待地要去看他。我们到周伯伯家，他可高兴啦，详细地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我们有没有写信回家，我母亲生活怎样，能不能出来参加工作。我说：“我母亲不识字，缠足，出来不方便，会给党增加负担。”周伯伯沉思着说，现在革命还在困难时期，条件还不好，很多革命亲属忍受着苦难啊！当时已是初冬，周伯伯见我们穿得单薄，问我们冷不冷。我们说不冷，听说学校快发棉衣了。那知，就这么一件小事，也被周伯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我们回到学校后，一个傍晚，我们正在球场上玩，听说有人找我们，一看，原来是周伯伯的副官。周伯伯专门派他送来60元边币，叫我们每人做一件棉大衣。

周伯伯，邓妈妈，关心着我们这样的“小鬼”多着呢！我们在周伯伯家

里，常常碰见一些不相识的“小鬼”，同周伯伯和邓妈妈亲切叙谈。那天在周伯伯家里的，有两个中国女子大学的女学生。她们围着周伯伯，叽叽呱呱的又说又笑，谈得十分亲热。中午，周伯伯留我们吃饭。周伯伯的副官看见台面不平整，就用写挽联用剩的纸张，铺在台面上。周伯伯见了，就批评说：“这纸来之不易，你拿来铺台子，多浪费！现在边区的物质条件很困难，我们多处处注意节约呀！”

我们在延安学习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同学中对抗战的前途有种种议论。我们在给周伯伯寄信时，特别请他谈谈对抗战前途的看法。隔了一段时间，1939年2月13日，周伯伯给我们复信来了，信里说：

“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非常欣慰。我国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

过后，为了指导我们认清革命形势、抗战前途，周伯伯还特地给我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连续寄了四五期。

在同周伯伯接触中，我们发现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联系群众，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为党工作，即使对我们这样的“小鬼”也不例外。我们在学校时问学校的情况，参加工作后又问工作的情况，还经常问我们家乡革命斗争的情况，以及在外地的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一贯都是这样，问得非常仔细。

建国后，曹云屏一直积极为党工作。曾任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和顾问委员工常委。他常记：我受到周伯伯和邓妈妈的亲切关怀成长到今天，永远不能忘却他们的深情，我要以他们为光荣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杨明是烈士杨匏安之子。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1921年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与周恩来一道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后，杨被派往上海坚持斗争，编辑党的刊物。为了减少党的开支，以及弥补家用，他除在夜晚加紧写作和翻译外，还要帮助人家推磨做米糕，让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1929年，印刷所遭破坏，杨匏安被捕，1931年在龙华被秘密杀害。杨匏安牺牲后，家属回到广东老家，靠打短工和做手工活过日子，杨明兄弟姐妹们沿街乞讨，后来进了孤儿院。

周恩来对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十分软佩。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大力组织营救，时常不顾危险去看望他的母亲和家人。还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设法营救，甚至策划武装营救。杨匏安牺牲后，周恩来对杨匏安的遗属十分关心，一直多方寻找。除了托何香凝先生和其他同志帮助寻找外，还以周翔宇的名字向杨明的乡亲写信，打听下落。1935年找到后，托何香凝将杨明从孤儿院接出来，送到仲恺农工学校农科学习。从此杨明积极投身革命救亡运动，并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杨明去延安学习途经武汉，周恩来立刻会见。8年没有见面了，杨明本想周恩来可能认不出他了。没想到一见面，周恩来亲切拉着杨明的手说：“不要介绍了，我认得你，你长得更像你父亲了，连说话的神情都像”。接着问长问短，一再叮嘱杨明不要忘记父亲在狱中《示难友》一诗，要学习父亲高尚的革命品质，继续遗志。听说杨明入了党，周恩来高兴地说：“看来你们是长大了。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知识，今后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安排了杨明等人去延安事宜，还给了30元路费。

第二年8月，杨明给周恩来写信谈及弟妹想来延安参加革命。周恩来回

信说：“你的家已属廖承志同志照顾，缓急有助，不须挂虑。你的弟妹倘欲来此间，也可径找廖同志商洽，定能代他们设法成行。”经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杨明全家都得到组织上的妥善安置。四弟来到延安，六弟参加了广东东江纵队，其他弟妹和祖母则留在港澳机关，派专人照料。1940年5月，杨明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向周恩来表示要到前方去。周恩来非常高兴，但想到杨明有心脏病，就写信劝慰他：你毕业后应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好能多学习一时期，你可向党提示请求。附上10元，作你的零用费。医治问医，我已函告张启龙同志。杨明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牢记周恩来的教导，服从党的安排，努力为党工作。现在杨明同志已离休，在谈到当年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时，依然非常激动。

嘱咐李湄：工作地区不宜离开 你妈妈太远

廖仲恺、何香凝一家几代人献身革命，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同我们党，同周恩来等同志结识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李湄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外孙女，李少石和廖梦醒的独生女。李少石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1945年10月，也就是日本向中国和盟国投降的一个月后，他在重庆遇难。

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战地》增刊为纪念周总理在1980年第1期封里，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恩来1949年写给李湄的一封信。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你好。

周恩来
七·二十三

父亲遇难时，李湄13岁。不久后，她随母亲廖梦醒由重庆到上海。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2月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廖梦醒奉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对李湄有危险。因此，李湄被送往香港，同她外祖母何香凝暂住。

解放后，李湄母女在北京团聚。1949年4月，李湄进华北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预定于同年8月（即周恩来回信数周后）毕业。这几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青年人按捺不住迫切希望参军的心情，因为部队当时招收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南下进军途中做政治工作。当时17岁的李湄当然也不例外。她只是担心母亲不同意，因为她是独生女，而且母女刚刚团聚不久。李湄有同龄姑娘所具有的一切心计。她写信给周恩来，因为她认为周伯伯有可能说服她母亲。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最后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了。

告诫干部子女：不要学清朝八旗子弟

1953年5月24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北京101中学。当时一些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集中在这所学校里读书。为了教育这些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除了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外，特别给他们讲了清朝八旗子弟的故事。周恩来亲切地问：你们听说过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八旗子弟，就是清朝

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贵胄的‘胄’字吗？”同学们思考着，互相观望着。他接着说：“就是胄字出头的那个‘胄’。这些贵胄都是立有战功的清朝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大清帝国。可是，到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了，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子东游西窜，游手好闲。他们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娇奢淫逸的生活，坠落成了一群腐败无能的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最后丢了天下。当然，他们这种转化是一切剥削阶级必然的下场！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

在这次看望中，周恩来又谈到改变干部子弟学校性质，招收人民群众子弟入学的问题。他说：“建国4年了，我以为这样的学校已经改变了。”“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斗争的形势迫使组织上创办干部子弟学校。现在情况不用了，这种性质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啦，这不关你们的事，这是政府的事。不过也是你们的事，你们应当拥护。你们拥护不拥护？”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回答，“拥护！”热烈的掌声和爽朗的笑声溶成一片。周恩来接着说：希望你们“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特殊化。你们要是变得特殊化了，脱离群众了，那么你们就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轨道，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方向，就不成其为革命的后代、无产阶级的子弟了。”

同学们望着周伯伯和邓妈妈亲切的笑容，聆听着语重心长的教诲，一股暖流一直流到心里。总理提出的问题，过去没有好好想过，现在开始思考了。当晚，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在议论总理的教导。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同学们仿佛突然长大了几岁。

“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周总理的鼓励，鞭策同学们永远前进。

“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说这次拜访“实现了8年前的愿望”。周恩来一边亲切地同周瘦老交谈，询问他的盆景园艺技术，了解他的创作情况，鼓励他“写出好作品来！”一边抱起了周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到此情此景，忽然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这就是周恩来的胸襟，这也是邓颖超的胸襟。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家庭观。

1962年，一对普通的工人夫妇过早地去世了，撒下了5个孤儿。30年过去了，5个孤儿已长大成人，他们忘不了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关怀和温暖，更忘不了敬爱的

周总理和慈祥的邓妈妈

1965年春节，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照顾孤儿周同山五兄妹的田大婶。他紧握着田大婶的手，亲切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现在怎么样？老大当兵了？在哪个部队？”田大婶不住地点头，说：“挺好，挺好，请总理放心！”周恩来的关怀，使田大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件件往事，在她脑海中涌现：

周同山的父亲，在旧社会是北京拉人力车的穷车夫，母亲整天在外拣破烂，一年到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贫穷生活。解放后，他们一家变样了，吃不愁，穿不愁，但谁料想，1961年和1962年，周同山的父母双双得病，先后离开了人世，兄妹五人成了孤儿。那时，大哥同山15岁，最小的同义才3岁。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孤儿同样能吃得饱，穿得暖，他们受到党和各级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把他們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还上了学，受到了教育，兄妹五个，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幸福地成长着。老大同山中学毕业后，当上了人民解放军战士。

更让人难忘的是，1964年8月17日，同山五兄妹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要他们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为招待外宾和外国小朋友而举行的联欢会。喜讯传来，全院的叔叔阿姨都感到高兴。他们忙着为孩子们收拾打扮，田大婶亲自给小同贺梳好了小辫子，穿上了漂亮的新裙子……五兄妹高高兴兴来到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一位头发灰白，穿着一身朴素衣服的老奶奶，笑嘻嘻地朝他们迎过来，她就是邓颖超。邓颖超很亲热地拉过这个来瞧瞧，拉过那个来看看，把最小的同义抱在怀里，不住地问：“你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周总理要我问你们好！”

五兄妹一听这话，激动万分，眼里含着泪花，只是笑。老三同来高兴得在红地毯上翻跟头，邓妈妈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爱抚地说：“我看他是最淘气的。”邓妈妈摸着老二同庆的头亲切地说：“还是这个当姐姐的乖。”随后，她又亲切地询问老大同山、老四同贺的学习、生活情况。最小的同义嚷嚷着让邓妈妈抱，邓妈妈又弯下腰把他抱起来问他：“幼儿园好吗？吃什么饭？”“幼儿园可好了，今天阿姨还给我做肉包子吃呢！”在场的人看到这场面都会心地笑了。这时邓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低头问正在蹦跳的同来：“你学习怎样？”这一问同来脸刷地红了，他小声说：“算术100分。”邓妈妈看到他那窘迫的样子鼓励地说：“还要继续努力。”

在联欢会上，邓颖超把他们五兄妹介绍给外宾和外国小朋友。他们讲述了孤儿在新中国的生活，许多外宾和小朋友都走到他们身边问候。联欢会结束的时候，邓颖超又一次来到他们身边。说：“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啊！”五兄妹望着头发花白，穿着朴素的邓颖超，好像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1986年1月9日，邓妈妈特意给五兄妹写去了信：“……知道你们已长大成人，我为你们高兴。看到你们的信和照片也想见你们。只是目前有些事，还不能安排邀请你们。待以后再邀吧，这件事，我会记得的……”

1988年中秋节，邓颖超把五兄妹叫到中南海共度中秋佳节。当五兄妹来到西花厅时，邓妈妈脸上带着微笑亲切地对他们说：“昨天天气不好，我可担心了，真怕下雨淋着你们……我知道你们爱吃枣泥月饼，所以我特意让他

们给你们准备了枣泥月饼。”邓妈妈的话像一股甘泉流入五兄妹心田，顿时西花厅中回荡着他们的欢声笑语。

邓妈妈非常严肃地让五兄妹汇报各自的学习、工作情况。当她知道同山已担任北京供电局副局长多年，工作上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同庆在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中是认真负责的；同来从部队转业到农场局工作是努力的，尽心的；同贺，同义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汇报后，高兴他说：“你们是有出息的、有志气的、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孩子，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你们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孩子，但你们都要记住你们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你们要比一般的孩子更爱党、更爱祖国、更爱人民，你们应为祖国多做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自从邓颖超住院后，五兄妹时常去医院看望她，邓颖超从不谈自己的病而总是关心着他人。有一次邓颖超非常内疚地对同庆说：“上次忘了告诉你们，代我向关心你们成长的人问好！”同庆感慨万分地说：“您心里总关心着他人唯独没有自己。”邓妈妈却说：“咱们是一家人嘛。”邓妈妈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在五兄妹的心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家教·家规·家风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由于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人们对亲属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亲属除具有常人的血浓于水的亲缘之情外，还融注着更加深远博大、无私磊落的挚爱之情。他们对亲友严格要求、亲切教诲，鼓励他们勇敢地奋斗，执着地追求，在艰苦的磨炼中达到人生的崇高境界。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亲属的这种真挚的关怀，像一盏明灯，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像一盆火，温暖着他们的心。周恩来和邓颖超博大磊落的亲情凝结的和谐温馨的亲属关系，为人们所景仰。

“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
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生前曾多次郑重地讲过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对于其中的“过亲属关”，周恩来说：“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他语重心长地说：“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又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历史也可以借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1964年夏天，许多亲属事有巧合，因公停留在北京。8月1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召集他们和在京工作的亲属来了一次家庭聚会，主题也是过“五关”的问题。这次对亲属的谈话是在严肃、活泼、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周恩来联系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说得生动、深刻、发人深思。他们要求亲属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特别要求亲属中的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不断前进，并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周恩来还以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切身的感受，鼓励晚辈们不断前进。他说：我革命40年，难道就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一个人，自己说好不行，要由人民给你下定论。要在你死后，人民说你是个好人的时候，才能算个好人的！晚辈们感受到同伯伯和伯母在一起的时刻，在慈爱、温暖和体贴入微的关怀中，受到了终身难忘的深刻教育，享受到无可比拟的幸福。

在过“亲属关”的问题上，周恩来和邓颖超毕生言行一致，言传身教。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家中侄子、侄女这样的晚辈很多，这些晚辈在成长道路大必然面临着升学或就业的选择。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鼓励他们到

基层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教育侄儿“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这句话蕴含着总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揭示了读书意义的真谛所在——为祖国的昌盛，人民的幸福诚实地劳动，发奋地读书才能渡过有滋有味的人生。

周恩来的一个侄女周秉德，聪颖好学，初中毕业学业成绩优秀，完全有条件继续上高中然后出国留学，这是当时绝大部分干部子女所走的路。但是她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影响下，报考了中等师范专科学校，选择了做农村小学教师的职业。

秉德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老师、同学都劝我好好考虑。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说了，她立即表示支持：‘好呀，和我一样呀！我原来也是做老师的。’在饭桌上她滔滔不绝地鼓励我：‘我16岁就当老师了，做老师非常有意义，现在国家又这么需要。’伯伯埋头吃饭没有吭气，七妈说：‘我都说了老半天同意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伯伯说：‘有你一个人说就够了，她得有点独立思考。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伯伯就是这样，要求我们从小就要独立地决定，自己选择。”

“那时候我偶尔到中南海去，找小时的伙伴娇娇，有一次在海边看到了毛主席。他坐在一个石头凳子上：‘秉德，你来啦？’我说：‘我来找娇娇玩。’‘你现在上的什么学校啊？’‘北京师范大学。’毛主席的反应和七妈一样：‘那好啊，我也是学师范出身的，女孩子干吗非得学工业呢，学师范、学医挺好么！以后我让李敏、李讷也去学师范。’李敏后来和我说，主席对她讲过，‘你怎么不向秉德学呀，你也应该去学师范。’几年以后，李敏果真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

周秉德刚满18周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离城20里外的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当上了“孩子王”。

1968年夏秋之交，在中南海的林荫路上，连蹦带跳地跑过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就是周总理的另一个侄女，小名“小六子”的周秉建。今天秉建是来向伯伯和伯母辞行的，明天她就要到内蒙古大草原去了。

秉建一进屋，伯伯那温暖的手一把握住了她的手，用力握了握。周恩来高兴地说：“秉建，我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你要沿着你选择的道路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秉建连声说，“伯伯，您放心。”周恩来关切地问：“你到牧区去，做好思想准备了吗？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动摇。”

周恩来和秉建一起吃了晚饭，算是给孩子送行。他笑着说：“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你，请你吃苦瓜。最好的支持是精神上的，对吗？”接着，周恩来又询问了秉建要去的盟、旗的名称，走到墙上挂地图前，找出它的位置，指点着向秉建详细介绍了那里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等情况。然后，他边吃边说：“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你在家不吃牛羊肉，到牧区要锻炼吃。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很重要。”

在一旁的邓颖超把话接过来，给秉建讲了红军长征时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红军长征的故事，秉建从小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这次却感到分外亲切、新鲜。邓颖超还送给秉建两句话，对她说，这是你伯伯最喜欢的两句话，“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秉建把伯伯、伯母的话都记到心里。一顿饭时间很快过去了。周恩来要去办公了，临走，又再次握住秉建的手，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同志搞好

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看着秉建频频点头，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秉建插队以后，表现很好。1970年冬，在当地参军了，她急忙给伯伯、伯母写信，报告喜讯。1971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新军装，兴致勃勃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总理询问了情况以后，耐心地对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原来，周恩来知道秉建参军的事情以后，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秉建是怎样参的军，是否有正常的手续？他见孩子有些思想不通，就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牧、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秉建刚刚到部队，现在却要回去，心里又难过，又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觉得伯伯说得对，没有不服从的理由，就答应了。

回到部队后，秉建又接到伯伯、伯母寄来的《人民日报》，报上登载着知识青年张勇烈士的事迹，伯母还代伯伯给秉建写了封语重心长的信，希望她向张勇烈士学习，为建设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秉建完全想通了，给部队领导写了封信，申请回到草原去。部队领导还是想把秉建留下来，以为拖几个月，周恩来也就不会再过问了。没想到，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生气，他对有关部队领导同志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样，部队领导同意让秉建回到草原。

参军4个月的秉建，脱下军装，第二次来到草原。她被分配到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郭勒公社阿拉坦图生产队……时间一久，大家知道了这位纯朴、热情的汉族姑娘，是周总理的侄女。牧民们交口称赞周总理的决定，深情地说：秉建是总理的侄女，也是我们草原人民的好女儿。

为了和蒙族同胞打成一片，秉建决心学好蒙语。她被贫下中牧推荐，考入内蒙古大学蒙语系学习蒙语，得到总理的支持。总理说：你学好蒙语，就能更好地为内蒙人民服务了。

有一次周秉建回京探亲，周总理和她一起吃饭时。询问了她的年龄和今后的打算后，慈祥和蔼地说：“要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就找那里的蒙古族青年，和牧民青年谈恋爱好不好？”还说：“王昭君就是匈奴民族的儿媳妇嘛！你可以向她学习，做个蒙古族的儿媳妇嘛！这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体现，你在这方面要增进蒙汉民族的友谊和团结，做个好样子，起个模范作用。”

周秉建完全实践了周总理对她的嘱咐和教育。20多年来，她在牧民乡亲们的帮助下，适应了牧区的生活，学会了放羊、骑马、说蒙语，习惯了睡蒙古包，真正成了草原女儿。后来她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又与蒙古族的一位青年结婚。现在，她作为蒙古族人的妻子和蒙古族孩子的妈妈，正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振兴内蒙古的伟大事业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子，1969年在延安枣园插队。后来当地群众送他参军。周恩来知道后，又叫他回生产队。邓颖超还特意找到延安来京开会的同志，对他们说：“孩子还年轻，可能有点思想情绪。托你们回去做做思想工作，要他好好向延安群众学习，扎根延安，建设延安。”后来，经过锻炼，群众推荐他上了大学。1973年，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就问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富治：“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是很好吗？”

雷富治说：“他表现很好，是群众推荐的。”周恩来问：“他大学毕业后再回来，你们要不要？”雷富治说：“要”。周恩来这才爽朗地笑着说：“好，一言为定。”

“你们都是党员，我作为你们的伯母，
首先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你们”

作为我们党最早的共产党员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对晚辈的期望是相当高的，他们为晚辈每一点进步而高兴。我们从周恩来的侄子周尔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晚辈的博大无私的爱。周尔均说，1946年夏末，当时我不满14岁，因家境贫寒，无钱继续升学。于是与哥哥一起到上海思南路我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投奔伯父母。按照上一辈的排行，我们习惯地称恩来伯伯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七伯七妈拉住我和哥哥的手，嘘寒问暖，问家里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直至前几年，七妈还清晰地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她说：“那时你俩穿得破破烂烂，脸上还长了疮。我给你们擦了‘如意膏’，那个药可灵哩。”

见到七伯七妈后，我和哥哥说：“我们想参加革命队伍。”七妈听了会心地一笑：“你们先休息一两天，我和伯伯商量一下。”两天后，七伯七妈对我们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没有谈判诚意，国共和谈估计要破裂，我们随时可能离开。原想送你们去延安。但中共代表团的许多同志可能要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们很困难。你们还是暂时就地留下，我们今后再设法取得联系。这里特务很多，你们要十分小心。”七妈还跟我们讲了摆脱特务盯梢的办法。尽管我们很想去延安，但还是听从了七伯七妈的安排。七妈给了几件衣服和一些钱，看到我们穿上衣服还算合身，她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但我仍然察觉到，七伯七妈对不能把我们两个孩子带走，心情是不安的。

解放后，我曾同长期受到七伯七妈关怀照料的孙维世大姐谈起这件往事，她感慨地说：“周伯伯、邓妈妈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有的烈士子女还是他们派人从敌占区找来送去的。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周到得多呀！”

1949年6月，我参加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随后在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这时，我又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我写信告诉他们，我正在争取入党。七妈回信勉励我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并嘱咐我有了好消息随时告诉他们。1953年12月3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即用航空信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七伯七妈。没想到，七妈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在病中亲笔回了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尔均同志侄：尔流同志侄同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诉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一，廿四。

这封信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成为我几十年来实践自己入党誓言的座右铭。

几年后，我和我爱人邓在军先后调到北京工作，见到七伯七妈的机会多了。每次去看望他们，七妈都关切地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勉励我们加倍工作。一次维世大姐和金山同志在西花厅，七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四个人走过的革命道路不同，但都要有经受曲折磨难的精神准备，万不可以认为今后的道路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你们都是党员，我作为你们的伯母，首先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你们。”

七妈既是一位严格的长者，又是一位慈祥的伯母。60年代初，我在总后工作。在大雪纷飞的一天，七妈突然来到我和在军住的筒子楼。我们家当时连个软椅子都没有给她老人家坐的，但她老人家在这个小家里同我们和孩子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近年来，七妈年过八旬，多种疾病缠身，体质衰弱，但她始终关怀着我们晚辈。国防大学成立后，我去看望七妈。她对我说：“你们学校让我题词，我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前不久，我在301医院动手术。七妈听说我住院了，拿出一个白色的小闹钟，托在军带给我，并嘱咐说：“尔均生病，吃药应该很准时，把这个闹钟带给他。”现在，这个小闹钟成为七妈留给我的珍贵遗物。

几十年如一日，被严格执行和 遵守的十条“家规”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家里有一个不成文，但一直被严格执行的“家规”。亲属们将其归纳为十条：

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是，不许请客送礼。

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

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是，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家规”的内容和要求，有些是很具体的，执行起来也比较明确。有些则很笼统，执行起来有很大弹性。比如“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什么算谋私利、搞特殊化？组织办理的，一切符合手续的算不算？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二位“执法官”在执行“家规”时有他们的根本原则，这就是个人感情服从党性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有损党的形象的事绝不去做，锱铢必问。

解放初期，周总理的侄子周尔辉家境十分穷困。他最初在扬州念中学，

享受助学金待遇。从改工资制的那个月起，总理立即叫他不再领取助学金，而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他的生活费。

1952年，尔辉到北京看望总理，总理把他留在北京读书，送他进了刚由私立中学改为公办，条件比较差的26中住校，让他吃每月7元（另一种为每月9元）的伙食。入学前，周总理一再叮嘱：不论谈话或者填表，都不许透露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了你是我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

尔辉从26中毕业后，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从来没让人知道他是周总理的侄儿。直到入党的时候，组织上要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到淮安去了解情况，才知道了他和周总理的关系。1960年，尔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61年，尔辉结婚，1963年，为了照顾尔辉夫妻关系，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尔辉的爱人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么做。亲自动员尔辉夫妇一起去淮安工作。他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周总理又说：“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便，要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邓颖超也转告侄媳：“你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他的亲属也毫不例外，不能特殊。”劝侄媳回淮安。后来，侄媳回了淮安。尔辉也带头响应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调回淮安。周恩来嘱咐侄子：回去后，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特殊要求，一切听从家乡组织的安排。后来周尔辉在县中学当了一名普通教员。

每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晚辈的这种心情，尽量满足他们这一愿望，拍一张合影。但照片印出来以后，周恩来在发送照片的细小事情上都考虑到不能让晚辈们有优越感。他只给了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戚来看望他们，都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一次，他的一个侄子和一个侄女相约看望，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他们还要赶晚上7点半的一场演出。卫士看他们着急便主动开车送他们到工人俱乐部。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卫士，周恩来说：“你以为这是对你们好吗？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有三个侄儿侄女。孩子们穿的都是普通棉布衣，到国务院食堂去吃饭，坐公共汽车去上学。在总理和邓颖超的教育和影响下，三个孩子没有骄气，毫不特殊。周总理和邓颖超常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

周尔辉在伯父身边读书的时候，一直很简朴，生活上不大提出什么要求。后来，他曾经希望有一个小箱子装装自己的日用品。总理没有给他买，而是给他一个已经破成两瓣的旧箱子，让他修修再用，一直到这个箱子变成两片板，才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有一年，尔辉要到湖南去参加劳动锻炼，他又提出买一个箱子的宿愿。总理给他一个用土布缝成、便于放在驴背上的马搭子，并告诉他说：这是我在延安用过的，你拿去用吧，很方便呢！

1961年7月，周尔辉在北京结婚。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准备的礼物

很简单：一床周恩来用过的床单，一件周恩来穿过的短衬衫，一条周恩来穿过的裤子。周恩来笑着对他们说：“都是些旧的，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也没有请客，没有买新衣服，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穿着伯父周恩来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周尔辉心里很是惬意。

周尔辉没有辜负伯父的期望，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伯父给他的一条旧呢裤，他穿了多年，破了补，补了穿，一直到不能再补时，又拆开给小孩缝一条小裤子。一次，他们去看望伯父，孩子的呢裤被奶奶发现了，很惊讶，忙问：“小孩家怎么穿呢裤？”弄清原委后，两位老人都很开心，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啦！”这件事在淮安流传开了，人们把这条裤叫做“三代裤”。

周恩来常常告诫亲属：“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却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要特别慎重，不可轻率从事。永远不要搞特殊化，要说特殊的话，那只能是在工作上做出特殊的成绩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晚辈们的严格要求，使晚辈们受益匪浅。他们深切地感致“严”就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的最真切的“爱”，而不是经济上、生活上的琐事。所以，大家都愉快地接受，并相互转告，自觉地严格遵守。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秉德随丈夫支援三线，离开北京到了陕西，后来又回到贵州。在贵州大山里生活条件很艰苦，事事都需自己动手，她搓煤球，点火烧饭取暖，有一次差点儿被煤气熏死。她的几个弟弟妹妹也分别到延安和内蒙草原插队了。“多年来伯伯和七妈严格要求我们，让我们和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一样地生活和工作，这个教育现在发生作用了，这帮助我们渡过了艰难困顿，经受住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人找周秉德，包括她的至亲好友，希望通过她向周恩来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周秉德说：“其中有我爱人的姑姑沈谱，她的丈夫范长江还是伯伯介绍入党的呢！“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他当黑帮隔离起来了。姑姑想不通，写了一封信，让我交给伯伯，那时我正出差在北京，但是我不敢接这封信，我说：‘我从小到大，太知道伯伯了。我们有规矩，在家里不能办公事，无论为自己、为朋友还是为单位。如果通过我，伯伯会觉得走后门，他肯定不接受，只能帮倒忙。如果通过组织，他觉得应该解决，会抓紧解决的。’这件事后来被伯伯知道了，他说：‘嗯，看来你几十年的侄女没有白当。’需要伯伯保护的人太多了，他已经保护了许多人，但我的姐夫范长江，他却未能顾及得上。”

邓颖超在1986年6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这个侄子叫邓光弼，1948年在吉林市参加革命，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了近40年，1982年患病，1987年离休。邓光弼的老伴张国英说：“老邓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老实。结婚后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他有这门亲戚，后来还是我公公来，才点破了这层‘迷’”。

几十年来虽然邓颖超同志以及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屡次来信问有什么困难，但邓光弼同志和他的全家人从未提出过任何要求。其实这个家庭也和全国其他任何普通家庭一样，十年动乱中，他们也曾在艰难困苦中跋涉过。

1969年至1979年，邓光弼同志先后被下放到青沟和左家“五·七”干校。6个子女中有4名当过下乡知识青年，二女儿邓九萍在当时农安县棒柴

公社集体户当了8年知青，两次抽人名额都被顶掉。是全员最后抽回来的一个。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光弼一家也从未向有关部门提起什么。因为子女们牢记父亲定下的家规——到外边一律不许说是邓颖超家的亲戚。

邓光弼是个“老银行”，从50年代起就担任省人民银行货币流通科科长，在银行部门一直干到1987年离休。几十年来，他工作勤勤恳恳，对自己要求很严，对组织从不提任何过高要求，到现在邓光弼工资才122元。他几次去看邓颖超同志都是利用出差或开会的空闲时间，最后一次见到邓颖超同志是1986年公出去广州，恰逢邓颖超同志在广州疗养。

周恩来再三交待：周同宇职务的安排 要尽量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周恩来从不以权徇私情，他对平辈亲属的爱护之情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上的严格要求、鼓励和经济上的尽力接济上。

周总理是长兄，二弟恩博，1945年去世了；三弟恩寿就是秉德的父亲，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来在9岁那年丧母，从此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周恩来后来追随着哥哥到沈阳、天津读书，还进过黄埔军校，1927年他脱离政治转而经商。

解放战争时期，他利用商人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建国前夕，他被送进华北大学学习，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周恩来后来一直用“同宇”的名字，毕业后先分配到冶金部钢铁工业局，不久又转到内务部。周恩来对他唯一的亲弟弟工作的安排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周秉德说：“我一直不知道父亲在内务部做什么工作，后来还是内务部长曾山的儿媳妇告诉我，她的公公在聊天时说过，总理的弟弟刚调到部里时，总理曾再三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来我父亲胃溃疡，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休养，不能正常上班，伯伯就让他提前退休，并叮嘱内务部办手续。曾山没当回事，以为总理只是表个态，拖了一段也就忘了。但伯伯根本没忘，见了面就问，甚至提出批评：‘你再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不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大约在我父亲提前退休后，伯伯给我们每月的补助增加到200元。伯伯就是这样，宁可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也不让组织照顾。”

据今天能够了解到的，周总理有十多个舅舅和姨妈。除此之外，和他有过密切关系的姨外婆龚家，以及过继母亲陈氏的娘家，也都是大家庭。因此，周总理有许多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和表姐妹，其中有一些和他在童年时代有过很深的友谊。

1950年8月25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总理待他异常亲切，一见面就用亲昵而又风趣的语气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个‘上宾’呵！打扮得像个大少爷了！”

他叫万叙生，是总理十三舅万富之的长子。他比总理大6岁，是总理的表哥。

万叙生望着总理朴素而略显破旧的制服，听着表弟开玩笑的话，弄得有点面红耳赤，后悔自己“这一着”走错了。他尴尬地说：“不瞒你说，这套西服是东奔西跑借来的呢！我想，您当总理了，接见的都是重要人物，要是穿得太寒酸，怕给您丢脸呵……”

话没说完，总理已经亲切地给他“解围”说：“坐下、坐下！以后可别这样了。到我这儿来，就跟到家一样。兄弟们叙谈叙谈，可不能讲客套呵！”

中午，总理招待表哥吃了一餐炸酱面，虽然很简朴，那是他们小时候都喜欢吃的。亲切的谈话从餐桌上开始了。总理问起万叙生个人和家庭情况。万叙生讲着，总理耐心地听着，除了简短的插问，一点也不打断他的话，让他详尽倾吐了自己的心思。等他说完，总理递给他一个削好的苹果，说：过去，你不给日本人干，是爱国的，很好。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你怎么能不想干工作呢？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你看，全国在开劳模大会，劳动光荣呀！人家有的比你年龄大得多呢！按你的年纪，还可以为人民干15年……说着，伸出五个指头，又翻了两番。万叙生默默地倾听着，并向总理说：“那我能干些什么事呢？”总理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较职位，不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听完这番话后，万叙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勤勤恳恳地投入了街道居委会的工作，受到群众的信任和尊敬。

1962年，万叙生曾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他的女儿安排正式工作的要求。周总理委托办公室一位同志代写了一封回信，信上说：

“关于你要求解决四女的工作和前所在机关对你家庭照顾之事，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别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四女现在有临时工做，很好，要教育她不管参加什么劳动都一样，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工作，都是光荣的”。他的表侄女深为他这种克己奉公，不利用职权为晚辈搞特殊化的高尚行为所感动，为自己要父亲写那封信的举动感到内疚。当然，周总理对于表哥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还是作了适当的帮助。他随信寄去人民币60元，还寄去一些衣服，帮助表哥解决一些急需。

1964年2月，在一个积雪盈尺的清晨，万叙生在扫雪的时候突然昏倒了。他被诊断为心肌梗塞，万叙生苏醒后，挣扎着写了一封意气恳切的信：

翔宇表弟：

……叙生碌碌如常，毫无进展，所幸在为人民服务工作方面，未敢懈怠延误，也来犯过错误，所做工作均得各方面满意。至为遗憾的是，你要我为人民服务十五年，我才工作了十三年……

他死后，扬州市人民政府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万叙生的女儿写信向总理报告了经过。

总理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给扬州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并寄来150元，说：万叙生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是应该的。追悼会如果花了钱，就用这150元作补偿；如果没有花钱，可转给他的亲属使用。

在万叙生死后，人们传颂着他的先进事迹，并终于知道万叙生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的主要动力，来自周总理的鼓舞。

龚志如是周总理一位姨外婆家的表姐，和他在龚家家塾同窗攻读过的孩提之交。

1948年，龚志如失业了，1951年她在亲友们的鼓励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经历、处境和心情。但信发出以后，她后悔了。她想，也许这是不恰当的。

出乎意外的是，周总理很快写了回信，是亲笔。多么熟悉的字体，多么亲切的称呼，多么令人鼓舞的话语呀！

随信寄来了 50 万元旧人民币，说是略表对龚家过去支持他的谢意。至于工作，周总理安慰她说：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政府会量材录用的。这使她回忆起他童年时代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不询私情，但又入情入理，令人心服。

不久，她填写了一张失业人员的登记表，后来被分配在华东机关幼儿园工作。

1952 年秋的一天，有一位陌生的客人说，有个亲戚在门外要见见她。她跟出门后，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停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

“有位中央首长要见您，请吧！”当车子在一个院落停下后，她看到周总理和邓大姐从门里走出来迎她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多少年的心愿实现了，而她却感到窘迫起来。

“志如姐，”周总理像是看出了她的紧张，主动和邓颖超同志一块上来搀扶她，并用轻松和幽默的语气说：“你怎么比从前矮啦！”

这句话一下解除了龚志如的紧张，使她变得轻松自如了。

“总理好，邓大姐好……”龚志如想谢绝他们的搀扶，但没有办到。

“我们这是家庭聚会，你还叫我七弟；她比你小，叫弟妹……”总理和邓大姐扶着她进了客厅。

总理首先问到姨外婆和表舅龚荫荪，问到他们晚年的遭遇和后代的情况。

话题引到了童年。他们无拘无束地谈着童年的往事，总理侃侃而谈，津津有味，时而站起来用手势比划着过去的情景，时而爽朗地放声大笑。

他们一直谈到天晚。

晚饭是在一张小桌上吃的。只有四碟小菜，其中一个炒蛋是为客人加的，完全是家常便饭。

饭后，总理又问到龚志如的工作，问到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他几乎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来帮助他决定国家大事，幼儿教育也不放过。他称赞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劳动，鼓励龚志如为之献身。

晚饭后，龚志如主动向总理诉说自己的遭遇。在她整个哭诉个人身世的过程中，周总理默默地谛听着，不时用简短的插话安慰她：“那是旧社会呀！”

“也怪我以后没再帮助你呀！”尽管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眼见过比龚志如遭遇更曲折、下场更悲惨的同一代人，他仍然不能保持心情的平静。他认真地谛听着，思索着，而表情上却像一个宽厚的长辈待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那样，慢悠悠地削好一只苹果，放在她的面前，说：“不要太激动！吃罢！”并安慰她说：“现在不是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吗？很好嘛！”总理看她情绪平定以后，鼓励她说，人没有生而知之的。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时，他已经在进步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龚志如吃了一块苹果。这时，她感到如释重负，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话，向自己最希望见到的人倾吐出来了。她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竭力搜索着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忽然，她想到一件事，说：“总理，我有一件事不够忠诚老实……”

“什么？”总理突然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什么事呀，说说看。”

“我隐瞒了年龄——6 岁，现在怎么改呢？过去证书都这样填的！”

总理站起来哈哈大笑，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友好，说：“那是旧社会嘛，为了吃饭嘛！改过来不就行啦！”

龚志如感到轻松了。空气变得活跃起来，忽然，她叫着周总理的别名说：“翔——宇。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在宇宙飞翔了！飞机来，飞机去；中国，外国……多好呀！你没有辜负我父亲对你的希望……”

总理没有立即答话。他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涵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7亿人口的国家总理，和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幼儿园保育员之间，在对“自由”的理解上，有多大的差距呵！他笑了笑，说：“‘自由’吗？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到外国去，是代表国家呐，一举一动有人照像，一言一语有人录音，不能出一点差错……我看，论‘自由’嘛，还是你比我‘自由’！”

龚志如感到自己的话“走了边儿”，虽然总理是那样笑容可掬，丝毫没有奚落她、责备她的意思。

“我得好好学习呐！”志如说。

“我们都得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总理说。

夜深了。虽然总理是习惯于通宵工作的，但考虑到龚志如明早还要上班，主动提出要她回去休息，并答应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她。

从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胞弟、表哥、表姐的交往可以看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同这些平辈亲属有过亲密无间的手足情谊。几十年后，周恩来和他们从思想上、社会地位上的距离拉大了，而这种手足之情却愈加深厚。周恩来深感到身为长兄和先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他们进步。因此，他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有时是严厉的，但这中间包含着无比深厚的爱。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待侄儿侄女，像所有的慈父慈母一样在教导他们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正直无私的人的同时，也关心着他们的婚姻、家庭，祝愿他们幸福

侄女周秉德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伯父伯母对她的关怀。她说，从1957年开始，就有人给我介绍男朋友，先后两三个吧，都是留苏的学生。我记得介绍的第一个人，

七妈亲自带着我和他到陶然亭公园去玩。伯伯和七妈都喜欢陶然亭，那里长眠着他的战友高君宇和石评梅，高君宇还作过伯伯和七妈的“红娘”呢。给我介绍的第二个男朋友去过西花厅，伯伯和七妈见过他。伯伯拿出100元钱，让我俩和介绍人到四川饭店吃饭。七妈认真，她托人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了解对方的情况。当时正是夏天，她在北戴河休养。伯伯和七妈在北戴河有一幢房子，但他们从来不带我们去。这次却破了例，伯伯正好到北京办事，他叫我坐他的专列过去了，路上他告诉我七妈要和我谈谈那个男朋友。我去北戴河住了两个晚上，七妈说：“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你，大主意由你自己拿。”我听了以后觉得此人不大合适，这事就算了。在北戴河的两天过得很惬意，这是我与他们去北戴河唯一的一次。第三个朋友还是留苏生，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我记得那是春天，在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后院，七妈向我“交了底”，她说现在两党已经交恶，斗争情况复杂，她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关系。我很理智，当即表示与那个男朋友的交往不再继续下去了。七妈宽慰地说：“秉德顾全大局，能够理解我们。”

“我的婚姻大事拖延下来，直到我26岁时，我妈着急了，托伯伯的秘书

何谦帮忙。何谦同我很熟，我刚来北京时，吃住都是何谦安排的，他给我介绍了沈人骅。我们见了几次面，我觉得沈人骅为人很老实正派，有知识，印象不错。沈人骅的父亲沈谦是沈钧儒老先生的大公子，20年代的留德博士，民主人士，曾经作过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还当过西城区人民代表。中南海选区属西城，毛主席和伯伯都投过他的票呢！所以我和七妈一说，七妈马上表示：‘这家人的底细我们是了解的。’我和人骅结婚前去西花厅，同桌吃伍时，伯伯也很高兴，向人骅问长问短，还把七妈亲自拍摄的一幅20寸的庐山黑白风景照送给我们，这张照片伯伯很喜欢，一直放在客厅的柜子上。”

我们结婚是在“十一”，没有婚宴，只摆了个糖果流水席。伯伯、七妈国庆节最忙，我原来以为他们不会来了。没想到七妈夹着一大包礼物，兴冲冲地爬上三楼，她高兴地吃了我们的喜糖，还和我的公公婆婆亲切地拉起了家常。

1958年11月，在广州工作的侄媳蔡淑清来京开会，顺便来看望伯父、伯母。总理像对待小女儿一样，中饭特地为她加了一盘广东腊肠，不时亲切地说：“孩子，你吃！这是你们广东菜。”饭后又给她剥桔子吃。晚上，带她去看越剧《罗汉钱》。在会场，正巧遇到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理笑着向他们介绍说：“这是广东来的侄媳妇！广东媳妇！”在她心里，还有什么比这更温暖、更幸福的呢？！还是广州的这一对晚辈，闹了点家庭矛盾。无非是女同志要带孩子，家务事重一点；男同志强调工作忙，对爱人关心差一点；诸如此类吧，有点小小的“摩擦”。他们把正在发生的家庭矛盾写信告诉了伯父伯母，说是解决了，以免老人家分心。

而总理却把它当成一件道德教育的大事，郑重其事地加以处理，当邓颖超去广州的时候，总理委托她转达了三条意见（当然是两位老人家的共同意见）：一、作丈夫的要克服骄气，体贴妻子；二、作妻子的要克服娇气，关心丈夫；三、家务事要夫妇共同负担。这对夫妇照这三条去办，以后互敬互爱，关系越来越融洽。

1960年，蔡淑清产后体弱，又因拔牙出血过多，需要点药品滋补。再是他们的自行车被摔坏了，上下班受到影响。当时他们生活比较紧，一时筹不出钱来买药、买车子。他们写信告诉伯父伯母，希望得到一点帮助，很快有了回信，并寄来200元，作为买自行车用的。一辆自行车用不了200元，还有点多余的钱。伯母吩咐，从中抽出10元交黄嫂零用。

黄嫂是谁？她是带这位侄儿兄妹长大的一位老保姆，当时在他家安度晚年。抗日战争时期，总理和邓颖超听说过这位黄嫂，知道她是一个老诚忠厚的劳动妇女，所以解放后还经常间到她。黄嫂接到这10块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尽管10块钱数目不大，难得的是这分情谊呵！

周总理正正经经地向小外孙女“赔礼”：
“姥爷不好，姥爷是不好嘛！把娃娃头都给弄掉了……姥爷给你修起来，行吗？”

周总理的侄儿侄女们一有机会就想到总理家里坐一坐，和伯父伯母吃一顿饭，聊一聊天。每到这时，周总理和邓大姐总是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并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和他们共享天伦之乐，这时的西花厅笑

语哗哗，其乐融融。

一次，周总理的一个侄女和侄女婿探亲途中，路过北京顺道去看望总理，还带着个4岁的女儿。这是她第一次去看望伯伯。1938年，总理在武汉时见过这位侄女，那时她还是个婴儿。这时，在她走进总理住的庭院时，她有点紧张。伯母满面笑容地迎出来，那亲切的问话，使她的心顿时轻松起来。

总理抽空和侄女、侄女婿谈家常。他问侄女侄女婿的家庭情况，问他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至问到当地集市贸易的物价。总理是在拉家常，但也是在谈政治、谈经济……。

侄女婿受到了特殊款待。头一天中午吃米饭；第二天中午特意为他包了水饺，因为他是北方人。

晚上，伯母拿来一张票，征求这对青年夫妇的意见：“会场不准带小孩：你们只能去一个，留一个在家带孩子。你们商量一下：“谁去？”

“她去！”侄女婿毫不犹豫地回答。

“好！你是个好丈夫，能体贴妻子！”邓颖超表扬了他，把票递给他们。

大约是第二天中饭后吧。总理在一个房间里逗小外孙女玩。六七十岁的老人忽然返老还童了。他是那样和蔼，那么一本正经地作出种种儿童的姿态，跟孩子一起摆弄一个玩具娃娃。祖孙俩玩得很和谐。侄女在一边看着，怕孩子拖累了外祖父。总理玩得高兴，不当心，把娃娃的头碰掉了。孩子不高兴了。小嘴咕哦着，小手拍打着，抱怨：“姥爷不好！姥爷不好！把娃娃弄坏了……”

侄女儿要去“干预”。总理用目光制止了她。

总理正正经经地向小外孙女“赔礼”：“姥爷不好，姥爷是不好嘛！把娃娃头都给弄掉了……姥爷给你修起来，行吗？”

“好！”孩子终于不闹了。总理要人找来工具把玩具修好，又跟她玩了一阵，直到小外孙女玩得高高兴兴，他才去上班。

“万不要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

周恩来在处理淮安的故居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高尚品格，为世人传颂。

在江苏省淮安县城驸马巷和局巷相接的地方，有一所住宅，曾经挂着这样一块牌子：

“私人住宅，谢绝参观。”

这便是周恩来的旧居。牌子是当地政府按照周恩来嘱咐的意思挂上去的。

解放初期，这所宅院已年久失修，行将倒塌。淮安县委顺应故乡人民的愿望，对住宅进行了初步的维修。1952年，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今后再作维修，并询问了修缮经费的数目，然后用自己的工资作了偿付。

1953年，总理派警卫员护送在京的八老太回淮安。临行之前，交代他几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淮安县委把总理旧居处理掉。县委很理解总理的高尚品德和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但是，县委认为总理是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作为县委来说，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于是，没有遵照总理的嘱咐办。后来，又对西边宅院的3间堂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这件事终于传到了周恩来那里。1958年，当淮安县委副书记王汝祥去北京时，

周恩来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听说你们把房子翻修了？这不好！我不是一再给你们带信吗？我的房子不能修，坏了可以拆掉，砖头、木料可以盖工厂，我有权这样处理嘛！”

王汝祥回去时，周恩来又特地写了一封信请转给淮安县委：

汝祥同志并请转淮安县委：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埋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个人家事，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

周恩来

一九五八·六·二十九

两年以后，当总理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到旧居这件事。这一次就比较严肃了。总理说：“1958年王汝祥同志来，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作了多方面的解释。总理听完以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第二天，邓颖超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了话。她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最后，她还郑重其事地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你是党员，你们应该听他的正确意见嘛！”

刘秉衡回淮安以后，向县委如实汇报了总理的严肃嘱咐，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指示的精神了。经过慎重研究，县委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办公室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作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会见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桂云在无意中提到，尽管这样，还是经常不断有人来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不安地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郑重嘱咐孙桂云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但是，前来瞻仰总理旧居的人，还是愈来愈多。这情况终于被总理完全了解了。他很不安。他决定采取行政手段，实现“不

留痕迹”的夙愿，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973年11月13日晚9时，淮安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国务院办公厅一位负责同志要县委书记接电话。正在值班的一位县委副书记连忙去听。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同志说：“总理听到反映，要动员住在他家的居民搬家，还准备修整房子，准备开放让人参观。请县委调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向国务院办公厅汇报。”

14日，县委派一位常委去旧居了解情况，总理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整修过房屋；自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厅如实汇报了情况。

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又来电话，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

-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 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 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常委正式作了研究，并根据总理指示作了三项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并在当晚向国务院办公厅作了汇报。

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厅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隔了5天，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医院作了第一次手术。两个月后，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桂云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总理思索了一下，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在场的邓颖超表示支持，并说：“拆迁吧，我们给钱。”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好决定。”总理点点头。最后，他嘱咐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桂云会心地点点头。她充分理解伯伯的意思。家里只挂毛主席的画像，从来不挂总理的照片，连全家的生活合影像，也被置之高阁了。

**“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
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

周恩来和邓颖超带头平祖坟的事迹，受到淮安和全国人民的称颂。

早在1953年春：周恩来派人护送八老大回淮安时，交代的任务之一就是平掉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1958年淮安县委副书记王汝祥去北京，周恩来又提出平祖坟的事，在给淮安县委的信中，还专门就此事谈了意见。1960年淮安县委刘秉衡来北京时，周恩来又郑重地提出平祖坟的问题。但是，每一次把总理的意见拿到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一致认为：遵照总理的意见做，不但群众通不过，党员通不过，就是县委也想不通；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一点坟地？不能平！挨批评也心甘情愿。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说服大家把在淮安的祖坟平掉，扩大耕地的同时，1958年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日战争时期葬在那里的周劭纲（周恩来的生

父)、杨振德(邓颖超的生母),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有的深埋,有的迁葬,让地面重新种上庄稼。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旧社会是一个小公务员,生前曾为革命作过有益的工作。1942年因病在重庆去世。全国解放后,重庆市委把他的棺木葬到烈士公墓。周恩来知道后,要求立即迁出。重庆市委考虑到周劭纲生前曾做过有益革命的工作,既然已经葬入公墓,就没有再迁出。后来总理派专人专程前往重庆,监督把他父亲的棺木从公墓迁出,迁葬到一个荒僻的小山腰上,没有树立墓碑。

1965年春节前的一个黄昏,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萃准备趁假期回淮安探望母亲,特来拜访伯父母。周恩来嘱咐说: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带动全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随时随地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拥政爱民,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到这里,他问尔萃: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尔萃爽快回答:一切行动听指挥!周恩来笑了笑,说:那好!我现在布置你一个“特殊任务”,你可得好好执行。这次回去,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生产队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能完成任务吗?尔萃想到伯伯处理七爷(周劭纲)葬地的决心,因此果断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点点头,接着说:我们国家耕地面积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作好你母亲的工作,作好县委的工作,作好当地群众的工作。他又强调: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坟地交生产队集体使用;坟地长的树木交生产队绿化。

尔萃在春节前回到淮安。头一件事,先把伯伯交下的“特殊任务”告诉哥哥嫂嫂。哥哥周尔辉、嫂嫂孙桂云都是党员。三个人统一了意见,一起去妈妈的工作。妈妈听了没表态。赞成嘛,想不通;反对嘛,是总理的嘱咐。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众远到近,讲科学与迷信,说政治和生产,终于把妈妈说通了:“那就照伯伯嘱咐的办吧……。”

第二天,尔萃去淮安县委,向值班常委作了汇报,并要求县委派人一同去生产队处理。值班常委耐心听完汇报,沉吟一会儿说:“你休息一下,我找在家的常委碰一下。”在家的书记、常委都来了。又重新听取了尔萃的详细汇报。尔萃把总理交代的话,讲的道理,原原本本向县委讲了一遍。而且提到总理派人到重庆处理父亲墓地的细节,最后他说:总理是派我专程来处理这件事的。县委的心情总理充分理解。希望县委充分尊重总理的意见。县委书记和常委们经过研究,深深为总理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决定按总理的意愿办。他们派干部协助尔萃去城郊做好群众工作。

周家祖坟座落在城郊公社闸口五队,占地不足1亩。这里有7座坟墓,埋有13口棺木,葬有周总理的祖父母、过继父母和八婶母等人的遗骨。前些年,淮安城镇机关人员在这里栽了几百棵松树,长得十分茂盛,远远望去,纵横成行,一片青翠。

1965年春节前两天,闸口五队喇叭里突然传来大队的通知,要社员们集中到队部,执行县委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任务是把周恩来家的祖坟全部就地平掉,所有棺材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什么?平总理祖坟?!”上了年纪的魏金成、李正东等老汉瞪起眼睛,胡子都抖了起来,“这是谁的主意?!”“是周总理自己的嘱咐。”大队干部回答说。正当大伙议论纷纷时,周恩来的侄媳孙桂云走到人群前。她告诉大家,总理说,我们周家祖坟在闸口大队

这许多年，得到了你们的爱护，感谢大家。但是国家耕地太少。人死了，不能做事，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次尔萃从北京回来时，总理亲自向他交代了这项“特殊任务”。有人说：如今没人迷信风水了。不过，就当它是个绿化区，保留下来有什么不好？有的干部说：不论多少增产指标，我们包啦，保证超额完成，我们要保留这块坟地。要说扩大面积，我们想办法开荒，多种点十边地，还顶不了这么几分田？经过大家长时间的宣传解释，群众思想有点通了，但是，“对是对，就是心里不过意！”有位老农泪汪汪地说：“论风水，那是骗人的迷信话，我们在旧社会还没吃够这个亏！论耕地，我们淮安县这么大，差这一点地？总理还不是给我们带个头，叫我们跟他学嘛！——我原来打算今天去圆坟哩，不圆啦！将来也平掉！”

群众思想工作做通后，旧历除夕，尔萃、尔辉、桂云和县委一位干部来到闸口五队，会同大小队有关干部和30几名青壮劳力，带着工具，一起走向坟地。“动手吧！”队长一声号令，大家开始执行这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殊任务”。冰冻的土地，很难挖。大家你一镐，我一锹，一座座坟墓终于被掘开，一口口棺木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出来。用人抬或用土吊车吊上来。然后，每个墓穴就地深挖，又将棺木按原位沉下，深埋一米以下，用土填平。翠绿的小松树分别移至城镇机关和生产队绿化用地处。

旧历除夕下午完成这件事后，尔萃立即向总理写信，详细报告处理经过，周恩来很满意，几天后，又给生产队寄来70元，用来支付平坟劳力的工资，偿付被践踏的一小片麦苗费。

在这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几经周折，又把远在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处理祖坟的事迹，很快传遍了故乡。当时，由于人们认识水平不同，对这件事的意义理解也不同。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在生死丧葬问题上开一代新风，为万世楷模。

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留下这样的嘱咐：
希望他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
要到北京来……如果一定要来北京，应该
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逝者最留恋的是自己的亲人，最关切的也是自己的亲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对晚辈亲属的挚爱，谆谆教诲的又是什么呢？

周恩来在1972年发现患了癌症，仍然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直拖到1974年6月才住院治疗。此时侄女周秉德随丈夫所在的部队从三线调回了北京。周秉德回忆说：“伯伯住院的前一天，邀我去西花厅，和他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伯伯把他和七妈分别在大寨拍的彩色照片送给我，说：‘以后见面少了，明天我要住院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还挺高兴：‘伯伯，你能下决心住院看病，太不容易了，这回可要好好休息一阵子了。’”

“第二年的5月25日，伯伯从医院回了一趟家，七妈亲自给我打电后，我赶紧去了西花厅。一进门就看到伯伯很高兴地坐在客厅里，秘书们闻讯都

来了，围着他说说笑笑。临走时我要求和伯伯照张相，伯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你跟我照相，这么多秘书怎么办？下次再照好不好？’我当然不再坚持，哪知失去了这次机会，永远无法弥补。”

周秉德讲到此处热泪盈眶：“后来我想去医院看伯伯，一直不准。七妈说，这是政治局的决定，除了她以外任何亲属都不可以去。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一个两个星期去一次西花厅陪陪七妈，和她一起吃顿晚饭，到晚上八点半她该动身去伯伯那儿了，我也要赶末班车回远在西郊的空军学院的家。我坐她的车从中南海出来，娘俩在府右街北口分手，她的车往东驶向305医院，我向西走到103无轨电车站。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大约好几个月吧，都是这样度过的。”

周秉德说：“在那些无法和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话，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作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当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他惦念着我的两个孩子，谆谆告诫我，不要把他们养娇了，他说，只有大草原、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1976年1月8日，周秉建突然接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谜一样的电文是：“见报勿回。”她很纳闷。第二天早晨，她听到电台在哀乐声中广播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她悲痛已极，立即给北京打了长途电话。但是，伯母劝她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颖超明确地说，这也是她伯伯的意见。每当其他同志不幸逝世后，周恩来总是尽心竭力使他们的亲属得到慰藉。但是，他对自己却要求十分严格。作为一国的总理，让亲属在他逝世后参加葬礼，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留下这样的嘱咐：希望他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地悼念他。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1976年1月11日下午，参加总理吊唁活动的晚辈们，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邓颖超传达总理对他们的遗言：不要搞特殊化。千万记住，不要因为是亲属，而在革命征途上搞特殊化！

1月15日下午，邓颖超又专门把周恩来的亲属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

系，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在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

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识才·用才·惜才

周恩来少年时代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时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东渡日本，西赴法德，他给一位同学留下了“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充分认识到知识和人才对于建设新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从而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富强，以满腔的热情，诚挚的友谊和崇高的风格，广泛地团结和吸引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人才。关心他们的进步，为他们创造尽可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悉心解决他们的困难，解救他们的危难……周恩来和邓颖超无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许许多多的知音和挚友。

“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

深谋远虑的周恩来在领导残酷军事斗争的同时，早在构思未来建设新中国的宏图大业。他从中国建设的需要着眼，留心识别、吸引和团结尽可能多的科学技术人才。抗日战争初期，由周恩来实际领导和郭沫若具体负责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就聚集了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后来蒋介石惧怕第三厅日益扩大的影响，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第三厅全体人员因此愤而辞职。周恩来找蒋介石当面交涉，迫使他不得不允许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领导。周恩来利用这块阵地，为教育、吸引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个组织的委员、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包容了诸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舒舍予（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邓初民，自然科学家卢于道等知识界人物。

1939年春，周恩来指示潘梓年组织成立了“自然科学家座谈会”。林学家梁希、心理学家潘薪菽、农学家金善保、气象学家涂长望等20多人参加，大多是当时知名学者、教授。1941年，周恩来提出要以参加座谈会的知识界进步朋友为核心，成立公开的科学团体，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同年冬，由座谈会的知识界发起建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倡议，得到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宏隽、丁燮林、严济慈等100多人热烈响应，共同列为科协发起人。1945年7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是为我国科技上一大创举。

1943年在林学家梁希60寿辰之际，周恩来在祝酒时深情地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这是党的钱，党今天有力量来照顾大家
免遭意外牺牲……拿上钱，立即就地隐蔽。
不拿钱，你今天就不能出这门！”

“皖南事变”前后，重庆的局势一度紧张。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尽一切可能来解救和保护进步的知识分子。

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作家曹靖华在当时已受到了敌人的监视。一天，他的同事悄悄告诉他，“八路军办事处有急事找你，赶紧去吧！”曹靖华立即

赶到办事处，周恩来见了他开口就说：“你上哪去了，一连几天找不到你……”接着，告诉曹靖华：现在局势紧迫，水陆交通要道都已被控制，已经走不出去了，要赶紧设法就地隐蔽，脱离险境。

周恩来交代完，又深情地说：“近年来，咱们的人牺牲得够惨了，连一个也不能再牺牲了！”周恩来临危不惧、严肃镇定的神态和他那充满深情的话语，立即感染了曹靖华，使他有了一种安全感、温暖感。曹靖华还没来得及答话，手里就被周恩来塞进一包东西。“这是一包钱，带上赶快设法吧！”

听了周恩来的这句话，曹靖华思潮翻滚，无比激动。周恩来曾经从国民党血淋淋的屠刀下挽救了他的生命，又在此时危难关头作了如此周详的安排。这种情如骨肉的关切爱护，使曹靖华感动得一时只字难吐。他勉强镇静了一下，说：“决然按照党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就地隐蔽。但是，这钱我不能拿。党在政治上如此关切，我永志不忘，物质上我不能再连累党。况且，当前党正处在被国民党封锁的极端艰难时间，敌后咱们的游击队甚至连粥也喝不上，党正需要钱，我不忍拿……”

没等他说完，周恩来就正颜厉色地批评他说：“你这是典型的旧读书人的洁癖。当然，世上所谓洁身自好，在某种情况下，不同流合污，是一个人的风骨，是好的。可是要知道，这是党的钱；党今天有力量来照顾大家免遭意外牺牲。你应该首先从政治上着眼，立即抛弃旧读书人的洁癖，决不能因小失大。否则，因为经济上受限制，一遇关键时刻，行动不便，遭到意外，大大值不得！闲话少说，局势紧迫，拿上钱，立即就地隐蔽。不拿钱，你今天就不能出这门！”

曹靖华听了，一颗心几乎要蹦出来了。他无比感激地注视着周恩来，接着紧抱着钱回转身，离开了办事处。

就是这样，周恩来用紧紧的握手和有力的援助，驱散了当时雾重庆的寒气，温暖了进步的文艺界知识分子朋友的心，也给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一段令人赞叹不已的佳话。

“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
必须给以支持”

1941年，是马寅初60大寿，我党和重庆各界民主人士，为了造成一个援救马寅初出狱的声势，于3月20日在重庆大学举行了遥祝马老60寿辰的大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特为大会送来了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赠送的寿联，《新华日报》社也送了寿幛。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送的寿联是这样写的：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新华日报》社送的寿幛写的是：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言敢怒见精神

这寿联和寿幛，给身陷囹圄的马寅初、营救马老的民主人士及重庆大学师生莫大的鼓舞。

在周恩来的多方面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942年8月，将马寅初从集中营放回重庆歌乐山马寅初的家中软禁。直到1944

年冬，国民党当局才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人的人身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密令重庆大学当局，将马寅初解聘，其它院校也不得延聘，还密令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不准刊登马寅初的文章。

当马寅初在政治上、生活上陷于困境时，周恩来代表党向马寅初伸出了救援之手。他一再强调：“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学者，必须给以支持。”并决定《新华日报》刊登马寅初写的文章。从此，马寅初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一步步走上民主革命阵线，成为一位享有盛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马寅初患了癌症，但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手术后又活了整整10年，使他有幸看到“四人帮”垮台；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他的政治名誉也得到了恢复，使这位百岁老人再逢盛世。

**李公朴、闻一多遇难后，周恩来曾发誓：
“决不使我敬重多年的朋友白白地死去”**

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1936年与沈钧儒等一起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获释后，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周恩来对李公朴先生十分敬重。

1946年2月10日，李公朴在重庆较场口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时，和郭沫若等60余人被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了。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到会场营救，随即又赶到医院，探望他和郭沫若等受伤的各界人士。后来，周恩来、邓颖超等又携带中共代表团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慰问信及鲜花等，再次去医院慰问。

较场口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又不畏国民党特务的装有手枪子弹的匿名信的恐吓，亲自找到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但是，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竟用无声手枪将李公朴杀害于昆明。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正是深夜，周恩来正在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开会。他闻讯痛心地掉下了热泪。

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1943年以后，也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周恩来对闻先生同样十分敬重。

闻一多听说李公朴牺牲后，拍案而起，在云南大学主持李先生治丧委员会大会时，面对台下戒备森严的特务，慷慨陈词：“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这天下午，闻一多去“民主周刊”社开会，在返回的路上，特务们向他下了毒手，闻先生头部和腹部都中了子弹。在李公朴牺牲之后仅仅4天，闻先生为反抗强暴，争取民主，驱逐黑暗，迎接光明，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噩耗传出，群情激愤。毛泽东和朱德从延安来电吊唁。消息传到南京时，周恩来正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厅里同一个外国记者谈话。他义愤填膺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当天晚上，他对叶剑英说：“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死，决不会化为过眼烟云，这将一定会使爱国者的眼睛更清楚地看清敌人的本质。”“我发誓不使我敬重多年的朋友白白地死去。”当时，叶剑英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同志面色苍白，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而痛哭。

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代表团向闻一多夫人发出唁电，痛言：“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

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7月17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尖锐指出：政治暗杀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急迫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其严重性、急迫性仅次于已从局部向全面发展的内战。我们不能忍受，我们要控诉。他向记者们呼吁：希望用诸位的笔、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天蟾舞台（今劳动剧场）举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大会。邓颖超在大会上宣读了由周恩来亲笔写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两先生精神不死。

当邓颖超念到：“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时，台下报以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接着，邓颖超每念一句，就有一次热烈的鼓掌。周恩来字字血泪、句句仇恨的悼词，深深地打动了与会者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整个会场充满了愤怒的激流。

两天后，10月6日，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

**如果说李四光是我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那么扶起这面旗帜的人就是周恩来**

被称为“大地之子”的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两次见到过周恩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告诉李四光，使他感到了无比的兴奋，他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从1948年出席伦敦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英国。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热切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9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听到了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毅然拒绝随蒋迁台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决定返回祖国。

为了能使李四光顺利回国，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给当时的驻捷克大使吴文焘和驻苏大使王稼祥写了一封亲笔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周恩来特地指示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然而，却因李四光旅途困顿，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李四光刚一到北京，就听说周总理早就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深感到自己的为祖国奉献学识的理想就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于是顾不得旅途劳累，马上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请几位与他回来的同志找材料，查情况，找有关人员商议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四光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一把攥住了李四光的手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

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呀！

李四光完全没有想到，周总理会亲自来看望他。他紧紧地握着周总理，热切地说：“你比前几年胖了。”

周恩来两手在胸前一抱，开朗地笑着说：“我听说，你回国来心脏病又犯了。这可要抓紧时间，请医生看看。这和在重庆那会儿不同了。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医院啰。”

李四光向周恩来谈了我国地质工作的问题，和他的想法。周恩来认真地听李四光讲完，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当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到台湾去了，那是一种传言，我们是不信的。我说我了解他，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回来晚了一定是路上有什么困难耽搁了。你看我说得不错吧？”周恩来说完又笑了。

李四光听了周总理的这番话，感动极了：周总理是这样信任自己啊！他本想向周总理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集中精力搞地质的研究工作，此时觉得这个请求再也说出口了。

李四光对周恩来说：“可惜过去搞地质的人太少了。旧中国顶多有 200 多个，有的还因生活无法维持改了行。”

周恩来说：“是啊，蒋介石摧残科学家，压迫知识分子，有些有本事的人，也被他们糟蹋了。我们要先把这些专业人员集中起来，把队伍整顿一下，你看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来当一段时间的主任，等到条件成熟了，再成立地质部？总之，我们要尽快地开展工作，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时钟敲过了 8 点，长安街上已是华灯闪烁。周恩来这才起身告辞。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1957 年初，李四光患肾脏病，组织上送他到杭州疗养。3 月的一天，阳光温暖，春风宜人。吃完早饭，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到院子里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开来，停在山坡下面的竹林旁边。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车来，顺着小路登上山坡，健步向他们的住地走来。啊，是周总理！李四光喜出望外，快步迎了上去。

“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李四光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周恩来是趁着陪外宾到杭州参观的机会抽空来看望李四光的。两人就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他问李四光自己对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些什么想法？他诚恳地对李四光说，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又说，入党是自愿的，要李四光好好地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和他所在单位地质部以及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这次谈话不久，李四光就因病住进了医院，李四光的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以后，周恩来曾几次到医院去看望他。第三次看望他的时候，周恩来在病榻边又一次谈到了他的入党问题。李四光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

临走时，周恩来请李四光考虑是否请董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董老对他了解得很清楚的。

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终于光荣入党。他说：“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我活了70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震情和震后应采取的措施，很多与会者认为我国预报地震很困难，当周恩来听了李四光简短、明确的发言后，非常高兴地说：“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决心，有这样的志气！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载，我们就要给我们的后人留下预报的记录。”从此，李四光投入了探索地震预测的工作。

60年代后期有段时间，北京周围地区小震活动很频繁，有人向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晨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要求国务院通知全市居民都搬出去住，并建议毛主席也搬到帐篷里去睡。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信任李四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不发临震预报。使人民群众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正当我国地震地质工作陆续取得一些进展，可望有所突破的时候，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周恩来对李四光的逝世感到非常沉痛。他指示把李四光遗留的科研成果资料整理出来。

5月2日，周恩来冒着霏霏细雨，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李四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得知没有为李四光准备悼词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站在麦克风前，对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早上我收到李四光女儿的一封信，刚才和一些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就用这封信作为悼词。他从口袋里拿出信，十分沉痛地念了起来。这封信记述了李四光逝世前一天的遗言，记述了近几年他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以及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念完信后，走到李四光夫人面前，握着她的手说，“许大姐，你要节哀，要保重身体。”他走到李四光的秘书面前嘱咐道：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他又问在场的人，“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现在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来到李四光家，表示慰问，并再次转达了周恩来一定要把李四光遗著整理出来的意见。后来，李四光的遗著《地质力学概论》等陆续整理出版。

对李四光，周恩来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他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如果说李四光是科学界的一面旗帜，那么扶起这面旗帜的人就是周恩来。

“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要迅速医治战争疮伤，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当时百事待举，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亲自为新中国设计蓝图和集聚人才。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远在异国他乡的钱学森怀着思乡报国的赤子之心和对新中国的向往，迫切要求返回祖国。当时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火箭专家。他曾经发表了“时速一万公里的火箭已经成为可能”的火箭理论，一鸣惊人，成为世界新闻人物。这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

教授，曾经直接参与研制美国的第一枚导弹，以文职人员身份获得美国上校军衔。这样一位杰出的洲际弹道专家要求回到祖国效力，遭到美国五角大楼的百般阻挠和。无理拒绝，甚至声称：“他的威力抵得上5个师”；“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此，从1950年钱学森提出回国申请时起，他就被美国非法软禁起来。在困境中，钱学森向祖国伸出了求援之手。

1955年6月的一天，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陈其通，收到了钱学森辗转寄来的信。陈其通对这位热爱祖国，由于申请回国已被软禁达5年之久的科学家的来信，心情激动；他知道这封信的分量，立即转呈到周恩来手中。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新中国是多么需要，又多么难得啊！周恩来很快作出部署，亲自指示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中国按照法律程序，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希望美国也会有相应的表示！”首先掌握了主动权。随后，王炳南向美方递交了一份在美华人侨民名单，要求美方尽快取消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无理扣留。起初，美方还想抵赖，说什么钱学森“不愿回国”。我方亮出钱的信件，予以驳斥，美方不得已解除对钱学森5年的禁令，准其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偕同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乘船离美返国。

多年之后，周恩来在谈到持续15年之久的日内瓦会谈时说：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像华罗庚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保护”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丧心病狂地迫害知识分子。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就是其中之一。

当浩劫的风暴袭来时，周恩来看到了许多科学家被残酷地批斗，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朋友独支危局，毫不考虑个人的艰难处境，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在知识分子中间受到一致的拥护。他多次明确指出：“像华罗庚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保护。”当他得知科技大学要批斗华罗庚时，立即通知国务院要求科大的上级出面，说服劝止并及时纠正。有一天，华罗庚的办公室的数学手稿被盗了，罪犯非常狡猾，连一个指纹也没留下。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指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周恩来还提议说，华罗庚的身体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往外地了，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在北京，试验他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以前封存的华罗庚的文物，也要查清有无被盗的痕迹，并要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当时，“四人帮”正在野蛮地摧残知识分子，周恩来总理的这些指示保障了华罗庚的安全，并为他提供了较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周恩来不仅坚决保护华罗庚的安全，而且十分珍惜他的科研成果。对华罗庚创造的现代化管理方法——“统筹法”和现代化实验方法——“优选法”，加以积极的培育和切实的推行。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及各省、市、自治区认真地组织落实。从此，华罗庚饱含着爱国热情和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带领

他的“双法”小分队，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不懈地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应用“双法”，在生产实践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当周恩来得知他们取得了很大成绩时，又指示国务院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周恩来给予的保护和支持，赢得了华罗庚衷心的爱戴。华罗庚忘不了自己早年曾浮沉海外，是周恩来总理为他指明了正确航向，帮他回国；忘不了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周总理的一片心血。如今，当自己处于困境之时，又是敬爱的周总理伸出了援助之手挡住了狂风恶浪，这怎能不使他万分感激呢？

“华侨的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

1940年初，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起号召南洋各地筹赈会选派代表，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全国抗日军民。慰劳团于3月26日到达重庆。在机场安排的临时茶会上，有很多记者问陈嘉庚到重庆陪都慰问视察后，还想到哪里？他胸有成竹，坦率答复：我和慰问团这次回国慰问考察不单是在重庆，而是全国有关省和战区，只要交通方便，包括延安在内我们都要去。

陈嘉庚在新加坡就听人讲述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绩，并且细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因此希望能早日和他们见面。过了几天，叶剑英来看陈嘉庚，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热诚欢迎，并说会派车子到西安等待他。还说怕山区气候有变化，特送来三件皮衣。陈嘉庚表示感谢。叶剑英又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诸同志很诚恳地请先生到办事处参加茶话会。陈嘉庚欣然接受。

到了约定之日，叶剑英和林伯渠、邓颖超准时来接。陈嘉庚见到邓颖超亲迎很是感动。

慰问团在重庆慰问考察结束后，又分三个团（华中团、西北团、东南团）分赴各地慰问。陈嘉庚率西北团，一行于5月25日到达西安。周恩来从延安去重庆正好路过西安，他已知道慰问团在西安，很想见一见。后来，因故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7月17日，67岁高龄的陈嘉庚在完成了延安之行后，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他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心里感到十分畅快，同时盼望回重庆后，能与周恩来会面，并时时流露出这种热切心情。

7月20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人员给嘉陵宾馆打来电话，言词十分恳切，询问陈嘉庚有没有时间，说周恩来准备明天登门拜访，陈嘉庚得知后十分兴奋。他将其他活动作了安排，怀着敬仰之情，等待周恩来到来。

21日早饭过后，周恩来乘车来到嘉陵宾馆，陈嘉庚早已在门前等候。互致问候之后，陈嘉庚将周恩来请入卧室细谈。

周恩来说：“5月间听说陈先生要去延安，我们很高兴。我以为会在延安相见。我5月底出来经西安，才知慰劳团已到西安。总司令也路过西安，那次与慰劳团约见未成，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很对不起。”陈嘉庚也代表一团对两次失约表示抱歉。周恩来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三大主张。国共合作，这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磨擦，这是不会得逞的。有人要阻止我们在西安会面，但今天我们不是在重庆会面了吗？”接着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国内抗战的胜利

形势，指出了团结抗日的光明前途，并对海外侨胞提出了许多殷切的希望。会谈中陈嘉庚还问及前月白崇禧与参政会参政员在调解两党磨擦的谈判之事。周恩来说英日矛盾，英宣布封锁滇缅公路，对我抗战不利，因此国民党中央受各方人士批评，两党谈判才有了进步。近日将回延安与毛。朱商谈决定。陈嘉庚表示高兴并问所议条件。周恩来回答，重要事项，前日已用无线电商妥各项条件，日内印好送一份请您看看。之后陈嘉庚倾述海外侨胞的心声说：“七·七事变后，中共随即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并派周先生与蒋介石谈判，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此侨胞非常关心、拥护。我们这次回国，也是希望国共两党竭诚合作，共赴国难，带领全民族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周恩来听后频频点头，十分赞许。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周恩来因有事，来不及吃午饭就告辞了。他与慰劳团成员一一握手话别。6天后他带着广大侨胞的深情厚谊离开山城，乘飞机又一次返回延安。这是周恩来和陈嘉庚的第一次会见。

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嘉庚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到印尼避难，一直到日本投降才返回新加坡。为此福建旅渝同乡会等十团体于1945年11月8日召开了500人的“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向大会的祝轴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轴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诤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到此时为止，周恩来和陈嘉庚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都在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奋斗，他们互相敬重和关怀，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1949年，毛泽东电请陈嘉庚回国共商国是。陈嘉庚经香港乘船北上，于6月4日到达北平。7日晚周恩来到北京饭店来接陈嘉庚到香山见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毛泽东说：“全国基本解放了，我们要成立新政协，请您来参加。”陈嘉庚说：“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接受。”周恩来说：“华侨的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翻译嘛！”大家亲切地交换意见直到深夜，终于打消了陈嘉庚的顾虑。

周恩来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少休息，但仍精力充沛。有人说他是铁打的。陈嘉庚说他是钢的，并且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陈嘉庚1950年回国定居后，遇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函告周恩来或毛泽东，他把全部资产都献给了国家，并要把晚年的余热献给他创办的厦大、集美学校以及家乡的建设；他在香港、厦门、上海的集友银行的资产是集美学校的校产，但学校是消费单位恐难以维持下去，只得靠国家。周恩来十分尊重陈嘉庚的意见，随指示这三家银行不收归国有，仍作为集美学校的校产，国家要给以保护和维持。在陈嘉庚病重时，他常到病床前探望。当他见到陈嘉庚的遗言时曾说过，关于台湾问题请他不要挂心，祖国的完整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一定努力实现；关于集美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至于陈嘉庚的后事我们一定按照他的意愿办，请他放心。

“鞠躬尽瘁”和“老而弥坚”

著名老作家谢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先生是周恩来、邓颖超的朋友。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关心和想念他们。谢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先生调进中央民族学院以后，有一次周恩来召集统战部和民委系统的几个负责人谈西藏工作。谈话结束时，邓颖超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专门交待当时的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刘春，你是管民委、民院工作的，你给我捎句话给谢冰心。很久没有见到了，近况怎么样？你替我问候她。”

几天以后，刘春又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在繁忙中突然问刘春：“你看见谢冰心没有？”

刘春先是一愣，接着马上回答，“看见了，我向她转达了您和邓大姐的问候。”

他没想到总理对邓大姐前几天的嘱咐记得这样清楚。他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这样感叹说：“周总理和邓大姐是常常想着老朋友的，他们交待的事都不是顺便说说的！”

冰心老人每次回忆周恩来和她的几次谈话，都深情地说：

“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啊！总理的谈话总是恳挚而又亲切。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时，总理就恳切地谈自己的家庭出身，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1952年，冰心夫妇从日本回国后的一个仲夏夜晚，周恩来约他们作了一次长谈。汽车把冰心夫妇接进夜色如画的中南海，直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门前停住。

周恩来笑容满面地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啊！”

听了这话，冰心夫妇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得到亲人的爱抚，悲喜交集。

落座以后，周恩来又极其详尽地问到他们在国外的情况。在总理面前，他们毫无拘束感，欢喜而尽情地同周恩来述说了他们的一切经历，一直谈到午夜。

依依告别的时候，周恩来一直热情地把他们送到车旁，他仰望星空，感慨地对冰心说：“时光过得多快呀，从‘五四’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冰心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谈话，是1972年的秋天。那天，冰心应邀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正在厅外休息。周恩来从里面出来正好看见她，就请她进里面坐，并边进边说：“喝杯茶谈谈。”

周恩来指着大厅墙上挂着的一幅延安风景画问：“去过延安没有？”

“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一次延安。”周恩来笑问：“你多大年纪了？”

“我都72岁了！”

“我比你还大两岁呢。”周恩来爽朗地笑了。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大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啊！”

冰心万万也没想到，“鞠躬尽瘁”这四个字是总理在病痛折磨下的赠言。

1987年5月的北京，一场夜雨过后，天气分外凉爽，空气格外清新。5月23日上午，已是87岁高龄、但仍在辛勤笔耕的老作家谢冰心正在伏案写作，忽然接到电话，传来邓颖超要来看望她的消息。

这真是意外的喜讯，却也令冰心老人深感不安。

她想，邓颖超也已年逾 80，又辛苦操劳着国家大事，她的时间那么宝贵，工作那么繁忙，怎么可以让她来看我呢？

她正在思忖的当儿，邓颖超已经来到。一听说邓大姐到了，冰心赶忙扶着助步器在门口迎候，并一再对正在上楼的邓大姐说：“慢点，慢点！”

邓大姐一行走进冰心幽雅、安适的客厅，秘书赵伟说：“今天上午，大姐同往年一样，是来看月季花的。她见您没有来，听说您在家，说一定得来看看您。”因为去年这个时候，邓大姐和谢冰心两位老人曾愉快地相会在月季丛中。

今天，邓大姐又带来一只鲜花盛开的月季花篮，送给冰心。

冰心非常感动。几天前，邓大姐特意让秘书将她家院里开放的芍药采撷了一束送给冰心。冰心提起这事，邓大姐反而表示歉意他说：“前几天给您送花，我忙的连封信都没来得及写。我知道您非常爱花……”

冰心说：“诺，这不，我把那束您家院里开的芍药献给周总理了。”

这是冰心多年来的习惯，她总是要把自己喜爱的鲜花献给终生难忘的周恩来总理——用她那只典雅的花瓶，摆在总理的遗像面前。

邓颖超听了，缓缓站起身，移步来到总理遗像前，默默地沉思良久。

在场的冰心一家人也都陷入深情的怀念中……

过了片刻，冰心告诉邓大姐，她今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花？腿脚不灵了是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她正在赶写一篇文章——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要出版的一本《中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写序言。她说，她本来想在匆匆地看过几十篇作文后写点感想就交稿，没有想到竟把这篇序言写得很长：因为在她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仿佛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她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时代。她说，那时候她对每一个学生都有很深的感情，所以，现在读到这些作文时无形中看得很细，也批得很多。拿起笔来一直写下去，就自然地写得这么长了。

邓大姐高兴地频频点头，诚挚地说：“好！好！您老而弥坚！老而弥坚！并说，您今年比去年健康得多，结实，气色好。我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你的照片后说，冰心没老，一片冰心还在玉壶。”

大姐的一席话，使在场的人都笑了。

邓大姐又对冰心说：“您是个乐观者。我想您大概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和小读者在一起。您的《寄小读者》，我在 20 年代在北京当小学教师时就拜读过。一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冰心说：“那已经是从前的事了。您那么忙，还跑来看我，我真过意不去。”

两位老人热烈而又亲切地交谈着；谈花、谈写文章、谈往事、谈家常、谈对子女的教育……时间不知不觉已近中午。冰心和家人留邓大姐吃饭，大姐说：“我们今天是突然来，下次来吃饭，早一天通知你。”

冰心说：“今天我们事先不知道你来。早知道就好了。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邓大姐说：“我怕惊动你。”

分别时，两位老人紧紧握手，互相祝福。邓大姐临下楼时，还直念叨说：“千言万语说不完，以后再说，咱们下回再叙。”

冰心手扶助步器，久久地站立楼道口，一直目送邓颖超同志走下楼，走出楼门口，乘车而去。她回转身走进客厅时，突然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又

是月季芬芳时，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次会见！

是芬芳的月季散发出了花香？

是亲切的话语犹在耳畔？

她期待着和邓颖超再次会见，再次叙谈。

**当老舍决定以死抗争时说：“总理
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事业的发展，他同文艺家们像朋友，像兄长，丝毫没有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味道。这几乎是所有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文学艺术家们的共同感受。著名作家老舍和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更是令人感动。

在6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为答谢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成功地为邓颖超做了一次手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宴请林大夫和她的助手，同时邀请他们的老朋友老舍和夫人胡絮青女士作陪。席间，胡絮青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团扇上画的是一大朵工笔重彩的牡丹，老舍在团扇上题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传看着，都说花画得好，字写得好。这次小聚后不久，老舍和胡絮青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并肩而立，微笑着，很有神采。特别令老舍和胡絮青夫妇感动的是，照片上的邓大姐手中正好拿着那把团扇。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显然，这是他们特地拍摄送给老舍夫妇的照片。

1954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老舍夫妇、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席间，大家谈的主要是文艺的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

在另一个夏日黄昏，在西花厅外，周恩来设宴主请陈毅，请老舍夫妇作陪。周恩来说陈毅家里人口多，开销大，嘴上“亏了些”，得请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古筝演奏家溥雪斋老先生，席间，傅先生乘兴弹奏一曲。整个宴会情趣高雅，热情洋溢。

被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了几次之后，老舍夫妇深深感到：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是找机会使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在朋友中间，象普通人那样去交际。如果得到了他人的恩惠或帮助，他也会重情重义地款待他人，有时，兴致来了还可以露一手烹调“绝活”，为大家助兴；他关注人家，当人家有什么难题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的要求需要鼓励的时候，他都会援手相助。或者，干脆就为了和朋友见见面，谈谈天，听听音乐，叙叙旧，互相的信赖就在心中潜移默化地在彼此间扎根了。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强，他把与人交往中的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的人际交往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多才多艺。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是共同的兴趣的关系、工作关系，还有亲密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他连报自己岁数都爱这么说：“我和老舍、郑振铎、王统照同庚。”

老舍常说：“总理又给我出题了！”

往往，这题便引出一部大型话剧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老舍提出来想去新疆石河子地区体验生活。话音未落，周总理就说：“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老舍瞪了总理一眼，笑道：“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老舍写的话剧，周总理几乎全都看过，不仅看，还参与修改，有的甚至从头到尾都直接参加创作。在关键时刻，还为作者撑腰，使几出最重要的话剧得以公演。没有周恩来的慧眼卓识，包括著名的《龙须沟》和《茶馆》在内的重要剧目，恐怕就是另一番命运了。

《龙须沟》剧本写出之后，“人艺”有两大顾虑，一是“青艺”刚上演《保尔·柯察津》，当时演外国戏很“热”，成为一种时髦；也是正值抗美援朝，上演《龙须沟》怕脱离当时的大背景。周总理明确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演《龙须沟》也是结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果然，《龙须沟》上演后受到人民欢迎，风靡全国，老舍也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总理还推荐给毛主席看。《龙须沟》成为毛主席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在话剧《茶馆》彩排时，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意见，如“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周总理再一次站出来说话，充分肯定《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看看旧社会是多么可怕。

看了《茶馆》的排演之后，周恩来和导演、演员座谈时也谈了他的意见：他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像老舍那样选择清末，民国初年……那样几个历史时期来描写，他认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是“五四”运动、1927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他坦诚地谈完自己的意见后，又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讲不清楚。”

周恩来就是这样善解人意，又懂得尊重人。他完全是平等地与人相处，当谈的是个人意见时，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对老舍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都是和周恩来有密切相关的。

1938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由谁来担任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老舍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老舍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

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合的大好形势，说“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提议，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老舍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是他特意保留的唯一的一封书信。

这两次最重要的召唤，均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周恩来的的确确是老舍的引路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当老舍已下决心以死来与不公正、和对他人格的侮辱抗争时，他一再对夫人胡絮青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这句话后面蕴含着多少祈望和信念啊！在一切一切都破灭后，他怀着这个唯一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于1966年8月24日深夜投入了太平湖。

老舍的突死，使总理大为震惊和悲愤。

据老舍夫人胡絮青女士回忆：

1966年8月24日上午，老舍离家出走后，“造反派”向我要人，还到顶棚的检查孔里去搜查，以为我把舍予藏了起来。我马上预感到事情的严重，第一个念头就是向总理求救。

我想，有一次舍予生病，吐了点血，我自己买了点药，让他歇了几天，而没有报告。事后，总理来家看望舍予，见了我，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以后不要自作主张，要送医院，要直接向我报告！”

想起这个叮嘱，我悄悄地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总理转递报告，请他帮助把舍予找到。

25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在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实际上，当天上午已经找到他，在湖水中。

一切都完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总理。

一个偶然的时机使我知道了：总理在舍予死后，为舍予，为我，还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我的惊讶，我的感动，我的感激，简直无法形容。

大致半年多之后，我在锣鼓巷等车，突然发现王昆仑先生由我面前经过，他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问我：“总理的秘书去看过你吗？”

我茫然不知所答。

于是，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总理得机会碰见了王昆仑，问他知道老舍死了吗？王说知道。又问，知道是怎么死的吗？王答知道一些。总理说：“那好，我们以后单独谈。”接着总理便求王昆仑代表他去胡絮青处看看，一是代表总理向她表示慰问，二是看看她的近况，回来向他报告。王昆仑当即表示有难处，建议总理还是叫周荣鑫去吧。总理没有勉强王昆仑。过了几天，夜晚，总理约王昆仑到总理住地长谈。

总理听了王昆仑的叙说，还追问了许多细节。这一夜，他们谈得很久，直到深夜。

听了王昆仑谈的这一切，我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没有、任何人来过我的家。我当时很孤独。孩子们纷纷被揪斗，回不了家。我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的老婆，没有人敢理我。我的孤独似乎是注定命该如此的。

当天夜里，我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感谢他还想着我，也向他报告：我还活着。

舍予去世5天之后，周总理亲自签发了关于保护干部的电文，他自己拟就了要保护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同样是在五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

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舍予的血和死，还有同期死去的许多善良的人们的悲剧，换来了那份保护名单和那篇社论，代价可谓大矣。然而首先想到这个代价的，当时仅总理一人。舍于是第一个沉死太平湖的人，继他之后，据说，在那可怕的8月末，达到了上百人。假设没有那五天之后的电文和社论，说不定沉湖的人会多于水中的鱼。

在以后的日子里，像蝉脱壳，每隔一段时间，我周围的禁锢便被剥去一层。首先解冻的是舍予的稿费存款，银行奉命对我说，这笔款子可以由我和子女自由支配了。我明显地感到：是总理那只巨手在悄悄地拨动着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声色。

1978年8月，北京市和全国的文艺界朋友们举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老舍骨灰安放仪式。那天，邓颖超来得特别早，她紧紧握着胡絮青的手，对她说：“假如恩来还活着，他今天会第一个来！”老舍夫人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在孤寂了10年之后，终于感到老舍的祈望已经如愿了。

邓颖超说：总理生前经常提到老舍的名字，他十分想念老舍。她还说：她今天也是故意提前来的，为的是也代表恩来出席老舍的追悼会。是替他来行礼的。

周恩来和老舍这对多年的朋友在极其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离死别。老舍在无助中走上了绝路，怎么不使周恩来难过。在周总理去世之前，在北海的湖畔，郑重地祭奠过老舍——面对与吞没过老舍的太平湖水同源的北海，倾吐了深藏他心中的怀念和悲愤之情。

那也是一个8月24日，总理重病，在北海里养病，医护人员陪同他在湖边散步。他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突然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方紧张地思索，不得要领，回答说不知道。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然后，总理又问：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对方回答说：“有所耳闻，但不详细……”

“我知道！”总理口气很坚定地说。“我详细地讲给你听。”

也许，这些话在他心中憋得太久太久，已经到了不吐不成的地步。

也许，他是见景生情，看见了湖水，想和他死去的老友做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也许，他想起了武汉，想起了重庆，想起了第一次文代会，想起了《龙须沟》，想起了《茶馆》，想起了《春华秋实》……

也许他为老舍感到惋惜，他知道老舍还能写，还有《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还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还有可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

也许，也许……

这一切的也许、遗憾与悲哀都溶进了北海的湖水中，假使老舍在湖中有灵的话，也会深感欣慰的。

这湖畔的独白式的解说纯粹是周恩来式的。它不仅为巨人的风格描绘了最后的一笔，而且也为周恩来——老舍的友谊写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恩来与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有着深厚情谊，周恩来称曹禺是“老同学”。对此，曹禺解释说，“那是总理的谦虚，实际上我们是先后同学，先后在同一剧团里演过戏罢了。”原来，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担任了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同时，在新剧中扮演角色。1925年，曹禺进入了南开中学，这位15岁的中学生也加入了南开新剧团，自此，他便踏上了为中国的话剧事业奉献毕生的道路。曹禺当时并不认识周恩来，但对周恩来的关于戏剧的主张和对这个新剧团的贡献，是有所了解的。

1942年，周恩来邀请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的进步作家曹禺到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作客。此后，曹禺就成了周恩来的常客。二人志趣相同，经常在一起长谈，谈思想、谈创作、谈生活……多年后，曹禺回忆这段时光时说：“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里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看到周总理亲切的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

“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在重庆期间，曹禺曾向周恩来提出想去延安，离开国民党统治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恩来晓之以理，循循善诱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在他的教导下，曹禺表示：“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

有一次，周恩来特意邀曹禺一起去看望南开学校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曹禺回忆道：“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用许多事实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曹禺说：“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周总理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他又说：“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来，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

1945年秋天，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重庆文化界20多位知名人士，在上清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把曹禺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紧紧握着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这是曹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经历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曹禺深受鼓舞，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充满向往。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禺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解放后创作的第一部戏《明朗的天》，于1954年底上演。除夕之夜，周恩来来到北京剧场，在曹禺陪同下观剧。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到舞台上与演员握手，合影留念。大家围住他，都想听他的讲话。突然，周恩来风趣地说：“今天是除夕，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一句话，引起一阵笑声，人们簇拥着周恩来去到观众休息室。

周恩来请大家都坐下，面带笑容对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点情况，这个除夕也就没白过。大家谈谈吧！”

周恩来对剧团的情况，从男女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到剧院能否企业化等等，一一作了询问。大家敞开来谈了团里存在的各种问题。周恩来最后对曹禺说：“你是院长，你要能自我批评，也敢于批评别人。要起个带头作用。过去做的不够，可以赶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长的，自从1952年到现在，3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报告，总是没空去，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了。后来下定决心去了一趟，报告就是3个钟头，批评了我自己，也批评了别人，也谈到了思想问题，就很有作用。你在剧院的时间，总比我在外交部的时间要多吧？”

曹禺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

周恩来说：“我希望你的检查报告放出一些光彩来。告诉我，我要来听的。”座谈会结束以后，周恩来走出观众休息室，来到院子里，又对曹禺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演员、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10天，我等着。”他边说边伸着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十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恩来走到自己的小汽车旁，仍然回过身来对曹禺说：“老同学，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事后，曹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作了检查报告，但是考虑到周总理的工作太忙，时间宝贵，没有请他来听，为此，曹禺一直深深地感到内疚和懊悔。

1962年2月17日，是曹禺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召集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鲜明地指出了当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的迷信”，并且认为这是繁荣文艺创作的最大障碍。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多次提到曹禺。他说：

“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一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周恩来举曹禺和他的作品为例，意在说明“新的迷信”对作家的才华，对作品的创作的扼杀，是一种危害极大的错误倾向。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的迷信”所造成的影响是极为痛心的。

同时，周恩来又深切地嘱咐曹禺：“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他接着说：“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恩来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那么，对于这一切曹禺又是怎么看的呢？曹禺事后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

面对“新的迷信”倍感困惑的剧作家们听了周恩来的讲话豁然开朗，放弃了许多思想包袱，明确了反映生活，合乎时代是衡量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准。

1966年7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的曹禺，陪同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代表们在武汉参观。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正在酝酿。回到北京后，“红色恐怖”已经弥漫全城。

12月的一个寒冷的深夜。

在一阵急促而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闯进铁狮子胡同3号曹禺的家。

曹禺从睡梦中醒来，真真地感到是大祸临头了。

“红卫兵”喝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

在茫茫的黑夜中，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小礼堂。那里没有开灯，所有被“揪出来”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

曹禺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次日清晨，天渐渐亮起来。

曹禺偷偷地侧着脸看看屋子里的人，当他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的时候，惊呆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焦急，连夜进行干预，责令“造反派”立即放人。

曹禺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恶梦。

夫人方瑞一夜也没有合眼，见到曹禺后热泪盈眶。曹禺也又惊又喜地看着方瑞。

事隔多年，曹禺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自己。

“真正有硬功夫而又有正义感”的 美术大师徐悲鸿

周恩来与徐悲鸿的相识，要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1919年，徐悲鸿为了吸取西方绘画的优秀技法到了欧洲。翌年，周恩来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借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也来到欧洲。他们先后旅居巴黎。1924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巴黎公社墙前凭吊巴黎公社死难的英雄，恰好与正在那里写生的徐悲鸿相逢。为祖国、为人民的同志志向，使他们成为朋友，并在公社社员墙前合影留念。后来，他们先后回国，都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一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祖国的东北三省很快沦入日寇之手。这激起徐悲鸿强烈的义愤。他借题画猫诗讽刺说：“颠预最上策，浑沌贵天成，生小嬉憨恣，安危不动心。”他在为人民控诉、为国家呼吁的正义感驱使下，开始构思《倭我后》等巨幅油画，抒发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愤慨和人民对光明的向往。徐逝世后，周恩来曾亲自讲解过这幅不朽的杰作，强调主题是反映人民在暴虐的统治下，渴望得到解放。

1936年，徐悲鸿因愤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卖国，在蒋介石“50诞辰”之际，公然拒绝为蒋画像，他说：“我的兴趣在抗日救国，假如抗日民众要我画像，我将不甚荣幸！”他声称：“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蔑视蒋介石，并借所谓“新生活运动”，斥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在旧中国，像徐悲鸿这样一位崇尚艺术，追求真理，仗义执言的美术家，是不能见容于反动当局的

抗战初期，国共再度合作。周恩来分管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曾拟聘徐悲鸿负责绘画木刻方面的工作。在田汉的邀请下，徐来到武汉，却遭到国民党的冷遇。徐拂袖而去。同田汉等人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组织进步学生到抗日前线作战地写生。他高度赞扬解放区的木刻艺术。他还创作了象征人民坚韧不拔意志的巨幅国画《愚公移山》。

徐悲鸿思想进步，靠近共产党；党对他也十分关心。周恩来听说徐悲鸿因为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的劳累，陷于贫病交加的境地时，特地托郭沫若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来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看望徐悲鸿，使徐悲鸿深受感动。

坎坷的艺术生涯，严酷的现实，使徐悲鸿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愈来愈无法忍受。他和廖静文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呼吁当局及早实行民主，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挽救中国的危机，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312人签名的消息和“进言”，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徐悲鸿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一再威胁仍坚持说：“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拒绝撤回自己的签名。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底，周恩来在北京中山公园徐悲鸿遗作展览会上，看到徐悲鸿生前书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在重庆时，徐悲鸿就有着这种精神！”并嘱咐身边陪同参观的徐夫人，出版徐悲鸿画集时，要将这幅对联印在前面。

1946年7月，徐悲鸿离开重庆北上，途经上海，在郭沫若寓所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说：“徐先生，我们算是老朋友了，你

还记得 1924 年在巴黎……” “记得，记得。”意外的重逢使他们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他们畅谈了别后各自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周恩来得知徐悲鸿此行是去接办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恳切地说：“好啊！应当去。徐先生，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徐悲鸿深深地点头。后来，他在给吴作人的信里谈到这次与周恩来相会的情景时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

徐到任后，表示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他把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将“艺术至上”的牌子挂在校门口。以保护进步师生。他坚决保护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进步师生，拒绝国民党当局指令开除进步教授高庄、李宗津、冯法祀等人，掩护进步学生，并协同把一些进步师生转移到解放区去。

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后，北平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当局妄图把一批美术和音乐界的人才和艺专设备掠走，强令北平艺专南迁。我地下党转达我党挽留徐悲鸿，请他阻止学校南迁，保护校产，迎接北平解放的希望。不久，田汉到北平秘密会晤徐悲鸿，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和要求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的嘱托。徐深受鼓舞，此后在拒绝南迁等一系列活动中，更加坚毅和果断。

不久，北平处于兵临城下之势。傅作义先生邀请北平一些社会名流，听取“战”与“和”的对策。经历半小时的冷场之后，徐悲鸿第一个发言，冒险劝谏傅先生打消对蒋介石的幻想，为了保存北平古都文化和人民免遭涂炭，顾全大局，顺从民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从各个方面给予徐悲鸿以极大的关怀和信任。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对徐悲鸿说：“北平解放了，但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地方还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并充满感情他说：“你要为祖国，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好好地保重身体啊！”

1949年3月；徐悲鸿受周恩来委派，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参加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后，周恩来又亲自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意气风发，壮志弥坚，把全部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和教育工作之中。

1951年春末，徐悲鸿为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巨幅油画到山东导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返京后不久便因突发性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指示，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尽最大努力进行抢救。中央人民医院的院长钟惠澜先生亲自担任了医疗小组组长。夜里，周恩来打电话给钟惠澜先生，询问徐悲鸿的治疗情况。他还委托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到医院探望，并嘱咐他给徐悲鸿送去一束生气盎然的鲜花。当徐悲鸿得知这束鲜花是周恩来送他的时，一行热泪顺着脸颊缓缓而下。以后，周恩来又委托郭沫若多次到医院探望徐悲鸿。

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徐悲鸿在中南海又拜会了周恩来，他们谈得十分融洽、和谐。徐悲鸿从美术界的情况，谈到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谈到了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周恩来注视着徐悲鸿，极认真地听着，不时微笑着点头。他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

更加丰富。”徐悲鸿起身告辞时，周恩来又反复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并挽扶他上了汽车。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徐悲鸿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为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间休息时，周恩来与徐悲鸿又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担心徐悲鸿虚弱的身体支持不了，劝他提早回去休息，徐悲鸿没有同意。会后，徐悲鸿又赶往国际俱乐部参加欢迎波兰代表团的晚会，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脑溢血症复发。徐悲鸿再次被送往医院。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马上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亲自组织抢救。然而，由于病情过重，9月26日清晨2时52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去了，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的朋友。当天下午，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京医院，向徐悲鸿的遗体告别。在徐悲鸿的遗体旁，他仁立了许久……他沉痛地对在场的人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他让同来的文化部领导人周扬，亲自守候徐悲鸿的遗体入殓。尔后，他又问准备从徐悲鸿头上翻制面模的雕塑技术工人：“有没有把握翻好？”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嘱咐这个工人一定要小心仔细。

后来，周恩来谈到徐悲鸿是“真正有点硬功夫，而又有正义感”的大师，多次称赞徐悲鸿在政治上过得硬，是站得出来的，在艺术上能融合中西，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技法的范例。他表示“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这样，能很好地保护徐悲鸿为祖国留下的艺术珍品”。

在徐悲鸿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以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建成了。周恩来题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表达了他对徐悲鸿的尊重和怀念。

1967年，因北京地铁施工，徐悲鸿故居纪念馆被拆除。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哪里还谈得上恢复。徐夫人廖静文不忍看到悲鸿遗作失散和损坏，1973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复建悲鸿纪念馆的迫切心情。又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新馆终于建成了。为此，周恩来曾亲笔给廖静文写信，派专人与她洽商。后来，周恩来在病榻上多次询问复建悲鸿纪念馆一事办得怎么样了。这些反映了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祖国艺术事业的关注，对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视，也体现了周恩来和徐悲鸿的深情厚谊。

周恩来郑重地对齐白石的家属说：

“老人是国家的人瑞”

1948年解放前夕，北平一片惊慌混乱。当时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又听到一些谣言，说什么共产党进城后将按名单杀人，而齐白石就在名单上。对这些谣言，齐白石虽然淡然置之，但时局动荡，前景未卜，因而心中感到茫然。

一天，黎锦熙来看白石老人。黎锦熙是白石老人的同乡好友。他特意来告诉齐白石说：“不要怕，周恩来先生来信问您好哩！”齐白石惊疑地问：“你说谁？周恩来？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谈判能手吗？”

黎锦熙说：“对！就是那个周恩来。他不单谈判内行，搞军事、经济、文化艺术也很内行。就是他让我代他问您好呢！”

至此，齐白石虽然还未见过周恩来，但是已经听到了周恩来对他的关怀

问候。

1953年，周恩来特意为齐白石在中南海怀仁堂庆祝了90大寿。他走到白石老人身旁，俯下身来亲切地说：“衷心地祝贺您90岁寿辰。祝您健康长寿。”白石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异常兴奋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太不敢当了。”

“您是人民杰出的艺术家，您为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周恩来亲切地说，“您得到这份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除了询问了白石老人的身体、生活和创作情况外，还特别亲切地嘱咐道：“听说老人家近来画兴很浓，画了很多题材新颖的作品。解放后生活安定，没有顾虑，愿意为人民为祖国多作一些贡献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是90高龄的人了，今后要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还风趣地说：“我还等着为您做百岁大寿呢！”

此外，周恩来除了命当时的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彻底修缮了齐白石的住房外，还委托文化部全国美术家协会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修饰一新后作为齐白石的住宅。齐白石感慨万端地说：“我多么希望能活到120岁，多给人民贡献点薄艺，于心才安。”

1956年4月，齐白石荣获1955年度世界国际和平奖金。9月1日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会议大厅，联合举办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的仪式。授奖仪式十分隆重、盛大，各方代表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周恩来郑重地赶到会场，握着老人的手，向老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齐白石在雨儿胡同住久了，很想念家人，生活上也感到有些孤独，就想找周恩来说明此意后再搬回原来的家住。他和两个儿子驱车到中南海找周恩来，正值周恩来外出开会，老人有些失望，总理办公室秘书告诉老人：“请各位稍等一下，总理开完了会就回来。”

果然，周恩来接到电话；会一开完立即赶回来，一进门就朝老人走过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让您老人家久等了，忙着开会，又离不开。”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把站起来的白石老人扶着坐下，“请老人家坐下来，请坐，本来我要去您那儿的。”

“接着，周恩来又与白石老人的两个儿子握手后便坐在老人身边拉起家常来。

周恩来留齐白石父子吃午饭，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没有约定，只好请你们这些‘不速之客’吃面条了。”周恩来亲自给白石老人和他的儿子先后端上面条，还对老人风趣地说：“今天我们只好同甘共苦了。”

吃着面条，周恩来突然想起了什么，低吟道：“不独老萍知此味。”稍一停顿，又拉长了语调诵道：“先人三代咬其根。”大家一听，便大笑起来。这是白石老人40年代画过的白菜上的题诗。齐白石万没想到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这幅画，而且这么多年还能朗朗上口地低吟慢唱，内心感动不已。

饭后，周恩来亲自用车把老人送回原家。家里人深感过意不去，便端来一盘新鲜的大苹果。周恩来马上削了一个递给白石老人，老人摇摇手，风趣地说：“请客人先用。您也是‘不速之客’。我们没得准备，对不住，对不

住。”

周恩来一听，边吃边笑地说：“今天款待我苹果，满不错嘛，比您过去‘寒夜客来茶当酒’好多了。”老人听了又笑得前仰后合。这句诗原来是白石老人30年代画的一张画的题名。这又使老人在笑后感到惊奇，这幅许多人连看都没看到的画，身为总理的周恩来时隔数十年，还记得这样清楚，而且此时此地用得恰到好处，使老人倍感亲切。

临走时，周恩来郑重地叮嘱家属们说：“老人是国家的人，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又说：“你们不但要好好照顾老人，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然后弯下腰，亲切地拉着老人的手说：“告辞了，老先生，请多保重，我还会来看您老人家的。”又说：“您今天想回跨车胡同，我送您来，明日想要到雨儿胡同去，我再接您去。有事打个电话，我就来。”

白石老人见周恩来执意要走，便让家人搀扶着送到大门口仍依依不舍。他活了90多岁，见过中外多少达官要人，但象周恩来这样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质朴无华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白石老人回到室内，仍然激动不已，便禁不住低吟了一首诗：“暮年逢盛世，搭帮好总理，老骥珍伏枥，报国志千里……”

张瑞芳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
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敬爱的周总理

在一个春雪后初次放晴的星期日，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来到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一个松柏浓荫的角落，这里埋葬着她的母亲——廉维同志。张瑞芳仁立在母亲的墓前，注视着母亲身着黑呢列宁装的遗照和书写着六个潇洒俊逸的金字“廉维同志之墓”的白玉石墓碑，神情肃穆，心潮涌动……

张瑞芳曾经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敬爱的周总理。

张瑞芳的母亲，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齐参加抗日战争，在年过半百时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她曾被敌人打得右眼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1943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她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对张瑞芳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张瑞芳的母亲是1960年7月22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71岁。张瑞芳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葬礼。中央商业部为廉维同志安排了后事，落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廉维同志生前的老领导及友好彭真和张洁清；姚依林和周彬；吴波和邱力，曾双双前来吊唁。张瑜芳万万没有想到，在葬礼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张瑞芳：“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依林同志才知道！”

听到周总理的声音，张瑞芳如同见到亲人，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回答：“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老人家告别呀！”张瑞芳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赶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沉默地等了一会儿说：“你要多加保重啊！”张瑞芳强忍悲痛，

勉强说出：“谢谢您，总理……”“那好……再见吧！”周总理轻轻放下电话。

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张瑞芳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激动。大家议论的结果，主张由张瑞芳给周总理写一封信，请求周总理为母亲写墓碑，永留纪念。

总理：

我明天一清早就要飞回上海了。

我的母亲，在她健康最好的时候突然逝世，使我们感到特别伤心。根据她这一时期的身体情况，我们以为她还可以再活十几年的。

不过她的一生，也可算是没什么遗憾了。她中年之后参加革命，能在老年看到革命的辉煌胜利，共产主义的远景也不算远了。

她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直到逝世前，她每天都抓紧时事和政治学习，并不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当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将成立时，她因为没有更早的把自己最后的一处小房子交给公家而认真地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尽管她的视力已非常不好。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和改造的精神，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学习的榜样。

她生前对您和小超大姐非常敬爱，我每次转达您们的问候时，她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我知道，我们及早通知您，您会到她的灵前来告别的，但我们想还是晚一点告诉您的好。希望您能原谅。

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

您的题字定会是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

请您题字时不要署名。请写好后交给张枏和王拓均可。

此致

敬礼

瑞芳敬上

1960.7.26

不久，周总理通知王拓（张瑞芳同志的姐夫，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周总理的住所——西花厅去。他让王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的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就这样，张瑞芳同志的母亲得到了周总理亲笔题写墓碑的殊荣。周总理对人做事都这样认真，体现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

60年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刚刚纠正了共产风，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喘过一口气来，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横扫一切”的矛头实质是对着谁？这一切使张瑞芳困惑不解。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张瑞芳参加了电影《大河奔流》的拍摄。同时被选为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8月，张瑞芳从开封的外景地赶到北京开会。邓颖超在驻地接见了她。

这是周总理逝世后，张瑞芳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奔过去拥抱她，心中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落座之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张瑞芳全家每个成员的情况。张瑞芳说：我们全家人都受到冲击，但是还没有人经不起考验，大家都健在。目前除陈荒煤（张瑞芳的妹夫，1978年才恢复工作）外都重新

工作了。

邓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娘的墓还在吧？”

张瑞芳回答说：“还在！”她又补充说：“我来北影拍《大河奔流》，参加过几次在八宝山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我特地转到墓地看过了。”

邓大姐说：“哦……那是因为在八宝山，并且恩来没有署名。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的墓，因为恩来署了名，并且葬在万安公墓就被砸掉了。”邓大姐说得很平静，张瑞芳却震惊万分，她突然明白了“四人帮”的矛头所向……

张瑞芳说

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在重庆地下党时期的组织关系是在周总理手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逼着我交代所谓叛徒和特务的罪行，并一再启发威胁说：你应当越不敢想的越应当想下去，你应当交出爆炸性的问题……我被隔离审查两年零一个月……

我明白了——我的哥哥张伯绍，抗战胜利前是国民党炮兵营长，是周总理亲自和他谈话，并且完成我母亲的心愿，安排我的母亲从延安秘密到重庆和儿子相见，使他坚决投身于解放军，参加了平津战役。以后并在抗美援朝中任十九兵团炮兵主任，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他念念不忘周总理对他的教导，而“文化大革命”中偏偏为此把他定为暗藏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得几乎丧生……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活着，就凭她是北伐军炮兵将领的遗孀，就难逃“四人帮”罗织的罪名。他们会说：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到解放区去受苦，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从一滴海水可照见大海，从我们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懂得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我又从我们一家人都能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深深感到周总理平日言传身教带给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但小超大姐的这一句询问，也使我感到特别心酸！由

此我可以想象出，周总理在最后10年里，他过着怎样忍辱负重的艰难岁月……

“如果还要找，你就说：总理让我休息”

周总理、邓大姐对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的关怀，使她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她记得在一次由周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上，最后是常香玉的节目。演出完了，常香玉正在卸妆，一位同志急匆匆地跑来喊她：“你赶快，赶快，总理看完节目没有走，在池子等你。”常香玉顾不得擦去脉上的油彩，披上衣服，跟上就走。到场子一看，观众都走了，只有总理没有走。几位演员围着他。总理见常香玉来了，便亲切地问她：“我听你的嗓子有点疲劳，是不是来京后，他们找你演戏太多了？”常香玉说：“怪我自己注意不够。”总理说：“要注意休息一下，嗓子不能过于疲劳。再有人找你演戏，你就说我的嗓子有点疲劳。如果还要找，你就说：总理让我休息。”

1959年，常香玉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较长。当地医院仔细作过多次检查，最后确诊：癌。组织上通知她：立即准备上北京治疗。几个小时后，一位同志就陪她上了火车。

到达北京的当天，常香玉就被送进了肿瘤医院。医院院长、著名肿瘤专

家吴恒兴亲自为她治疗。一切进行得这样顺利，是她根本没有料想到的。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她刚刚做过手术，邓大姐就到医院来看她。大姐亲切地对她说：“总理听说你病了，他很关心，特别叫我来看看你。大姐向医护人员仔细了解了常香玉的病情。听说手术情况良好，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大姐安慰常香玉要安心治病，不要着急，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她。常香玉激动他说：“谢谢总理，谢谢大姐，我一定好好治病，决不辜负总理的期望。”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常香玉不久就康复了。她回想起1940年，当时她18岁，得了胸脓肿，截了两根肋骨，当时住不起医院，就住在洛阳郊外的一所破庙“关帝塚”。三伏天，伤口生了蛆，奄奄一息，无人过问。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常香玉重新奔波各地，为人民演出。人们从她嘹亮的歌声和出色的表演里，感觉到了一种新的色彩，新的内在的力量。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次，常香玉来北京开会，遇到我军著名的女将军李贞。李贞大姐笑着问她：“总理救了你一命，你知道不知道？”常香玉怎么能不知道呢？没有全国的解放，作为一个普通演员的她，现在不知道已经成了怎样的下场！没有周总理的关怀爱护，“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又不知会把她吹落何方？……她不假思索地对李贞说：“那当然……”李贞见她还蒙在鼓里，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1959年你患癌症那次，是总理发的话，限定时间，要求急速送你来北京治疗……”

常香玉这才恍然大悟。

周恩来和邓颖超还记得一二十年 未曾见过面的普通干部的名字

1959年9月的一个傍晚，剧作家舒强和妻子熊焰在北海公园散步，坐在北海北岸的一个小饭馆门外休息。小饭馆很简陋，竹子扎的篱笆围成一个小院，院里放着几张竹桌，几把竹凳。

公园里游人已经很少了。舒强夫妇静静地坐着，看着初秋天空变幻的晚霞，忽然发现走来两个人，其中一位是那么的熟悉，等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总理和一位工作人员。总理首先喊了声：“熊焰同志，你好呀！”熊焰连忙恭恭敬敬他说：“总理好！”舒强问：“这么晚了，您还来……”总理说：“我们刚刚去看了一场足球赛，来吃点东西。”“您那么忙，还看球赛，不太累了么？”总理笑笑说：“我看球赛就是休息呀！”接着总理邀请舒强夫妇一起进饭馆吃饭。他一边吃，一边了解剧院的情况。

回到家里，舒强夫妇都感到非常奇怪。熊焰与总理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41年初从重庆搭车去延安，那天是总理帮她爬上车的。以后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周末舞会上，总理邀她跳舞，还问起她：“熊焰同志，舒强同志来延安以后好么？身体怎么样？”那次，时隔4年，总理还记得她的名字，记得舒强夫妇的关系。这次又过了十五六年，总理一见面又叫出熊焰的名字来！

邓颖超也是这样。熊焰1941年和邓大姐见过面，以后多少年一直没有接触过，可是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的晚上，在中南海党中央的宴会上，舒强和邓大姐坐在一桌，她问舒强：“熊焰同志好么？”又过了十三四年，1963年，邓颖超看话剧《三人行》，临走时，舒强送她上车，她又说：“代我向熊焰

问好。”回到家后，舒强夫妇深受感动：像周总理和邓颖超这样的领导人，一年到头要管多少事，接待多少人，他们还能记得一个一二十年未曾再见过面的普通干部的名字呢？这除了具有使人叹服的惊人的记忆力以外，还基于对同志的真诚的关切和对事物的认真和执著；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他们诚心诚意地关心群众，他们对人，从不看地位高低、职务大小，都以诚相待。

在艺术创作上，周总理对舒强的教育也使他终生难忘。

1944年春，舒强初到延安，在鲁艺戏剧系当教员，系主任张庚让舒强和张水华一起导演陈荒煤和姚时晓合写的反映太岳地区军

民和敌伪军抢粮斗争的戏。排演前，周扬把周总理请到鲁艺来听剧本，提修改意见。

舒强在回忆当时的思想情绪时说：

“开始，我心里有些纳闷，写戏么，应该请些作家、导演来提意见，周副主席是政治家，会打仗，可是，懂得艺术么？当作者把剧本读完以后，已近黄昏，晚饭后首先请周副主席提意见。周副主席开始好半天没对剧本提具体意见，而是向作者提了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太岳地区的敌、友、我军的情况，当地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的情况，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当地生产、人民生活和政府各项政策等等。这些问题都未涉及剧本的具体内容。我越听越莫名其妙，心想：谈那么多不相干的事情干什么呢？我过去在大后方曾和许多著名的导演一块搞过戏，从来没有这样搞过，心里很不耐烦。好容易等作者把问题一一回答后，周副主席才对剧本的内容、人物、人物间的关系、矛盾、矛盾如何解决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重要意见。从他的讲话里我才听出来，他不仅了解剧本所反映的现实情况，熟悉剧中人物和情节，而且他精辟的分析也令人折服。这时，我才猛然感到自己脸红、身上冒汗了。心里想，周副主席讲的这些情况和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办法，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甚至都听不懂，真是一窍不通！我怎么排这个戏呢？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原来想得很简单：拿来剧本，对对词，搞好舞台布景设计就排戏、排地位，再搞好舞台构图、节奏、音响、效果便成了。现在才觉悟到，搞边区的戏，光靠那一套不行了。我刚到解放区，不但前方未去过，八路军从未见过，连鲁艺的大门也没怎么出过，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的老乡家也没去过，我能创造出什么反映解放区前方军民对敌斗争的舞台形象呢？八路军是什么样子？党政军干部是什么样子？游击队、老百姓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待人接物，怎么说话、走路？怎么站和坐？……等等，等等，我连影子也未见过，我感觉到从事戏剧工作以来从来没有现在那么无知、无能、吃瘪！周总理的这次谈话对我后半生的创作活动和思想修养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使我明确了艺术与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操纵的“中央专案组”以舒强1935年因左联被破坏被捕一事，硬要将其打成“叛徒”。1975年秋“中央专案组”强迫舒强在定为“叛徒”的结论上签字，舒强坚决不签。但他又能到哪里去申诉呢？他回忆说：

我是多么需要有人能帮助我把问题搞清楚啊！最后，我还是想到了周总理。因为我被捕的原因、经过和出狱的全部情况，一到延安就如实详细地向组织上交待过。周总理是了解我的。可是，那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住在医院里，我怎么忍心去打扰他呢？后来我想到了邓颖超，她也是了解我的。

于是我写了封信给她，请一位过去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转去。

1976年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如巨雷轰顶。我和亿万人民一起痛哭、哀悼。我们失去了最亲的亲人、最好的领导人。这时，我很后悔，责怪自己不该在总理重病之中，在邓颖超也十分困难的时候，写那封信，给她增加麻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被党中央解散了。1979年，我的问题也得到彻底平反。

我获得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界春节团拜会上，邓颖超被邀请出席了大会。会上，我前去向邓颖超问候。邓颖超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舒强同志，你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和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啊……！”

我听了眼泪直想往下流，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有对总理和邓颖超的感念之情，有对总理不幸逝世的哀伤，也有在极不适当的时候给她写信的自责！

舒绣文捧着自己和总理、邓大姐的 合影，久久地凝视着……

1961年冬的一天，著名演员舒绣文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心脏病犯了，躺在家中休息。半夜，11点多钟。儿子舒兆元已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门铃声将兆元惊醒。“是谁这么晚，还来做客呢？”打开房门，啊，站在面前的竟是周恩来总理！总理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大衣和头发都落上了洁白的雪花。

“兆元，你妈妈的病怎么样？”周总理边问边走进客厅，身后跟着几位演员。

原来，总理到首都剧场看戏，向演员们问起舒绣文，知道她正在生病，便和演员们一同来看她。

周总理走到床前，随手拉了把椅子坐下。看到舒绣文脸庞消瘦，呼吸困难，不住地咳嗽，他心疼地摇了摇头。舒绣文强挣着要坐起来，周总理连忙向她摆手劝阻。谈话中，听说舒绣文是因为过于劳累而犯病，总理严肃而又亲切地说：“绣文同志，你一定不能不注意休息了。你要明白，你的身体不单是你的，而且是党和人民的。人民需要你，你一定要战胜病魔。”

舒绣文被温暖的话语所感动，向周总理伸出了一只手。总理用他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舒的病容立刻显得舒展些了，她眼里含着热泪，望着总理，点了点头。

周总理把舒兆元叫到面前，对他说：“你妈妈是文艺界的老前辈，是国家的财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让她注意休息，不要让她生气。”

夜深了，窗外的风雪更大了。时钟轻轻地敲了12下。周总理站起身来，看了一下表，又一次握了握舒绣文的手，然后转身向门外走去。

舒兆元送别时，向总理表示感谢。总理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说：“我和你妈妈是老朋友了，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在重庆就经常去看她的戏。她对人民是有功的。你一定要好好照料她，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说完，转身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汽车渐渐消失在夜色和风雨中。

第二天上午，邓颖超又来到舒家。她受总理的委托，带着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和几根碧绿的黄瓜来看望舒绣文。那药品是周总理自己治疗心脏

病用的。黄瓜则是总理与邓颖超在工作之余与警卫战士一起种植的。

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下，舒绣文住进了著名的阜外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认真治疗护理，病情开始好转。在病房，她捧着自己和总理、邓大姐的合影，久久地凝视着……

那是 1958 年国庆节前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首场演出话剧《骆驼样子》，虎妞由舒绣文扮演。演出结束时，观众们热烈鼓掌。周总理和邓大姐从观众席位上来到后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舒绣文在前台向观众谢幕，心情非常激动：忽然，身后的布景门打开了，总理走了出来。舒绣文突然发现总理，兴奋极了：“总理，您……”“我也上台演戏了”，总理风趣地说着。总理同邓大姐同时紧紧地握住舒绣文的双手。闪光灯一亮，摄影师抓住时机，拍下了永远难忘的场面。

此刻在医院里，捧着这珍贵的照片，舒绣文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转眼一年过去了，1962 年冬季的一天，窗外又在飘着零星的雪花。在温暖舒适的病房里，舒绣文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孩子在一旁给她剥桔子，病房门被轻轻推开，护士领着总理秘书张元同志走了进来。他带来了总理的关心，带来了邓大姐的亲笔问候信：

亲爱的舒绣文同志：我是多么的惦记你和想念你啊！我曾几次起心要去看看你，但至今尚没能如愿。现特托张志去看看你，我和恩来同志向你致意，希望你安心治疗，祝福你早日痊愈，紧紧握你的手。

邓颖超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张元还同时递给舒绣文一个精巧的洋娃娃。这洋娃娃会跳舞唱歌，是一位外国朋友送给总理的，总理让张元带给了舒绣文。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周恩来
从观众席上站起身，端上一杯茶，
走向舞台，递给歌唱家张权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在解放前到美国学习音乐，在名师的指导下，靠辛勤努力掌握了从 16 世纪到近代各种流派的歌剧和艺术歌曲，获得了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与歌剧艺术家证书。当时许多老师和朋友都劝她留在美国生活。然而，张权的心早已飞回了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1951 年 10 月，这位 32 岁的女高音歌唱家，满怀希望和期待，登轮东返，准备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

张权回国后，在北京举行首场音乐会，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周恩来意外地出现在前排坐席上。他的露面，是向所有的爱国者，特别是向知识分子表示：政府欢迎他们回来帮助建设新中国。当帷幕在热烈的掌声中徐徐落下时，他走上前去向张权祝贺，赞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预祝她取得更大成功。

在 1957 年张权被错划为右派。她除了被降职降薪外，还被中央实验歌剧院除了名，调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去改造。

后来，周恩来听说了张权的遭遇，专门研究了她的的问题，为她摘去了右派帽子。1962 年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张权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张权在旧友的一再推举下，走上了小舞台，激动地亮开歌喉，演唱了自己最

喜爱的民歌《绣荷包》。这是她因遭遇不幸离开北京几年后在首都的第一次演出。由于她在困难的日子里仍然坚持练声，所以此时她的歌喉婉转动人，一如既往。当她唱到最后一句歌词时，周恩来走近了小舞台。当最后一个音节唱完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大厅。周恩来一面鼓掌，一面热情地招呼张权，握着她的手，语重心长他说：“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张权的泪水夺眶而出。总理的话象一股暖流，消融了张权心河里的坚冰，怎不让她悲喜交集？接着，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张权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周恩来说：“你调离北京，我当初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张权见总理态度如此亲切，就提出了一个在她看来极为重要的问题：“总理，一个人犯了右派错误，改了，还能不能成为左派？”“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听到总理亲口讲出这话，她的疑虑顿消。这年11月间，张权再次应邀到北京举行音乐会。有一回，正当她唱完第二支歌，欠身向观众致意时，周恩来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到了周恩来身上，只见他端着一杯茶走向舞台，递给歌唱家。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周恩来的这个特殊表示，意在医治一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

“我受小超大姐的委托……”

1957年春，一次电影工作者会议之后，周总理和邓大姐把参加会议的女演员都请到他们家中。著名电影演员于蓝也在其中。当时邓大姐问起于蓝的病情，于蓝曾告诉她，医院已嘱易地治疗，将去杭州疗养，这是不经意的谈话，谁知不久，周总理陪同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赴杭参观时，竟向各疗养院询问于蓝的情况。可是，尚未住进疗养院，他找不到于蓝，又让邓大姐问于蓝的爱人田方，才知于蓝住在孤山杭州美院莫朴、孙铮夫妇家中。一天下午，他竟然和秘书步行到孤山看望于蓝，而于蓝又外出散步未归。此时左邻右舍的老百姓迎上前来，周总理就像普通人一样，和老百姓并肩而立地攀谈起来。从菜篮子直到生儿育女的情况都在总理关怀之内。他平易得不像个总理，群众就更无比亲切地靠近他，和他谈个不休，后因秘书催促还有任务在身，他才离去。群众举目凝望着他远去的方向，迟迟不走，深深地品味着这幸福的邂逅。于蓝回来时，还有一些人停在门前不走，他们以亲切敬慕的眼光望着于蓝，为于蓝未见到总理而遗憾。

当天下午，总理又叫警卫员送来一封亲笔信，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受小超大姐的委托……”于蓝的眼睛潮湿了：邓大姐和总理对一个普通的演员竟如此关怀！两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当然不只是对自己，而是对人民群众一向有着深情厚意！所以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他们能领导与团结亿万群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这封信于蓝珍藏了多年，现已送到党史资料室，它将永远启迪我们应该怎样地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项堃觉得，他只有赶快把作品完成，
再多干一点事，才是对敬爱的周总理
和邓大姐最好的思念

一说起项堃，首先走进人们脑海的可能是《南征北战》、《停战以后》、《烈火中永生》、《佩剑将军》中的形象。其实，项整更擅长话剧。早在30

年代，他就以《雷雨》中的周萍、《日出》中的方达生而蜚声上海滩。他饰演《阿Q正传》中的阿Q曾成为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粉碎“四人帮”后的话剧《于无声处》更是无人不知，他扮演剧中的何是非。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在项堃刚刚开始舞台生涯时便结识了周恩来同志。那年他24岁。从马来半岛回国经滇缅公路到重庆又欲往延安，不想就在重庆与周恩来邂逅。在周恩来和阳翰笙等人的挽留下，他在重庆创办了“中华剧艺社”，往来重庆、成都一带巡回演出，被当时的报刊称为“大后方的话剧皇帝”。此后的几十年，他们一家就一直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项堃对总理的那份缅怀之情和对邓大姐的那份敬仰之意也远非常人所能及。

早在40年代，项堃的夫人阮斐在重庆宽仁医院分娩，因患肺病无法喂奶。周恩来和邓大姐得知后亲派秘书前往探望，并特地送去当时紧缺的炼乳、红糖等营养品。等阮斐出院后，总理和邓大姐为避免国民党对项堃夫妇的注意，巧妙地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名义相邀前往晤面。在苏联大使馆主楼前见到他们时，大姐便紧握阮斐的双手关切地询问她和孩子的近况，并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保养身体。

尤其使项堃难以忘怀的是1984年的一天，邓大姐特地邀项堃全家到中南海西花厅住处话旧。十上届三中全会以后，项堃夫妇中断演艺10余年又重返影坛，拍的第一部片子便是他们夫妇俩和儿子项智力3人主演的《生活的颤音》。影片送到中南海审查时，邓大姐连看两遍，给予肯定，还问到了项堃全家，又特地问到影片中“韦立”的扮演者是否就是当年在重庆宽仁医院自己抱过的那个孩子，并满心高兴地相约他们全家来作客。叙旧的那天原本说好是在下午4点钟，可邓大姐因见面心切，从2点就开始等候。

1990年，相依为命的老伴阮斐不幸去世，项堃陷入极度痛苦之中。邓大姐又派赵炜前往看望，并劝他节哀，保重身体。至今项堃还将邓大姐当时捎来的问候纸条贴在家中墙上。项堃觉得，他只有赶快把作品完成，再多干一点事，才是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最好的思念。

“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
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
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吗？”

1962年夏天的哈尔滨，正是美好的游览季节，男女游人成群结队，携儿带女，乘轮渡到松花江对岸的太阳岛去旅游、去享受在松花江水中沐浴的乐趣和在树丛下聚会的快活。

当时被错划成右派的著名作家陈沂从下放地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看望妻子和孩子。一天傍晚，陈沂夫妇正沿着一块块方石铺成的道里的中央大街，向松花江边走去。忽然，一队车队迎面驶过。陈沂马上联想到近日报上报道的周总理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到大庆参观，路过哈尔滨的消息。

尽管陈沂在北京时同周总理多次见面，但此时他是“右派分子”，总理能否见他，对这个问题，陈沂当时连想都没敢想。

在江边漫步了一会儿，就到地处松花江畔的黑龙江省委党校去看一位他在齐齐哈尔下放时的直接上级，就是电影《老兵新传》的模特儿周光亚同志。在那里一直坐到9点多钟，才回到住地。

不料刚一进门，孩子便惊呼：“爸、妈，你们到哪里去了？刚才省委交际处来电话，说中央有位客人要见你们。不久他们便开车来了，一看你们都不在，马上决定要我们陪着到你们常去的地方寻找，找遍了你们常去的地方，问了那些地方的阿姨和叔叔，都没有找着，交际处的同志只好回去了。临走时留下电话，让你们一回来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来接你们。”

陈沂一听，就明白那位中央的客人就是周总理，他当即给交际处打电话，不一会儿，交际处的车就来了，把陈沂夫妇接到“107”——省委招待处的和平宾馆。

总理正在参加舞会，让他的卫士长在门口等陈沂夫妇。一见面，卫士长对陈沂说：“陈部长（50年代，陈沂任解放军文化部长），你到哪里去了？总理派人找了你好久啊！”

说完，卫士长便把陈沂和他妻子引进舞厅。总理见他们来了，马上停止跳舞，把陈沂夫妇一起拉到一个长沙发上坐下。总理对陈沂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这些年受苦了。”

总理说罢，紧紧握着他们二人的手，使他们感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总理接着就告诉他们：“刚才在街上我没见到你们，是小超（邓大姐）见到你们后跟我说：‘那不是陈沂同志吗？’所以我一回宾馆，就要他们去找你们，要他们在11点钟以前一定要找到。”

陈沂向总理简单地谈了这些年在乡下的情况，总理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对他说：“在上面工作一段，又到下面去工作一段，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了。”

陈沂边听，边琢磨，自己的问题迟早一定会解决，要不然，总理怎么会说，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呢？这样一想，他心里就很踏实了。

接着，总理问陈沂：“最近毛主席讲了司马迁的故事（这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你知道吗？”

陈沂回答说：“我听到了一点。”

总理继续对陈沂说，声音也提得很高：“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吗？”

总理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陈沂，大大增强了面对逆境的勇气和力量。陈沂对总理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应该有比司马迁还硬的骨头。”

总理对陈沂的教导，一直铭记在他的心里，此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陈沂顽强地坚持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总理的这个教导。

总理还问陈沂：“你这些年去过北京吗？”

陈沂摇摇头。总理接着就说：“应该回北京去看看这些年首都的变化，看看老首长、老战友。”

陈沂只是点头，没有回答，因为他正被监督劳动，没有行动自由。

这时，又有人来请总理跳舞，总理便拉起在一旁的陈沂妻子一起去跳了一场。陈沂妻子不大会跳舞，可以说是总理拖着她跳的。陈沂深知，这是总理对他们夫妇的爱护和关怀。

一曲终了之后，总理又回到陈沂坐的沙发边来，一边用毛巾擦手，一边问他：“你有什么意见吗？”

陈沂说：“听说军委要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正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方针），希望总理给我催一下，如果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还是希望

回到军队去。”

总理说：“我回去跟肖华说一声。”

总理去大庆的火车开车的时间快到了，陪同总理去大庆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也来催总理快到火车站去。总理在门口当即把陈沂介绍给李剑白，并跟他说，今后省委要多多关心陈沂。

陈沂夫妇本想到火车站去送总理的，顺便看看邓大姐，总理说：“她怕早已睡了，她本来说要见你们的，你们来晚了，她只好先上车，她要我见到你们时代她问好。”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在心中默念：“我们尊敬的邓大姐啊！”

他们送总理上了汽车。总理上车后，还伸出手来频频向他们招手，这时，陈沂夫妇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在朦胧的泪花中，他们目送总理乘坐的汽车远远驶去。

第二天，哈尔滨就传开了总理接见陈沂的消息，有人情不自禁地说：“看来陈沂的右派是打错了，要不然，总理怎么会接见他呢？”

与知识分子心心相印的最后几个乐章

从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是在医院中度过的。其间，他动了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经受了肉体上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这位年近8旬的老人，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夕，仍然处理了许多党和国家的大事。同时，用自己的全部热血，继续谱写了他与知识分子心心相印的历史篇章：

——著名妇科医生林巧稚听说周恩来生病，借去瑞士参加会议的机会，寻到了1954年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的住处。她在那里，满怀对总理的敬仰和深情，特地拍摄了几张照片。回国后，托人送给周总理，以示慰问之意。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看到照片，很感愉快，说林巧稚找的地方确实就是他当年住过的。林巧稚怀念总理，总理也关心林巧稚。他特意托邓大姐去了解林巧稚身体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出门有没有车子？当听说医院用车有困难时，总理指示拨给了林巧稚等人一辆专车。

——周总理在医院从电视上收看了西藏歌舞团赴京演出节目。藏族艺术家才旦卓玛亲切质朴的舞台形象出现在荧光屏上，她那宽阔嘹亮的歌声还像当年那样，充满了草原风味。多不容易啊！……周恩来托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才旦卓玛，告诉她：总理听你唱的和过去一样好，很高兴，总理要你好好为人民歌唱，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国家体委几位同志给病中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体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的真实情况，希望能够见一见总理。周恩来在医院看了信，充满感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见他们，很想见他们。根据当时总理的身体情况，工作人员准备安排总理到体委去看一次训练表演，见见大家；还设想过有机会把体委的同志们请到人民大会堂去，和总理握握手；见见面。可是，由于病情不断恶化，周恩来的这一心愿始终未能实现。

——我国登山队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取得成功的消息传来后，病中的周恩来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欣慰。他为了我国登山健儿的活动，付出过那样辛勤的劳动，多次逐字逐句审阅、修改、批准过他们的报告，还亲自向有关方面写信，为他们购置、调拨重要设备。现在，看到了丰硕的果实，他怎能不感

到高兴呢！当登山队返回北京时，周恩来在医院亲自审查批准了欢迎他们的活动计划。当时，攀登珠峰的电影也正在编辑制作，对这项工作，总理也很关心，作了具体的指示。

——“四人帮”对故事片《海霞》进行扼杀，不许上演。周恩来听说后，在医院调看了这部片子，给予肯定和支持。邓颖超还向有关负责同志建议，用这部电影招待在京的兄弟党的朋友们，给“四人帮”以沉重的一击。

——空军某部军医冯天有，虚心向中医、民间医生学习，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创造了“新医正骨疗法”，为诊治常见多发的颈肩腰腿痛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了解到这个情况，非常兴奋，给予热情的支持，指示卫生部门要迅速办学习班，向全国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损伤学习班就这样办起来。开办后，周恩来又亲自审阅典型病例材料和简报，关怀学员的学习情况，劝导在他身边工作而又患有颈肩腰腿痛的同志积极接受这一疗法，还嘱咐邓颖超同志关怀、指导他们的工作。全国性的学习班举办了三期，培养了270多名骨干。这些骨干又在各地和部队举办了近百期学习班，培养的医务人员数以万计；学员们仅在学习班学习期间，就诊治病人7万多人次，有效率达90%以上。许多抬来就医的病人，经过治疗，含着喜悦激动的泪花走了回去。

——为了解决群众学习文化知识的迫切需要，有关单位准备修订《新华字典》，向上级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周恩来抱病审阅了这份报告，亲笔作了批示。消息传出，同志们都为总理对自己工作的关怀和支持而感到高兴。但是，从字迹上看，总理原来那刚劲有力的笔迹，如今却有些颤抖。很明显，经过病痛的长期折磨，总理的身体更为虚弱了。人们心疼、焦灼，而又无可奈何。在对报告的批示后面，大家看到总理还写着这样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从这句简单的说明里，同志们想象到敬爱的总理这时工作起来已是多么困难！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那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为人民事业耗尽了心血的敬爱的周总理，终因操劳过度危在旦夕了。

1976年1月7日，晚上近11点钟，医生们来到总理的病床前，为他进行了当晚的治疗。衰弱至极的周恩来，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有吴阶平，艰难地对他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在说了这句话之后的仅仅11个小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这是周恩来对我国知识分子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在走完光辉的人生征途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一个永恒的召唤！

信念·品德·情操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完美的情操，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崇敬。这种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使我们感受到什么是崇高和伟大，而表现这种精神境界的却往往是他们的坦诚亲切的语言，无所畏惧的气概，真挚热烈的情感和完全彻底的奉献。

“小乐天”、“大乐天”、与“赛乐天”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工作。在沉闷压抑的环境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乐观、热情、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他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与服务员、警卫战士、甚至工作人员的小孩打成一片，使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成为白色恐怖中的一片乐土。

红岩村纪念馆保留着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亲自作的《题双乐天图》一诗。全诗是这样写的：

大乐天抱小乐天，
嘻嘻哈哈乐一天，
一天不见小乐天，
一天想煞大乐天。

诗后写着：“题双乐天图”和“赛乐天书”。这是给一张照片的题诗。我们要了解这首诗，首先得从这张照片拍摄的情况说起。

那是1942年夏天，当时跟随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荣高棠和管平夫妇，他们的小男孩已经一岁半了，长得非常机灵、活泼，又很爱笑。在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尤其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更喜欢这个孩子。邓大姐还给他起了个很风趣、形象的名字：“小乐天”（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她自称“大乐天”。小乐天管邓大姐叫“大乐妈”。每当邓大姐通过茂林修竹夹映着的山石小路走向办事处的楼房时，小乐天总是在石阶上一边喊“大乐妈”，一边蹒跚地跑向邓大姐，邓大姐便一下子把他抱在怀里。一次，这样的场面，被当时在办事处负责机要工作的童小鹏——也是那里唯一的“摄影师”拍照下来，办事处的同志们高兴地把这张照片叫做“双乐天图”。

1942年，祖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所在地——红岩村，就如同黑夜里的火炬一样，给蒋管区人民带来光明、希望和未来。工作的环境是如此艰苦、险恶，但是办事处的同志们，在周恩来领导与关怀下，生活仍然过得丰富多彩。经常举行文艺晚会，歌咏活动，乐器不足就用脸盆和饼干筒代替。还发动大家削平小山包，修好篮球场，每个月还要出一期墙报，节日还要增加出刊。周恩来在百忙中也经常参加文艺晚会，观看篮球赛，为墙报写稿。《题双乐天图》一诗，就是应约写给墙报的。它是写在信纸大小的一张纸上，右上方贴着童小鹏照的那张二寸大小的照片。在当年办事处楼下的大厅左首的墙上挂着一块大黑布，墙报稿就是用别针别在这块黑布上面的。

《题双乐天图》全诗加上落款，一共37个字，却一连出现了“大乐天”、“小乐天”和“赛乐天”（作者）3个形象，6个“乐天”的字样。画面上，诗行中的“大乐天”、“小乐天”写的虽然是两个人，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战

斗集体的生动写照。“嘻嘻哈哈乐一天”，表明在这个战斗集体里从早到晚充满着革命的欢乐，斗争的幸福。难怪人们说红岩村是“地狱中的天堂”，“蒋管区中的解放区”。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当时那种险恶的环境里，仍然一如既往乐观和朝气蓬勃，如果没有对于革命的坚定信仰和革命必胜的信心，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里我们不禁想起胜利前夕在重庆被杀害的烈士陈然的诗歌：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同志们的孩子都看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看成是党和人民的最宝贵的财富。周恩来当年在百忙之余，饭前饭后，总要抱一抱“小乐天”，与他嬉耍，逗他发笑。“小乐天”也亲昵地叫他“大乐爸”。1942年以后，办事处的孩子逐渐多起来，为了使同志们集中精力工作、战斗，使孩子们健康成长，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办起了托儿所。虽然经费紧张，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吃好、玩好。没有玩具就发动警卫班战士为孩子们做玩具。孩子们得了病，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千方百计，通过统战关系在重庆找最好的医生治疗。由延安运来的大生产运动中收获的西红柿、大甜萝卜，也是先送给托儿所的孩子吃。因此，《题双乐天图》一诗，也生动地再现了为共同理想而斗争的同志之间的革命情谊，表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革命后代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殷切希望。

对于“大乐天”的乐观和朝气蓬勃，童小鹏早有体会。他回忆说，

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开学的联欢会上，大姐和几个女同志一起唱了《毕业歌》、《新女性》等抗战歌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小超同志，再来一个”的欢呼声中，她一个人又演唱了《渔光曲》，更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使我十分惊奇，一个在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上海白色恐怖下、土地革命中都站在运动前头英勇斗争的女革命家，特别是抱着重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英雄，居然这样年轻、活泼，充满朝气。晚会结束后，主持人李克农介绍大姐和我们红大学生演员见面时，她满面笑容同我们一一握手，称赞我们演得好。顿时，一个英勇斗争的女英雄和平易近人的大姐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更难忘记，在1936年9月30日中秋之夜，当我们几个人坐在窑洞门口“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邓大姐给我和叶子龙（毛主席机要秘书）送来两个“月饼”，纸条上写着“一个给弟弟（子龙）、一个给妹妹（小鹏）”，使我又感激又好笑。因为她看过我在晚会上男扮女装演过姑娘，就给我开了个玩笑。但在天天吃小米的艰苦岁月里，吃到一个面饼，也是很难得的了。后来我患感冒发高烧进医院时，邓大姐又给我送来大米、馒头和酱菜，这是比雪中送炭还珍贵的礼物。这种革命大家庭中的阶级友爱，比什么礼物都珍贵。

“宁静、明朗、坚实、无我，
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在南京梅园新村时，对敌半争很艰巨，周恩来的工作很紧张。看到周恩来常常通宵不眠，同志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一次，党支部开会，同志们一致

提出要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周恩来又是笑着说：“我休息得很好嘛！”鉴于周恩来休息太少和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会上做出决定，要他一定在晚上12点钟之前睡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周恩来内心十分感激。可是，由于形势和工作的迫切需要，使他不能不严肃地对同志们说：“我们代表团受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委托，担负着谈判斗争的重大使命，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相比之下算得了什么呢？”在场的同志们听了这番感人肺腑的话，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邓颖超当年在中共代表团负责领导妇女界的工作，经常出席一些妇女界的会议。但主要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谈判斗争最紧张的日子里，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梅园轮流值班，处理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敌人巢穴里，邓颖超不畏艰险，不计名利，与周恩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尽管工作非常紧张，谈判斗争十分激烈，可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却经常挤出时间到雨花台去凭吊革命烈士。每次去都要拾一些雨花石回来，放在中共代表团会客室中间桌子上的一只碗里，对同志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邓颖超不止一次地说过：“每当我一看到这些雨花石，就会回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来。”郭沫若当年是中共代表团的常客，这碗雨花石曾使他感慨万分，他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作了这样一段评价：“雨花纹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过周恩来警卫员的廖其康同志深情地回忆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难忘情景。他说：

当我来到西安红军联络处的那天晚上，邓颖超在办公室接见了。在邓大姐的办公室前，我喊了声：“报告。”邓大姐回答：“进来。”进屋后，我向邓大姐立正敬礼，邓大姐精神爽朗、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吩咐我坐下。我环视了一下这间面积很小的平房。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陈旧的三屉桌和一把旧木圈椅。邓大姐穿着普通的便衣，坐在椅子上，十分亲切地同我摆家常，关心地询问我的姓名、籍贯和以前的工作、战斗情况。

当邓大姐听说我在长征中负过伤，就十分关切地问我伤在哪儿，并且还站起身来，仔细地察看了我腿上的伤疤，嘱咐我今后注意身体。邓大姐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使我深受感动。

邓大姐看了看我还穿着红军服装，便十分和蔼地说：西安是白区，得把军装换一换。说老实话，我真不愿意换下我那身红军服装，尤其舍不得那顶缀有红五星的红军帽。这闪闪发亮的红五星，伴随我、照耀我跟随毛主席走过了二万五千里艰难而又胜利的征途呵！现在要脱下它，我怎么舍得呀！我的眼角涌出了泪花。邓大姐笑容满面，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语重心长地说：换了衣服，心不变嘛！换了帽子，还是红军，还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指挥的抗日主力军。换衣服，换帽子是为了适应斗争环境，为了更好地做革命工作，更好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抗日路线！邓大姐的话使我立刻解开了心里的疙瘩，我很快换上了联络处同志送来的服装。邓大姐站起来端详了一会，满意地说：很好嘛！很有精神。并指示我今后的任务就是作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告诫我一定要保卫好周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

一听说今后就要跟随周副主席，我心头顿时又高兴又紧张。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最大信任，这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任务！但是，我又担心自己各方面水平都很低，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邓大姐，她微笑着，十分信任地说：西安情况很复杂，斗争很尖锐。周副主席外出，有时只带你一个保卫。你要胆大心细，眼灵手快，搞好保卫工作。尤其是要注意保密，不要泄露周副主席的行动计划。工作要机警，处理问题要灵活、机动。

最后，邓大姐带我走到门口，指着办事处对面第二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对我说：那就是周副主席的办公室，等一会就到周副主席那儿去吧！

邓大姐这么亲切和蔼地给我谈话，又这么明确恳切地指示我如何进行工作，使我对完成保卫任务增添了信心和决心！

从邓大姐那儿来到周副主席办公室，周副主席刚好吃完晚饭后回来。见了我，他亲切地问道：“你叫廖其康吗？”我回答说：“是”。他吩咐我把办公室的灯打开。我赶忙往外走，准备去找火柴和蜡烛。周副主席笑了起来，对我说道：这里用电灯，不要火柴蜡烛。

接着，周副主席十分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走到电灯开关前，指着说：这就是开关。然后又打开灯，给我讲：这样往下按，就是开；往上掀，就是关。

就这样，在周副主席的亲切指点下，我知道了如何开、关电灯。周副主席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副主席对自己的伙食从不在意，可是对同志们的伙食却非常关心。不管在武汉，还是在重庆，周副主席多次到办事处伙房去，询问伙食情况，指示办伙食的同志要想办法少花钱多办事，把伙食管好。还指示司务长要经济公开，每月公布一次帐目，告诉大家烧煤用了多少钱？买米用了多少钱？要像红军时期分伙食尾子那样，把剩下的伙食费分给大家买一点生活用具。

对我们警卫战士，周副主席更是体贴入微。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但是在百忙中，他总忘不了到警卫班去查铺，看战士休息得好不好，看战士被子盖好了没有。看见有的战士在梦中掀开了被子，他就轻轻为他们盖上。有一次，一位警卫战士突然患疟疾。周副主席知道后，非常关心，同邓大姐一起去看过好几次，还亲自找来医生，嘱咐他好好为战士看病。当医生确诊是疟疾以后，周副主席关切地对医生说：你要想法给他找点奎宁药吃，让他早点恢复健康。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这个战士很快治好了病，恢复了健康。

1939年春天，蒋世牟同志由组织上派到曾家岩“周公馆”给周恩来当炊事员。他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我做饭时不小心把手指割破了，白天没觉得怎样，谁知到了晚上，手指感染发炎了，又红又肿，疼得直到半夜还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正在我疼痛难忍的时候，忽然门开了，邓大姐轻轻地走进屋来。原来，周总理听见我翻身时竹床发出的响声，便让邓大姐过来

看望我。邓大姐关心地问我：“你怎么还没睡？”我说：“手指割破发炎了，疼得很厉害。”邓大姐一听马上告诉了总理，总理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找来了消炎用的药水、药膏、包扎用的纱布和绷带，还特意让邓大姐转告我：“明天休息，手好了再继续工作。”我望着刚包扎好的手指，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周总理常常说，人民已经给我报酬了，
不是为公的事，不能随使用国家一分钱

1956年10月下旬，周总理在淮安县老家的婶母患病，县委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来，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总理汇报。总理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总理的婶母去世时，恰巧总理公出，邓颖超在1956年12月24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信上说：

“先后收到给恩来同志的两次来电。我们的婶母亡故的后事，承你们照料办理，深为感谢。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

淮安县委考虑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无暇处理这些家务事，超支费用又很少，就没有把不足费用的数字写信告诉周总理。但是，周总理并没有放过这件事，又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于1957年3月13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信追问这件事：“总理婶母去年逝世后的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淮安县委才将实际开支的情况告诉周总理。不久，便收到了周总理1957年4月19日用复写纸打印、盖上自己图章的复信。信上说：

“几年来，你们对我婶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信上还说：“我婶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们勿再予照顾。”

随着这封信，周总理又寄来婶母安葬善后费用尾欠垫款25元。

1958年，淮安县委帮助周总理弟媳陶华治了病。周总理知道以后，在12月22日，委托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说据陶华信中讲：“她近几月来因病，曾在淮安、南京等地医院作了长时间的治疗，现在病已基本好转了。在治疗期间所花经费是由你县借给的，到目前为止共借了60元。”周总理唯恐陶华把钱数讲少了，信中还说：“但不知真实情况如何？望来信说明一下。”并随信寄还人民币60元。

周恩来曾把家乡淮安县的领导称为自己的“父母官”。1958年7月，淮安县委副书记王汝祥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顺便想请总理帮助解决点钢材，用于淮安县办工厂。可是周恩来却把这位“父母官”的请求拒绝了。他语重心长地对王汝祥说：办工厂，当然是好事。但从淮安的情况看，恐怕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粮食上去了，可以办些厂，但也要面向农业，由省里统筹规划。办厂需要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

周恩来身居总理要职，但他并没有为自己家乡的事去干预江苏省的统筹规划。相反，为了使地方的同志更好地从实事求是出发，也为了教育故乡的干部，他给江苏省委写了一封信，谈了个人的意见。在写到淮安县委希望他帮助解决钢材问题时，他说：“王汝祥同志这次来，想在北京解决钢材问题，我当然不能那样做！……”

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淮安县委为了保重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健康，在1961年春节前，便托人带了一点故乡的土特产给周总理和邓颖超。1月16日便收到了周总理委托国务院办公厅代写的一封信，信上说：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随着这封信，的确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1962年一二月间，淮安县委书记邵凤翥和副书记王纯高到北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赴京之前，在县委常委们讨论工作之余，有人提出：总理一直惦记着故乡，可一直没工夫回来看看，是不是顺便带点家乡土产，给总理尝尝，一来表达故乡人民的心意，再则也让总理高兴高兴。可是马上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上次送了一些土产去，总理和邓大姐虽然勉强收下了，却付了一百元钱，并写信批评我们没有学好中央有关文件，这次不一定再送了吧！后来大家经过商量，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少带一点，带最有特色而又不花钱的。茶馓是驰名南北的淮安特产，是香酥可口的茶点，带上它给周总理品尝最合适。

大家决定带茶馓以后，特找了最好的师傅，选了上等面粉和麻油，经过巧手精制，装在特制的白铁皮小桶里。一路上，邵、王二人更是小心翼翼，以防因颠簸而碰碎。

来到北京以后，他们俩亲自把茶馓送到总理办公室。秘书一看送来的是礼品，赶紧劝他俩把原物带回，说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邵、王两人一再解释说，这不是什么礼品，是家乡炸的馓子，一点不值钱的东西，不过是表表家乡人民的心意罢了。秘书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代收下来。邵、王二人也很高兴地回到了住地。

没想到过了两天，他俩被电话召到江苏代表团秘书处。茶馓却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总理办公室的一位秘书特意来再三作解释：“你们的心情，总理完全理解。但是，总理说，茶馓一定不能收。为了这点茶馓，你们用白铁皮做桶子，也是个浪费……”

邵、王两人沉默了半晌。然后对秘书说：

“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迢迢一片心呐，就照收钱、粮票，请你给总理带去吧！”秘书笑了，并说：“你们的主意，我早给总理说过了，不行。你们过去不是送过一次莲子、藕粉吗？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来了。要是再收下来，以后还会有人送的。总理再三嘱咐：一定不能收。还叫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要你们好好学习……”说着，递给他们一份文件，上面有周总理亲自用铅笔写的批示。

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邵、王两人仔细阅读了总理的批示，深受感动。

1962年，周总理和邓大姐一起陪同外宾到苏州参观，地方上的同志为总理代购了一点苏式糖果。总理知道后立即问苏州的同志：“这些糖果是否按市场价格购买的？”苏州的同志只好如实地回答：“是按内部价格买的。”总理立即指示：“一定要按市场价格结算。”这时总理的火车已经准备开动，时间很紧迫，最后遵照总理的指示，在第二天总理返程路经苏州时又重新按

市场价格进行了结算。

陕西省延安地区曾经接待过邓大姐的土金璋回忆说，1970年元月间，邓大姐陪外宾来延安，回北京时，我们商量托她给总理带点小米。有的同志说：“带上20斤让总理多吃几次，总理吃着延安的小米就像回到咱延安一样。”还有的同志说：“干脆多带点，让其他老首长也尝尝。”我想，多了邓大姐一定不带，就说：“就带两斤吧，让总理尝尝，表表咱延安人民的心意。”我们把2斤小米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我捧着小米对邓大姐说：“大姐，总理爱吃延安的小米，请您带一点回去……”没等我说完，邓大姐就笑着对我们说：“延安的小米，恩来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回了一趟老家。”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大姐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定，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我们想，敬爱的总理日夜操劳着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时刻关怀着人民的疾苦，我们仅仅只带这么一点点小米。而且是延安的小米，怎么能够收钱和粮票呢！我说：“这是我们延安人民的一点心意。”邓大姐温和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我送一点，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就这样，邓大姐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那2斤小米。

江苏南京饭店的同志们在回忆周总理最后一次到南京时的情景时说，那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但当他走下飞机时，我们感到他瘦多了，他绕场一周，和欢迎群众见面，因为走得较快，上车去宾馆时，喘得相当厉害。当时，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后来周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路过南京，我们托他带点活鲫鱼给总理，这位同志说：“你们知道总理的脾气，他是从来不准请客送礼的。”我们再三解释，这位同志执拗不过我们，就打电话请示邓颖超，邓颖超开始不同意，后来我们又请这位同志打电话去，就说这是我们全体服务人员的一点心意。最后，邓颖超同志来电话，一方面感谢同志们对周总理的关怀，一方面又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少带点，不准超过2斤；二是按市场价格算钱，把发票同鱼一起带来。

“我和小超带头，每人捐一百元”

1959年1月11日下午，周总理冒着刺骨的寒风，步行来到广东省从化县温泉管理区。在管理区的办公室里，周总理逐一问了在座干部、贫下中农的名字，详细询问了温泉地区的集体生产和社员生活情况。

周总理对新的一代的成长特别关心。他在视察了温泉小学之后，就迈步向幼儿园走去。听说总理来了，小朋友们一个个欢呼雀跃，向总理问好。周总理高兴地微笑着，向小朋友频频招手说：“小朋友好！”然后又弯着腰同小朋友握手。在幼儿园里，周总理向老师询问了幼儿教育 and 健康情况，又看了课室、卧室、儿童活动场所和伙房，问了孩子们一天吃多少餐，吃什么东西，并且亲口尝了孩子们的晚餐。周总理指示说：“儿童的伙食一定要办好！”

“孩子们有洗澡的地方吗？”总理关切地问。

“洗澡房眼下还没有建。”老师回答。

“老百姓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总理转过头问陪同的大队干部。

大队干部告诉总理，社员们有的在塘边洗澡，有的打水回家洗。

总理听后，严肃地对大队干部说：“一定要建些房子供社员和孩子们洗澡用，使老百姓都能很方便地用上温泉水！”

这一天，周总理还视察了保健站、公共食堂等单位，前后逗留了3个多小时。离开温泉管理区时，周总理再三叮嘱有关的同志，一定要注意人民健康，要建一个洗澡房，让群众方便地用上温泉水。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温泉后，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在回京途经广州的时候，他特地向广东省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给温泉人民兴建一座温泉浴室。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有关负责同志说：“你们在温泉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随时可用上温泉水。温泉地区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住在那里，却很不容易用上温泉水洗澡，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周总理又说：“我们倡议，凡到温泉休养的同志，向他们募捐，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浴室。我和小超带头，每人捐100元。”

周总理这番话，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受感动，表示要马上把这件事情办好，并说：总理的钱不要拿了。可是，周总理在临走前，仍然派人把钱送来了，说是他们的一点心意。

不久，广东省有关部门就拨出一笔款和建筑材料，帮助温泉地区人民建浴室。这时，周总理又从北京派人前来温泉，就浴室的选点和设计问题，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就这样，一座崭新的温泉浴室便建成了。这座浴室面积有150平方米，共有冲凉房18间，分装冷热水管，同时可容50多人洗浴。

曾经参加过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朱光亚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我第一次受周总理当面教导，是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委会上。……会议在西花厅里举行……从上午开到下午，总理便留我们吃午饭。餐厅在会议厅背后，摆了两张大圆桌就没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同桌就餐，吃同样的饭菜。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曾告诉我们：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

朱光亚吃过的这种传统饭菜，在我国经济好转时期一直也没有变化。1963年在周恩来家里的一次晚餐上，后到的贺龙元帅一进入餐厅，就看到每张桌子上仍摆着国务院的传统饭菜，贺老总用手指指餐桌，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周恩来笑着回答：“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在周恩来的家常便饭里，几乎顿顿可以体验到艰苦朴素的传统。

1961年春节吃年夜饭的晚上，总理请客。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和在京的几个晚辈都参加了。二三十个人，热热闹闹的。每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和一盆黄澄澄的小米粥。总理先讲话，对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和鼓励。然后，邓颖超说：“今天是除夕，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肉包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不能忘掉小米。为什么吃肉包子？因为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总理频频点头，带头鼓掌。

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几个侄儿来家里吃便饭。饭桌上只有三个菜：两个素菜，一个有少量肉丝的荤菜，一碗菜汤。其中少见的那一盘荤菜，还是为了第一次来看望两位老人的侄儿周保章加的呢！在吃

饭时，端上来四个杂粮做的窝窝头。保章想自己是年轻人，理应吃粗粮，便伸手就去拿。而邓颖超却用筷子将他的手拨开，慈祥地说：“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饭吧！”周恩来和邓颖超微笑着拿起窝窝头便啃起来。事后保章才了解到，伯父、伯母在困难时期一直带头严格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经常是以粗粮为食的。

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在二年困难时期，一天，当飞行员的侄儿尔萃去看周恩来。周恩来问到空军的生活标准时，尔萃说：“我们每天有半斤肉供应。”周恩来认为，既然是空军对飞行员的特殊优待，作为总理也只好照办。他说：那可不能叫你这个飞行员在我这儿受委屈，明天叫炊事员把我们的肉票集中一下，打个“歼灭战”，保证你的健康。尔萃听后，当时并不知道“歼灭战”的含义，事后他才了解到：总理的肉食供应每月只有二两。

但这种“歼灭战”也只能偶尔打一两次。大多数时候尔萃到周恩来家里，也只能与伯父、伯母一起过艰苦朴素的紧日子。

1959年，尔萃在北京治病，经常去周恩来伯伯家。有一天，周恩来对尔萃说：“今天请你这个飞行员吃一顿‘金银饭’。”尔萃听了，心想，伯伯一向吃得很俭省，今天是要请我吃什么好饭呢？临吃饭时，才看见端上来的是用大米和小米混合煮成的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飞行员，是吃不到这种饭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常吃这种饭，叫做“革命饭”。今天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

尔萃马上就明白了，这不仅是伯伯让自己体验一下家里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教育自己，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能忘记我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带头过紧日子。在他们的饭桌上，一日三餐都是家常便饭

1962年春天，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辽宁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刚一住下，总理就对管生活的同志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照周总理的规定，每顿只能做两小盘素菜一个汤。同志们看到周总理日夜操劳，伙食又很普通，都非常心疼，变着法地让总理吃些肉食。一次，管理员偷偷地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总理发现后，马上叫邓颖超到厨房去查看，并说服大家今后再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了工作人员。为这事，周总理再次对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从此后，邓颖超同志三天两头下厨房，看买的東西是否合乎规定，做菜是否加了肉类。管生活的同志一看把关这样严，含着眼泪恳求邓大姐说：你就做做总理的工作，让加一点好菜吧！总理担着国家的重担，联着亿万人民的安危冷暖，影响健康，我们于心不忍哪！邓大姐说：同志们的心意我们理解。不过，还是按恩来同志说的办吧，做了，他不能吃，你还得挨批评。这中间到鞍山，服务员做了四菜一汤，总理亲自端下两个菜，告诉留着下顿热热吃。总理点名要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让弄点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一个是高粱米，保证每天吃一顿粗粮。同志们担心不好消化，总理说：东北人民能吃高

梁米，我当总理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 总理这个月的工资用完了 ”

1963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把著名演员严凤英、袁雪芬、张瑞芳等几位同志请到家里做客，想和大家谈谈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因为同来的客人中严凤英最小，所以她就去帮助邓大姐做饭。

邓颖超边做饭边和严凤英谈心。邓大姐说：“今天很对不起大家，菜准备得不多。”又悄悄对严凤英说：“总理这个月的工资用完了。”说完又特意关照：“可不要对别人讲啊，讲出去影响不好！”是啊，周恩来如此廉洁，那点工资又怎么够用呢。他身为国务院总理，来往客人之多，开销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可他从不向国家伸手，在生活上十分的俭朴。

战争年代，在行军作战中，两身换洗的衣服，一床毛毯，几乎就是周恩来的全部财产。解放后，他身居高位，但仍然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更简单，常常是两个一般的菜，一个汤，每周吃两顿粗粮。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几个月不沾荤食。穿的衣服修了又修，补了又补。1958年秋天，在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拿着一件旧衣服，请服务员送洗。服务员接过来一看，发现衣袖上和领子上都补了补丁，心想：这位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可真艰苦朴素啊。当服务员把洗好的衣服送还给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您在中央工作，常跟随总理出国，还穿打补丁的衣服，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真值得我们学习啊！”这位随行人员急忙解释说：“不，不，这件衣服不是我的，是总理的。他的衣服不穿到不能再穿的时候，总是舍不得丢掉！”周恩来的一套睡衣是1950年买的，上面的补丁一个挨一个，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可他仍舍不得扔掉，一直穿到逝世。他的一条浴巾用了20多年，正反补了14块补丁，住院时，还把它当作枕中，枕在头下，舍不得扔掉。他的澡缸是搪瓷的，掉了很多瓷，仍继续使用，不让换新的。抗战时期，他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被子，到1962年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他还在使用。

周恩来一生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俭朴生活，这正是他受到人民衷心爱戴的重要原因之一。

给柬埔寨王后送礼的费用由他负担

1964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总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礼宾司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头衔送欠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很快得到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同意礼宾司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听了这话，礼宾司的同志愕然不知所措，脱口而说：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呀！？当时礼宾司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桔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总理的警卫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礼宾司的同志心里很不平静：我们出的主意给总理添了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

分明。后来，礼宾司的同志找了几个同志商量，既要按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便人带。这样省却了昂贵的运费。事情办得相当顺利，王后接到礼物后非常感激。

周恩来设家宴招待医务人员。 席间，谈笑风声，亲如一家

1961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周恩来为了表示对参加手术的医务人员的感谢和慰问，自己出钱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了50多位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和平日做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聚餐。事前，工作人员起草的邀请人员名单上有化验主任，没有化验员，周恩来看了后，亲自加上了化验员的名字。

这天，邓颖超亲切地招呼医务人员参观了简朴的家。大家来到紫光阁不久，周恩来就兴致勃勃地赶到了。他的到来，像一股温馨的春风，气氛变得更加活跃、和谐、热烈、愉快。聚餐时，周恩来首先向大家道辛苦，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深切的感谢。大家听了总理诚挚爽朗的话语，心里感到无限温暖。席上，周恩来以四菜一汤款待大家，大家无拘无束地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切交谈，真是亲如一家。周恩来还要大家表演节目来助兴共欢。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唱京剧，一个个欢天喜地，兴趣盎然。周恩来还亲自指挥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此时的心情也像洪湖水一样激荡，久久不能平静。周恩来亲切地告诉大家，搞医务工作的同志不能光埋头工作，还要学会生活，在工作之余搞点娱乐活动，对身体、对工作、对精神都有好处。大家听着周恩来这良师益友般关切的话语，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

最后，周恩来与大家合影留念。当大家正为前后座次互相谦让时，周恩来亲自把一位老中医搀扶到前排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在前面。这次聚会，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关怀尊重的一片深情和他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

“西花厅，人间最温暖的家”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它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和谐、温馨的家，是他们和秘书、助手和保卫人员共同拥有的革命的大家，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许许多多的普普通通的人们的共同的家。在这个家里，他们都感受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他们的父母般的亲情、关怀和爱护。凡是这个大家的成员——无论是在重庆、南京、在长征途中，甚至30年代初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还是建国后和平时期的秘书、卫士们，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着妻子和孩子来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总理的秘书何谦说。

周总理从十年内战，抗日、解放战争到建国后的各个时期，他都充当着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总工程师。繁重的担子使他顾不上家庭生活。别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和爱人、子女共享家庭欢乐，而我们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心中却装满了工作和群众，把自己的小家庭生活挤掉了。

其实，周总理和邓大姐是把家庭生活扩大了。他们把在西花厅工作的全

体同志，包括工作人员住在西花厅的爱人、孩子和为孩子请的保姆，都视为亲人，问寒问暖，百般关心，我们在西花厅生活得像一家人。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把各界有关朋友请到西花厅作客。一边吃饭，一边了解情况。我们的亲属从外地来了，不管工作怎么忙，总理和大姐总是要挤出一点时间见见他们，这也算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吧。

曾经在中南海担任摄影记者的杜山回忆说：

在一次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时，我见到了邓大姐。她穿着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地喜欢孩子啊！

“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擦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的尿布雅观吗？”我没好气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眼光，为难地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忌这顾忌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喂，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就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2岁我都未能

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1961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一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1959年和1961年先后两次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服务员冯珍珍，永远忘不了在周总理家过新年的幸福情景。

1961年底，小冯光荣地被派到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中央7000人大会做服务工作。一天，当周总理和邓大姐从身边的工作人员那卫得知小冯到了北京的消息后，便托人转告小冯，请她到中南海来过元旦。12月31日，小冯万分激动地来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身旁。周总理笑盈盈地和她紧紧握手，邓大姐把她搂在怀里亲了又亲。周总理还亲自给小冯泡了一杯茶，又问庐山还来了谁；怎么不一道来做客。

在周总理家过新年，小冯心想：平时总理日夜操劳，元旦总该休息一天吧！可就在这一天，总理仍然从早忙到黑，从夜晚忙到天明。在周总理家过新年，小冯又想：平时总理生活俭朴，元旦总该改善一下吧！可就在这一天，总理仍然吃的是三菜一汤，还有几个窝窝头。

小冯在周总理家一连住了3天。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中，还关切地问起她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和邓大姐一起还间起她1959年在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写的入团申请书批了没有？当听说已被批准入团时，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十分高兴。在离别的前一天傍晚周总理和邓大姐还特意领着小冯瞻仰了毛主席经常到过的地方临别时，周总理为小冯题词“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在长征时期曾经担任过周总理警卫的魂国禄说。

1959年8月30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幸福的日子。11点30分，我们几个同志，从不同的地点，几乎同时来到了周总理的家中。这时候总理正在中央参加一个会议，不在家。穿着朴素的邓颖超大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会客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屋里的陈设很简单：西头会客室里有一套旧沙发和茶几，还有两块发了白的地毯。东头餐室有一张大圆桌和几把普通的木椅子。看到这一切，禁不住使人肃然起敬，总理的生活是多么简朴啊！

那天应邀来首长家中作客的，除了长征时期首长的警卫员我和范金标以外，还有曾跟随周总理工作多年的龙飞虎。20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战友，又

团聚在老首长的家中，使人感到分外亲切。邓大姐亲自忙着给我们倒茶，热情地招待我们吃点心，在谈话中间又关切地逐个问我们的家庭情况：什么时候结的婚？爱人是谁人？几个孩子啦？孩子上学没有？等等。当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这位在20多年前曾照顾和帮助过我的老大姐，很满意地连连点头，用一种放心的语气评论着说：“好啊，那就好啊！”

在回答邓大姐对我们的一些亲切询问时，我们也迫不及待地希望知道总理的身体健康情况。邓大姐说：“总理的身体很好，只是工作太忙，经常工作到深夜。”我们听了之后，深受感动。在20多年前，我跟随总理时，他很少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废寝忘食地坚持工作。今天，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他老人家仍然数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日以继夜的工作，这种精神是多么伟大啊！

我们正在谈着，外边来了电话，说总理开完这个会，接着又要参加另外一个会，1点30分才能回家。这时已过12点，邓大姐让我们先吃饭，我们怎么好先吃呢？我们都想等总理回来再说。又等了半小时，有人来说：“饭菜已准备好。”邓大姐怕我们饿了，站起来说：“恩来不在家，我是主人，我们先吃饭，不要等了，他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先吃。有一个菜，我吃了几口感到甜脆好吃，但就是品不出是什么菜？听邓大姐说，才知道是嫩玉米芯和辣椒炒肉丝。邓大姐笑着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劳动的果实。”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总理和邓大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参加劳动，在院子里亲自种些玉米、瓜菜。

我们刚吃完饭，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了。总理上身穿的白衬衫，下身穿条灰裤子，看起来比以前是显老了，脸上多了几条皱纹，头上已有了白发，但是精神仍然像当年那样饱满，连那双浓眉底下的眼睛也像当年一样充满了智慧，炯炯有神。总理一回来，看到我们这些当年的小鬼，马上和我们挨个地握手。当总理站在我面前时，昨天晚上想好的一些话一句也记不起来了，还是总理和我握手，并问我身体怎么样的时候，我才问了一句：“首长身体好吧！”

他爽朗地笑着说：“身体很好。”接着总理关切地问我们：“司机同志吃饭了吗？”我们齐声回答：“吃过了，去休息了。”总理才放下心来。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总理是多么关怀群众，热爱群众啊！

说着总理就叫我们坐下来，我们都坐在他的身边。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同我们随便闲谈，从工作情况到家庭生活都关心地问到了。当他知道我们都已结婚，并且都有几个小孩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说：“很好啊！20多年变化多大啊！”

我们望着总理花白的头发，感动地说：“总理，您的工作这样繁忙，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笑呵呵地说：“哪里能休息得下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得到解放，等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再休息嘛！”

这天，大家的心情非常兴奋，我本来不会喝酒，但为了祝总理和邓大姐身体健康，为了庆祝离别多年的老战友的欢聚，也很高兴地喝了几杯，不觉满脸通红。总理见我满脸通红，笑着说：“你搞外宾工作的还不会喝酒？西瓜可以解酒，你快吃几块西瓜吧。”周总理还是像当年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我吃了几块西瓜果然好了些。我们只顾了和总理说话，忘了他下午

还有事情，两点多钟了，总理还一直陪着我们说话。这时秘书提醒总理说：“你一会儿要去接见外宾，5点钟还要参加一个会议。”周总理才不得不站起来对我们说：“好吧，希望你们常到我这里来玩。”

这是一次很幸福的会见，临走的时候，我们和总理一起照了像，总理和他的部下、警卫员在一起照像，总理站中间，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总理和邓大姐却一定要站在边上，说什么也不站在中间。从这些生活小事上，使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周总理的风格是多么的伟大！他的态度是多么的谦虚！他的作风又是多么平易近人啊！

曾经在长征时期担任过周总理警卫战士的吴生开回忆说：

1969年12月，我从东北退休回江西，途经北京时，又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总理。

那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首先接待我的是邓颖超大姐。她告诉我，总理昨天工作到深夜，还未起床。接着，就十分热情地给我倒茶，端来了水果，说：“不要紧的，先坐坐吧，到了这里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邓大姐还是当年那样谦和、朴素、平易近人，我们便无拘束地聊开了。后来，她给我拿来一个塑料纸袋，里面装着两本书、活页笔记等，她说：“这些，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不一会，总理进来了。看见总理还是那样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内心感到莫大的幸福。总理握着我的手，第一句话就说：“吴生开同志，快10年没见面了呵！”

是的，已经10年了。10年来，总理处理了多少国内外大事呵，可是居然还记得10年前和一个普通的警卫员见面的事。我惊讶总理的记忆力，同时也为总理的高尚情操所深深感动。

接着，总理把塑料袋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检看。然后抽出两本，放在一边。他告诉我，中央最近有通知，凡未经审查的材料，一律不能公开外传。最后他诙谐地说：“所以，这两本我可要扣下啰，就是老部下也不能例外。生开同志不会有意见吧？！”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咱们的总理就是这样细致周到，一丝不苟啊！

随后，总理问起了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当他听说我退休回江西时，惊讶地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回答说：“已经60了。”

总理笑起来：“那算什么，我都72了嘛。”

邓大姐也插话说：“我也66了呢。”

总理接着说：“当然啰，有病还是应该休养的。休养期间，在社会上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教育下一代，也是一种工作嘛。”

谈着，谈着，不觉到中午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热情地留我吃了午饭。为了不多打扰首长，下午1点来钟，我便起身告辞，周总理和邓大姐一直把我送出门。临别时，总理紧握着我的手，叮嘱道：“有空常来信。下次来北京，欢迎你再来做客。”

著名二胡演奏家亓盛泉说：

1958年中秋节晚上，总理和邓颖超与我们一起联欢。

晚上8点钟，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到总理院内的小会议室。会议室摆着长桌，周围放满了凳子，桌子上堆放着总理和邓颖超为我们准备的苹果、葵花籽和水果糖。我们刚进会议室，邓颖超就热情地迎上来，给我们

安排座位，递茶水，和我们亲切交谈。不一会，总理就来了。我们一见总理，立即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欢呼。总理红光满面，微笑着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接着，联欢会开始了。大家表演了一些曲艺节目以后，一些同志提出要我来一段二胡独奏给总理听。我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指法也乱了。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却听得那样认真，还踏着脚轻轻地打着拍子。在总理的亲切鼓励下，我的紧张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演完了独奏，总理又高兴地带头向我鼓掌表示祝贺。随后，邓颖超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唱了一支陕北民歌，接着我们又要求总理来一个节目。总理笑了，欣然表示同意，给我们唱了一首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歌曲。

曾在总理和大姐身边做服务员工作的胡通德回忆说：

我搞服务工作，有时不免要出些差错，但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体谅我，鼓励我更好地工作。有一次，邓大姐让别人把她的一件外衣送来，让我给她熨一下。邓大姐的衣服轻易不让我洗，这次送来，一定是她有什么急事顾不过来。于是我暗暗嘱咐自己：一定得给邓大姐把衣服熨好。谁知事与愿违，在熨口袋的时候，我一时没有注意，熨铁把口袋给烧坏了。顿时，我心里又惭愧，又难受。惭愧的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好；难受的是，总理和邓大姐珍惜一针一线，省吃俭用，他们长时间没有做新衣服了，这件衣服都让我给熨坏了。我难过得去找邓大姐。邓大姐安慰我说：哪个人工作还能不出一些问题，衣服熨烧了，补一下不就行啦，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当时总理在另一个房间工作，听到我们说话，手里拿着铅笔推门出来，问道：什么事？邓大姐把衣服递给他，说明了我来的原因。总理看了看衣服，抬起头来慈祥地看着我，亲切地拉我坐下。这时，邓大姐忙着张罗饭菜，总理要我同他一起吃饭。吃饭时，总理向我问起洗衣服、熨衣服的经验。我说：总理，我可没有经验，给邓大姐熨衣服就烧坏了。总理说，你讲熨坏衣服的经验也可以嘛。邓大姐和我都笑了。吃罢饭临走时，总理和邓大姐把我送出门来，总理握住我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老胡，以后还要麻烦你呀。

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过的警卫战士们回忆说：

总理家中没孩子，他和邓颖超待我们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逢过节，总理都要和警卫战士一起合影，请到家里做客，并详细询问战士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及家庭情况。有一年中秋节，总理和邓颖超把我们请到家里，给我们讲了红军长征的故事，勉励我们发扬革命老前辈的传统，干好革命工作，接着又指挥我们一起唱革命歌曲。后来总理一看表，开会的时间到了，就站起来给我们打招呼：“我还有事，不陪了”。外宾访问总理时，常常带些礼物，总理总是舍不得吃，托人带给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有时还亲自送去，说：“你们辛苦了，这些东西你们吃”。

邓大姐的客厅正中，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猛虎下山”的烫画，它并非出自名家之手，而是警卫战士送给大姐的生日礼物。战士们看到大姐虽已高龄，仍然日夜为人民操劳，为党工作，壮志不减当年，便在她79岁生日前夕，创作了这幅烫画，以表达对大姐的深深敬意……

战士敬爱大姐，大姐更关怀战士。一天早晨，哨兵正在值勤。忽然，邓大姐来到他面前。哨兵急忙举手敬礼——“大姐辛苦了！”大姐握住他的手说：“我不辛苦，你们辛苦。”又说：“我经常从门口路过，没有下车，今天出来看看同志们。”接着，邓大姐叫出一些战士的名字，询问他们到哪里去了。大姐工作那么繁忙，心里还装着这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哨兵心头不

禁涌起一股暖流。

平常，大姐有点好东西，总忘不了战士们。王恩茂同志送给她两个哈密瓜，她舍不得吃，让秘书转送给了战士们。一个炎夏的中午，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忽然为战士送来几百根雪糕。原来，邓大姐坐汽车外出，见战士执勤非常辛苦，便用自己的钱买了雪糕为战士们消暑。

俗语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都会有大批老战士退到地方上去。在邓大姐门前站岗放哨的几名老战士要退役了，邓大姐来为他们送行。她勉励战士们：你们不要忘记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这段日子，要把解放军的好作风带到人民群众中去。她说：你们要学会两种本领，一种是松树的本领，再一种是柳树的本领。她叮嘱战士们回到地方以后，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在工作和学习中要知难而进，不要知难而退；来信反映情况要一分为二，不能合心意的都是好，不合心意的都不好。要分手了，邓大姐握着战士们的手，高声说：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一个竞赛！听着大姐的谆谆嘱托。战士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大姐告别。战士们把对大姐的敬仰与爱慕，自己的决心和誓言，一起注入了这崇高的军礼中……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西花厅这个“家”也是许多受委屈的“孩子们”寻求父母的庇护和抚慰的地方。

1966年底，在新疆伊犁和苏联接壤的一个边疆小镇——铁列克提。一位曾多次随周恩来出访的新华社的专职摄影记者——杜山被戴上特务、间谍的帽子流放在此。

面对边疆的旖旎的景色，野趣陡然而升。而在宁静的夜晚，杜山日渐一日的沉重的思念，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的心在遥远的中南海里徜徉来徜徉去的……冥冥之中他看见了无数熟悉的脸庞。“总理不会忘记我，他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他固执地、反复地从内心发出呐喊……

在远离边疆的北京城里，周恩来一直寄挂着这位普通的摄影记者。当杜山从机场被揪走后，他就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杜山的处境，当他听说杜山“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中流露出焦灼。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楚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干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态度问题，不能得到原谅时，他对新华社的人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1969年底，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有杜山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这时秘书将杜山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当杜山重新走进中南海时，景物依旧，犹如昨天才离去。进了西花厅的后院，心开始“怦怦”地跳，这曾经是多么熟悉啊！他独自迈进小客厅，环顾四周，心里酸甜苦辣、悲喜交集……一会儿，他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他的心越发跳得“突突”的，急忙迎到门口。“老杜——”

“总理……”杜山声音哽咽了。

总理紧紧地握住杜山的手，一点没变！这略高抬起也略有僵硬的握姿，那么的熟悉！一下子穿透时间的屏障，接通了过去岁月的亲切感受。

邓颖超正笑眯眯站在一旁。

落座后，总理和邓颖超仔细地打量了老杜一番。他们笑了，杜山也笑了……塞外的劲风和日光辐射将杜山改造成草原汉子的样子——黝黑、粗犷、健壮。

邓颖超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老杜啊，你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杜山心里“咯噔”一声，好一会没回过神来。

杜山茫然地望望总理，总理朝他点点头。一股热血从他心头滚过……他想：“我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却这样厚待我……”鼻尖愈加地酸涩，喉咙里像哽着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时，杜山蓦然发现周总理苍老了、消瘦了，脸上的深深的皱褶和褐色的老年斑，深刻着他的沧桑世事的岁月和艰难的跋涉。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充满热情和爱心的伟人，可有谁知道总理的凡人的内心是怎样走过漫长的苦难的历程的？

“总理，这几年您可好吗？”杜山问。

“好，挺好啊！”总理爽朗一笑。

“就是太忙，睡眠太少了。”邓大姐插了一句。

“总理，这次去朝鲜，时间定了没？”

总理吟思了一下。“还没有。出访的时机一要成熟，二要适宜。这几年去的国家少了，各国变化都很大，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先要搞些调查研究，摸摸情况。你也熟悉熟悉工作。等通知。我有活动就叫秘书通知你。”

不知邓颖超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时见她 and 秘书端了盘红艳艳的西瓜走了进来。

“来来……老杜，吃西瓜，大家几年不见了，来来，都一块吃。”邓颖超热情地张罗着。

客厅中间有张方桌，邓颖超把西瓜摆在上面，招呼杜山过去。总理两手一拍沙发扶手，一撑，也站了起来，笑道：“大姐有心请你，你还愣着？你这时不吃一会想吃也没有了。喂，你看这瓜多好！”

一口蜜甜的瓜汁一直流进心坎里。

出来时，邓颖超又把杜山从后厅一直送到前厅的门口。

经历过屈辱和苦难之后，杜山又重新感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切温暖的关怀，这种境遇的天翻地覆的转变，使杜山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在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强忍住了苦涩的眼泪。

后来，在周总理去世后，杜山终于得以将六年前就想流淌的泪水在邓大姐面前痛快地宣泄一尽。

周总理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杜山被姚文元种种刁难压抑着，有时为多发一张纪念总理的照片，要无端地受到指责，心里痛苦极了。总理追悼会后，他去西花厅给邓大姐送悼念总理的照片。

西花厅失去往日欢乐和生气。显得空寂清凉，杜山心里一阵阵地颤悸。已近午夜，邓颖超的书房还亮着灯，她正在看文件，见杜山裹着一身寒气走了进去，扬起苍白发意印着悲伤的脸庞，笑道：“老杜，这么晚，有事吗？”

杜山将大牛皮信袋交给她，心里涌上莫名的委屈和苦涩……信袋里照片是连夜冲洗出来的，生怕夜长梦多。姚文元上午打电话说：“送邓大姐的照片以我名义送，里面不要放天安门广场的镜头。”可照片里已选了天安门前人民悼念的镜头，杜山觉得邓大姐应该看到这样的镜头，就不等姚文元审阅，连夜送给邓大姐。

邓大姐一张张地看着，几次摘下老花镜用手帕擦眼眶，杜在一旁竟忍不住“呜呜”地哽咽出了声。

“心里难受，想哭就哭吧！……你跟总理时间长……”

“哇……”杜山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哭了起来。

无处宣泄的悲伤，无处诉说的苦恼，无人理解的委屈，一时随着滚滚的泪水痛快地流放一尽。

邓大姐这几天总是教育哭泣的工作人员：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

她没阻止杜山的哭泣而是静静地陪着他，直到杜山平静下来，才起身小心翼翼地收藏好照片。这分明是在收藏起她和总理永垂千古的美满姻缘。

周恩来和邓颖超投身中国革命半个多世纪，又长期担当党和国家的领导者的重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身边工作的同志越来越多，这个“家”也越来越大。凡是这个“家”的成员，都无不感到“西花厅，是人间最温暖的家。”

**“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保留好就行了，
我住的地方不要保留”**

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是最受崇敬和爱戴的伟人，但周恩来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教育人们多宣传毛主席和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丰功伟绩。

周总理在延安时住过的窑洞，就在毛主席的旧居旁边，本来已经开放展出，他知道后，不让开放，只好又关闭了。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外宾提出来要去看看周总理的旧居，周总理不去。

1958年，周总理到岗南水库工地视察，知道水库蓄水量大要淹没西柏坡村时，他说：“毛主席在西柏坡村住过，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一定要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迁移好。”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还有周总理住过的地方。周总理当即指示，“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保留好就行了，我住的地方不要保留。”并对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说，你们负责监督。

总理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这光辉史绩，但都由于总理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摄制计划。1959年，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得知总理要去审查，便提前赶到现场，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义展品的地方，布置好灯光，架起了机器，准备为总理拍摄一组镜头。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总理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去看后面的陈列了。八一厂的同志只好失望地收起摄影机。

也是这一年，江西省话剧团来京演出大型话剧《八一风暴》。八一制片厂的同志和剧组商量把它改编成故事影片，多次请总理来审查演出，希望对

如何拍摄电影作出指示。可是总理说：“你们演我，我就不看。”八一厂的同志又失望了。

“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和邓颖超毕生都在为争取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他们的贡献，在亿万人民中有口皆碑，但两位革命老人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员，经常深入到人民中间，时时注意体贴关怀他们。

周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挥着手说：“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工作人员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这种做法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随他乘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虽然隐蔽，仍常被他从反光镜中发现，便免不了受批评：“你们不要搞这些名堂，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一个秘书或一个警卫，加上司机共三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和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想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后来，国家又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一辆奔驰车坐，周恩来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就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他还常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外汇很宝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周恩来乘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公私分明。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他必定要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到医院看病以及私人访友，都算做私人用车，坚持自费。并且几十年不间断地提醒

司机记帐。不厌其烦地提醒司机：“老杨，这段路交费了没有？”秘书也每月提醒司机老杨算帐，督促交通部门不要忘了从工资中扣钱，以免挨批评。

1956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同志在首都西郊机场迎接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这时上百名摄影记者拥上前去抢拍照片。一位同志为了抓住时机拍照，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伸去，正巧搭在了前面一位同志的肩上，想以此为依托进行拍摄。前面的那位同志感觉到记者把长镜头伸在自己肩上，就一动不动地挺立着，为记者提供方便。当记者满意地结束了拍摄往回收取长镜头时，前面的那位同志才回过头来。“啊！是总理！”记者大吃一惊，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一时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周恩来亲切地向这位记者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就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开了。记者从周恩来那充满理解与支持的目光中，顿时感到了十分安慰，并为周恩来的体贴、关怀所感动。1961年秋的一天，在江西宾馆内，上海星火魔术团和南昌市杂技团正在联合演出。台上的魔术演员表演节目，需要台下的观众上来一个与他合作。“哪位同志上台来……”，演员的话音未落，周恩来兴奋地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健步走向舞台。演员看到竟然是周总理来到台上，既高兴，又紧张，腼腆地说：“我演不好。”周恩来热情地鼓励他大胆表演。看到周总理和蔼的笑容，演员紧张的情绪消失了。于是，他准备表演节目了，要观众再借一块表给他。“我这块手表借给你。”又是总理大力支持，摘下了自己的手表交给魔术师。魔术师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为观众成功地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节目表演完毕，周恩来离开舞台时，称赞说：“你表演得很好，这只表送给你作个纪念吧！”这时，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人民总理如此热爱艺术、支持艺术家的崇高品质的赞颂。

演出结束以后，周恩来又接见了全体演员。他满面笑容地问上海魔术团的同志：“你们来江西多少天啦？江西好不好？”同志们齐声答道：“好！”周恩来接着告诉大家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贡献。既然江西人民这么喜欢你们的表演，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俵，好不好？同志们听到总理说得如此诚恳，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好啊！好啊！”

后来，上海星火魔术团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留在了江西工作，并和南昌市杂技团合并成为江西省杂技团，在江西大地上深深扎下了根。

1957年7月的一天深夜，一名警卫战士在周恩来下榻的滨海寓所外站岗。周恩来房间里的灯光仍然亮着，他正在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着。

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文件，迈步来到被风雨吹打着的玻璃窗前。忽然，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黑漆漆的夜幕，照见了一个在室外冒雨执勤的警卫战士的身影。那个战士没有雨衣，衣服被雨水淋透了，只好在树下避雨。周恩来看到这种情景，心疼极了，连忙嘱咐夫人邓颖超：“决！快找出雨衣，送给那个执勤的战士！”

不一会儿，邓颖超一手打着伞，一手拿着雨衣，来到警卫战士身旁。她亲切地对警卫战士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来了，快穿上吧！”接着又补充说：“总理让我转告你，打雷下雨天，不要在树底下站岗。”那位战士接过雨衣，听到这亲切温暖的话语，心里感激万分，他动情地对邓颖超同志说：“谢谢，感谢总理的关怀！”

一件普通的雨衣，却凝聚着敬爱的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无限深情。

1985年5月的一天，一位同志拎着一篮苹果，满面春风地走进三 五医

院药房。他向医务人员自我介绍说：“我是邓颖超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邓颖超同志让我把这篮苹果送给大家。”药房里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了。药房的医务人员说，我们这些普通的药房工作人员，每天做的仅仅是数药片、抓中药、叮嘱病人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除了药味就是汗水，邓大姐却想到了我们，这怎能使我们不感到荣幸！送苹果的同志似乎已被大家热烈的情绪所感染，他动情他说：“你们知道这苹果的来历吗？这是一位外国元首送给她老人家的，她舍不得吃，说你们每天要在药房里来来回回走许多路，药房天地虽小，却连着千万人的心，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很辛苦。”同志们被深深地感动了。

周恩来指着房间那些新添置的东西，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为西花厅做了最后的安排。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建筑，西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建国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许多关系到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活的大事，都是在这里商讨、决定的。然而，凡是去过西花厅的人都感叹地称它为“朴实无华的西花厅”。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到吃饭时，这个客厅便又是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屋年久失修，铺着青砖的地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印痕。由于泛潮，喷了浆的墙壁，不到两年就变成了灰黑色。房间里光线比较暗。工作人员曾多次提建议翻修，周恩来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花这个钱。”周恩来的卫生间离他的办公室、卧室比较远，每次上厕所都要走一段路，很不方便。

周恩来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陈设也很简陋。

办公室里有一张两面抽屉的老式书桌。桌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靠背椅，就是座椅上垫一层棉花，再包上一层棉芯绒布的那种。

办公室的一侧，还有一张长条的会议桌，铺着一层绿呢子布，上面摆着烟缸和茶杯，两边各摆四把椅子，这是周恩来随时召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们开会和谈话的地方。

靠墙壁，正中间有1个简易木架子，木架上铺了周恩来在解放前用的毯子，两边各摆1个书柜，办公室两头还有书架子。书架上的书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选集，干部必读以及辞源、辞海等各种工具书。

周恩来每天除开会、谈话、接见内宾外宾、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商店等大量工作外，总要坐在那张老式办公桌前，伏案工作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他缝制了一副工作套袖，蓝布做的，两边有松紧带。每次办公前，他必要仔细带好套袖，以免磨坏衣袖肘部或被墨汁污染袖口。

在周恩来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

条棉布褥子。一条棉布被，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棉布，被里是白市布。枕里是个普通的海绵枕头。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4把椅子围拱1张床。因为总理连个衣服架也没有，脚下的椅子是放衣服用。周恩来有上床办公的习惯。每次离开办公室时，他自己抱一堆批阅的文件，我们帮他抱一叠文件，就放在床头的椅子上。周恩来上床后，必要继续办公三、四个小时，批阅过的文件由工作人员交机要秘书，然后他才会睡觉。

“大跃进”开始之前，周恩来工作特别忙。即使上了床，也要工作五六个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是不适合，工作人员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者落地灯。

“嗯，是得搞一个，这是工作需要。”

见总理同意了，工作人员马上又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就行，我们有储备。”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

“这是为工作又不是为享受。”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要宾馆里的。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这件事按传统办。”

“什么传统？”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周恩来笑着说：“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那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工人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

由于地面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疼。办公室的地毯也因潮湿而生了虫。老卫士长何谦跟邓大姐商量后，找到总理建议道：“总理，这些房子太旧了，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会损坏的。”

周恩来觉得有理，想了想说：“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这些房屋都是国家财产，不能损坏。”

何谦马上又建议：“那么我们就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周恩来同意道：“这件事你来办吧。”他看一眼何谦，特意强调说：“就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那里坏了修那里，要尽量节约。”

周恩来到南方视察、读书时，何谦留下来，负责房屋的维修。

何谦是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他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特别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办事从未出过什么大的差错。总理办什么事交到他手里都是很放心的。

这一次，何谦是带着一种感情接受这项任务的。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连走路要算计好时间。案头上的文件总是几大叠。

周恩来在中央首长那里，无疑是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然而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对此，何谦又心疼，又有些不平。有这样的心情，周恩来走后，他在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之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到下半夜就腿疼。何谦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

改成了地板，并且换了新地毯。窗帘太薄，夜里不隔凉，就换成了呢子的。卫生间也做了改建，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的澡盆搬来一个装好，这种澡盆底子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屋子里的家俱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他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他便为邓大姐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年久已经腐朽，便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了，他各个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觉得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理由的。

万没料到何谦的这些想法与周恩来的想法全扭劲了。

周恩来从南方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怔住了。接着便退出了门。

“何谦，何秘书！”

“总理，我在这儿。”何谦隐隐生出不祥的预感。

“你花了多少钱？”周恩来声音低沉，因而更显出份量沉重。

“不知道……”

“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周恩来始终用“小超”来称呼邓颖超。

“是我的主意。”何谦主动承担责任。

“你要做检查！”周恩来突然提高声音，声色俱厉。

“房子潮，夜里你办公……”何谦深深叹口气，接着解释说：“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释了，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

何谦长期跟随周恩来，他了解周恩来的习性：你错了，不解释，痛快认错，他一般不生气，你越解释他反而会越生气。

“总理，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愿意做出检查。”

“我回去，接受既成事实？”周恩来把手一摆，表示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何谦小声说：“你赔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大姐的工资合起来也不够……”

周恩来指着房间那些新添置的东西，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

周恩来发脾气的时候从来不骂人，但是说话语气激烈，声色俱厉。他发过脾气后，接着总要放缓声音说几句柔和的话，决不会让同志下不来台。这次不然，他气得厉害，没说柔和的话，搬到钓鱼台5号楼去了。那是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

实在说，当时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何谦同志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虽然不合周恩来的想法，但也不算不得过份，已经是很注意节俭。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脾气，家也不肯进了，大家都很焦急，纷纷去找陈毅。陈老总与总理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还会来点幽默，他一定能劝说总理消消气，接受现实，回家。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是住在钓鱼台不肯回家。工作人员都以为陈老总会马到成功，谁料想，陈毅不曾把周恩来劝回家，倒是周恩来把陈毅带到了国务院会议上。

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以后，在大会小会上连续做了几

次检查和自我批评。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国务会议。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再次检查这件事：“这次我在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由于周恩来反复检查，副总理和部长副部长们都以为总理家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无不感到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并无奢侈之感，甚至还不如某些部长和省委书记的住房好，而总理却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修造住房？

何谦也多次做出口头和书面检查。他检查之后，难过地说：“只要总理肯回家，在现在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我挨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周恩来听后，很受感动。他把何谦叫办公室去，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应该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想不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周恩来花费这么大精力处理这件事，止住了别人可能发生的效仿。

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东西。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汇报：“总理，能搬的我们都搬走了，地板和澡盆总不能硬拆吧？油漆总不能再刮掉吧？那样还得造成更大的浪费……”接着，陈毅同志也来劝说，至此，周恩来才勉强搬回家住。

此后，直到周恩来逝世，他的房间再没有大修过。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到了1964和1965年之间，工作人员的心思又曾活跃过一次。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种试验田的地方。那条长廊更是旧烂得不成样子，木料上的漆都脱剥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需要修理一下。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这些木建筑也该刷漆维修，这样才能起到保护效果。”

周恩来点头说：“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

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同意了，都很高兴，忙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一算帐，需要2万元。

“什么？2万元！”工作人员愣住了。

周恩来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000元，差了一位数。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

“ 差一位数，只有 2000。 ”

“ 嗯，差太多了…… ” 周恩来沉吟一下，说：“ 暂时放下吧，以后再说。 ”
就这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直到他逝世，院里屋里都再没修过。

“ 邓大姐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
所以我没有告诉他 ”

刘西尧在《我当总理的联络员前后》的回忆文章中说：

周总理以身作则，律己律人，使我国很好地保住了核试验的机密。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不成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准备了两发弹，第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同时绝对保密，在没有试成前，不让外国知道。在去核试验场前，周总理把张爱萍和我找去，嘱咐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能让其他人员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他接着说，邓大姐是我的妻子，党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爱萍同志把周总理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因而那次试验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无一泄密事件。

“ 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 ” 席卷全国之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近古稀之年。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及保护的同志，将“ 文化大革命 ” 造成的灾难减少到最小限度。

1965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面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 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 ” 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

“ 文化大革命 ” 之初，周恩来就要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罗瑞卿“ 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 ”。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被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 绝不能让抓人。 ” 当罗被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

“ 文化大革命 ” 中周恩来对于老师们的保护，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 1966 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底的 50 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 造反派 ” 5 次，累计 20 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12 月 31 日，各军事院校“ 造反派 ” 把几位老师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毅、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 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 ”。

彭德怀是 1966 年 12 月被江青指使“ 造反派 ” 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三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

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作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师，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师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师们住地。周恩来专门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师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师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他们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师从住处到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师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局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让他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对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事件”时，周恩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也是在12月间，周恩来在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谈话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局面心境的表露，这是一个多么沉重而坚强的内心世界！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5天。到8月4日，决定会期延长，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周恩来才继续讲话，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董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

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企图用谎言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受骗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周恩来独撑危局，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挤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或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作了自己能够作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发电报指示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个惊涛骇浪中周总理对自己的关怀和保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关于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把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23位国务院部委的部长先后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予以保护，还让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批斗。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崇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

来。

周恩来对陈毅和贺龙两位元帅的保护，更使知情人终身难忘。

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在去北京饭店之前，周恩来得知林彪、江青等人正煽动一些人要揪陈毅去批斗，他当即指示北京卫戍区：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在去饭店的路上，陈毅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车到饭店门口后，保卫人员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有关同志当即决定，把陈老总的汽车停在正门，有意引起人家注意。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汽车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保卫人员却用另外准备的汽车，从另一个门把陈毅接回中南海。车刚到中南海，周恩来就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煽动人企图揪斗陈毅。有一次，他们指使一伙人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老总的汽车，还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为此，周恩来非常气愤，又连续18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但周恩来仍然忍着病痛，大义凛然地对他们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越演越烈，陈毅还是未能免于批斗。在一次批斗陈毅的会上，林彪、江青等人策动一些人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揪走。周恩来当即指示：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面，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他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这类标语、口号。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那些受蒙蔽的群众，周恩来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也离开会场。但周恩来走后，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抢走了。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部队把陈毅救护出来。

1969年，经林彪的死党批准，他们卑鄙地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找来一个护士，冒充北京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同年6月，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

在这之前，当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的时候，周恩来曾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以后又亲自参与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保密的住处，指示部队把他保护起来。周恩来还亲自过问贺龙的医疗和生活问题。

5年以后，1974年7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已病魔缠身，但他仍抱病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移置仪式”。事先，邓大姐给贺龙的夫人薛明去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薛明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到休息室看望贺龙的亲属。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向里面望着，大声叫着：

“薛明，薛明呢！”

薛明连忙迎上前去。周恩来脚步踉跄地走前一步，声音颤抖地说：

“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他很少流泪，但这时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薛明和孩子们的眼泪也不停地往外淌。贺晓明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喉咙哽咽，只说了一句话：

“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

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一片哭声。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向贺龙鞠了7个躬。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想的是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病危的时刻，又让人取来《国际歌》的歌片，低声吟唱，并对同他一起战斗、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战友邓颖超同志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虚怀若谷，人民公仆的本色

1982年冬，《瞭望》周刊编辑听一位老同志说起：1941年，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的一家妇女刊物上，读到过一篇题为《李知凡太太》的文章。文章是写邓大姐的，读后令人久久难忘。只可惜因为当时的环境，有幸读过那文章的人只怕很少了。

这番话，引动了《瞭望》周刊的记者寻访《李知凡太太》的念头。在钱俊瑞、梅益、罗琼、胡耐秋等老同志指点下，在上海许多单位的热情帮助下，历时半年多，终于找到了刊载于《妇女知识丛书》上的《李知凡太太》。

李知凡太太，是邓大姐的化名。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因为患肺结核病，经党组织安排，大姐住进了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作者胡杏芬是疗养院的病友。她以那支生花妙笔，把邓大姐的品德与作风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亲可敬。

《李知凡太太》在《瞭望》周刊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各报纷纷转载，许多读者来信。在众多的来信中，最使编辑们感动的是邓大姐也写来了一封信：

盼望杂志编辑部：

近日，我看到盼望七月号发表了与我有关的一篇作品《李知凡太太》，我看后觉得，你们将原稿太长而作了删节，很好……

另外，我有一点意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前面加的“卓越”二字，我实在不敢当。最好什么形容词也不要加，否则，加“著名”二字也就可以了。供你们参考。

邓颖超

《李知凡太太》发表时，《瞭望》周刊加写了“按语”，“按语”中有“邓颖超同志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素为全国人民景慕……”以大姐的一生，“卓越”二字，当之无愧，但大姐为了这“卓越”二字，特意叮咛。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人民公仆的本色，使《瞭望》周刊的记者们敬意倍增。

这一天，《瞭望》周刊一位记者正在西花厅，所见所闻令她激动不已，想就此写一篇报道。大姐与这位记者是“老熟人”，平时待她非常亲切，而这时，大姐却表示绝不能“合作”。她说，在自己家里过过生日，可以；但中央有规定，不能祝寿，所以中央领导到家里来的活动不能报道。

“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
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
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

这是邓颖超 1978 年 7 月 1 日亲笔写给党中央的信。1992 年 7 月 18 日中午 12 时 17 分，在海河之滨：邓大姐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找到终生伴侣——周恩来的地方，邓大姐的骨灰在天津市民们的悲痛的唏嘘、抽泣声中，伴着一朵朵缤纷的月季花瓣慢慢地撒落，撒向海河，流向大海.....

在这哀伤的气氛中，人们不禁想起了 1976 年 1 月的那些被悲痛的阴云笼罩的日子.....

1 月 15 日，举行了周恩来的追悼大会。邓大姐的眼泪不断地流淌，但坚强地咬着牙，一直没有哭出声来。晚 7 时，邓大姐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的遗像和骨灰默哀后，打开了骨灰盒。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眼含热泪，缓缓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些话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最后诀别啊。

晚 8 时许，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和西花厅党支部的张树迎、高振晋同志出发去执行撒周总理骨灰的任务。

对于周总理死后不保留骨灰的遗愿，在周总理的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向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亲属解释说：我自己是共产党员，要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50 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旧风俗的重要改革。1958 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恩来虽然去世了，但他给我们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他的这一遗愿实现了。他的心愿，我已经了却了。

邓颖超还说：

“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

任何人。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花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并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花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从1955年就在周总理身边工作，1965年起，又协助邓颖超同志料理公务和生活的赵炜同志回忆了总理病重期间向她讲起撒骨灰的遗愿和总理逝世后邓大姐执行这一遗愿的过程：

记得1975年9月间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叫我去。未谈工作之前，先对我讲起他死后骨灰怎么处理的事。我一听他谈这个，就怕对他精神上有压力，忙用颤抖的声音说：“总理，您不要谈这事，您还不会那么快。现在讲，对您治病没有好处。”话音未落，总理就批评我说：“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我只好忍着悲痛听他说下去。他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的，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撒掉的问题。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的前面，我可以保证她的。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我强忍泪水听完了总理的这番话。

周总理逝世时，邓大姐当即向中央提出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赞成。记得李先念同志首先提出：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不答应的。邓小平同志也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所以后来还是搞了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

当时还有人提出是否保留一点骨灰，放在八宝山。邓大姐坚持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谁也不留骨灰。”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我们党支部的三个人——张树迎、高振普和我——该把恩来同志的骨灰往哪撒。她告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因为恩来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办成了。我和恩来年轻时都做过支部工作，一直重视党支部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就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

当时“四人帮”一伙正以各种方式限制悼念活动，各地群众则冲破重重封锁，以各种形式悼念总理，寄托自己的哀思。在这种情况下，小高提出是否把总理的骨灰在西花厅多放几天，以后再撒。邓大姐听后对我们说：不能这样做。撒掉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撒掉骨灰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她嘱咐我们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不要让群众发现，以免又成为后人纪念之地。

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去找地方，在北京附近转来转去也没发现个合适的地方。我们觉得像周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撒掉骨灰。办不好这件事，公们对不起周总理，对不起邓大姐，将来人民群众知道了也会责怪我们。必须选择最合适的地方才行。我们回来将寻找地方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报告了大姐，建议由组织上去实现周总理的请求，把骨灰撒向祖国的

江河大地。

撒骨灰的时刻到了，邓大姐来到机场，目送飞机起飞。那天夜里，天空格外清澈，明月高悬，繁星闪烁。我们望着飞机，飞出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机影了，才上车回家。回到家中，空军负责人张廷发同志随时向我通报飞行情况。邓大姐的心随着飞机，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飞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就这样，周总理的骨灰被默默地撒向祖国大地，撒在中华母亲的怀抱里。

1992年7月18日，随着邓颖超的骨灰的撒放，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音音相隔16年的恩爱夫妻，这一双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搏击了一生的伟大灵魂，在他们钟爱的祖国的江河里，大地上，在无限广阔的天空上张开双臂会合了……

生前无所求，死后又将一切献给人民

邓颖超在1982年6月17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几点意见。同年11月5日，邓颖超又给身边工作的同志们写下了身后需托付同志们做的几件事。邓颖超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 遗体解剖后火化。

2. 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 不搞遗体告别。

4. 不开追悼会。

5. 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78年7月1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部门的领导 and 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年6月17日重写

在写给身边工作的同志们的信中邓颖超说：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

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分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从这两封信中，我们看到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生前将一切献给了革命，死后也将一切献给人民，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周恩来传略》 方矩姜桂依著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伟人之初：周恩来》 孙钢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 李静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周恩来》 向农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人民公仆——周恩来》 马永川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 范若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周恩来的感情世界》 张全珍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周恩来的管理艺术》 刘泾山等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共和国元勋风范记事》 高路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老革命家高风美德的故事》袁胜利等编写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老革命家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赵长安等编写 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
年版
《一代革命家晚年纪事》高勇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回忆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吴开生等口述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程华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
《周恩来和知识分子》李蔚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周总理与诗歌》周红兴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周总理与故乡》江苏省淮安县编写组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 权延赤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年版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陈荒煤等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光辉的榜样》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 廖其康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后 记

我们怀着对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伟人的崇高敬意，在翻阅大量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及有关图书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撷取最能体现周恩来和邓颖超高贵品质的精彩片断，编写辑录而成此书。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的大力支持。雍桂良、李德忠为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1993年1月

